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月刊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 Work

2023年第3期(总第225期)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叶 菁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孙建军 仲建忠 刘晓清 汪东波 陈 红

吴建中 李国新 柯 平 胡海荣 徐益波

章云兰 鲁东明 程焕文 褚树青

主 编 褚树青

副 主 编 赵继海 屠淑敏 郑秀花

编 辑 部

编 辑 李 芳 王晓琳 孙晓清

编 务 徐越人

英文编译 鞠 婧

刊名题字 沙孟海

封面设计 黄海晶

主管单位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

主办单位 浙江图书馆

协办单位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编辑出版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编辑部

地 址 杭州市曙光路73号

邮 编 310007

电 话 (0571) 87988086

在线投稿 <http://bjb.zjlib.cn>

编读往来 lsrw@zjlib.cn

刊 号 ISSN2096-2363
CN33-1398/G2

定 价 22元

印 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3-3-10

■ 趋势报告	
《国际图联趋势报告》2022更新版	屠淑敏 殷叶玲 胡 洋 杜雪琴 译 5
■ 学术论坛	
大数据技术赋能: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的向度发展和限度制定研究	马占民 15
基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书香社会建设思路与实践	
——以“书香东莞”建设为例	施志唐 20
我国图书馆读者参与研究:观念演化、主题分布与发展趋势	章先贵 26
■ 阅读文化	
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陈红艳 罗 媛 33
我国副省级城市少儿图书馆微信阅读现状及对策研究*	毛志宣 40
基于图书共借数据的阅读社群分析*	潘文佳 46
■ 信息素养	
新文科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四级信息课程体系”创新理论研究	钟 戈 51

后疫情时代公共图书馆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的路径研究*

——以嘉兴市为例

杨 柳 葛文娴 陆艳芳 57

开放学习时代的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需求调查*

吴礼志 王 珂 杨 毅 64

■ 探索与创新

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用户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

张慧敏 徐 芳 71

图书馆智慧媒资管理平台建设实践探索*

曾 洁 76

■ 文献学研究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家礼考证》文献价值发覆*

陈 莉 吴凌杰 81

清代《萧山会试题名》及相关问题探讨*

全根先 89

本刊载文已被中国知网系列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超星学术期刊“域出版”平台、博看网、龙源网期刊收录,凡作者向本刊投稿并同意发表论文,均视为作者将该文著作权授予本刊,其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不再另行支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 WORK

CONTENTS

No.3 2023 (Serial No.225) Monthly

IFLA Trend Report 2022 Update	Tu Shumin Yin Yeling Hu Yang Du Xueqin	5
Big Data Technology Enabling: Research on the Direction Development and Limit Formulation of China's Library Cultural Governance	Ma Zhanmin	15
Scholarly Society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larly City in Dongguan as an Example	Shi Zhitang	20
Library Reader Participation Research in China: Conceptual Evolution, Subject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s	Zhang Xiangui	26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Children's Reading Promotion in Libraries	Chen Hongyan Luo Yuan	33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mproving Measures of WeChat Reading in Children's Libraries in Sub-Provincial Cities in China	Mao Zhixuan	40
Reading Community Analysis Based on Book Sharing Data	Pan Wenjia	46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Theory of the "Four-Level" Information Curriculum System"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Liberal Arts	Zhong Ge	51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Improv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he Elderly in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A Case Study of Jiaying	Yang Liu Ge Wenxian Lu Yanfang	57
Investig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Needs of Libraries in the Open Learning Era	Wu Lizhi Wang Ke Yang Yi	64
A Study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User Satisfaction of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Platforms	Zhang Huimin Xu Fang	71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Smart Media Management Platforms	Zeng Jie	76
Revealing of the <i>Jia Li Kao Zheng</i> Collected by Sun Yat-sen University Library	Chen Li Wu Lingjie	81
<i>Xiaoshan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Titles</i>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Discussion on Related Issues	Quan Genxian	89

· 趋势报告 ·

《国际图联趋势报告》2022 更新版

屠淑敏 殷叶玲 胡 洋 杜雪琴 译

(浙江图书馆 浙江杭州 310007)

摘 要:《国际图联趋势报告》是图书馆领域与来自不同学科专家之间对话的结果,自2013年初版报告发布以来,已经持续发布了2016、2017、2018、2019、2021、2022六个更新版本,展望未来、预判问题、寻求应对方式是报告贯穿始终的主题。2022版趋势报告对上一份报告中提出的新问题做出了回应,从激励、参与、赋能和连接四个方面,分别对全球图书馆领域和作为全球图书馆领域联合体的国际图联如何采取行动提出了11项、10项建议,呼吁重新关注可持续性,确保为未来做好准备。文章编译了这部分内容,希望为图书馆领域带来行业内外的新声音,为图书馆发展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 国际图联趋势报告; 2022

中图分类号: G259.13

文献标识码: A

IFLA Trend Report 2022 Update

Abstract The *IFLA Trend Report* is the result of a dialogue between the library field and experts from a range of disciplines. Since the initial version of the report was published in 2013, six updated versions have been released, 2016, 2017, 2018, 2019, 2021 and 2022. Looking ahead, anticipating problems and finding ways to respond are themes that run throughout the report. The *Ifla Trend Report 2022 Update* responds to the new issues raised in the previous report. It offers forms of action for the global library field and IFLA as a consortium of the global libraries, in terms of motivation, engagement, empowerment and connectivity. 11 and 10 suggestions are made respectively. The report calls for a renewed focus on sustainability to ensure readiness for the future. The article translates and compiles this section in the hope of bringing new voices from within and outside the profession to the library field and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library development.

Key words *IFLA Trend Report*; 2022

《国际图联趋势报告》2022更新版是一份充满希望的报告,提供了各种思想和见解,希望能激发图书馆领域对未来的积极参与,不仅面对未来做好准备,而且充分利用未来谋求发展。

2022版报告主要从两个方面延续了2021版报告的主题。首先,对上一份报告中提出的新问题做出了回应,从激励、参与、赋能和连接四个方面,分别对全球图书馆领域和作为全球图书馆领域联合体的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以下简称“国际图联”)如何采取行动提出了11项、10项建议;其次,这份报

告是以2022年7月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的第87届世界图书馆和信息大会新兴领导人会议上12位来自全球五大洲的参会者分享的想法为基础起草的,与2021版报告同样是图书馆领域新兴领导者的工作成果。

报告强调,其搜集信息和建议的方式是多元化、多局域化和交叉的,这些不同的互相交叉融合的观点提升了该份报告的价值。报告同时呼吁跳出思维定式,激发图书馆领域对未来的积极参与,不断增加新的声音和想法。

一、激励

报告的这一部分着眼于提出一些能够推动人们对图书馆领域有更积极看法的关键建议,包括外界对图书馆的看法,以及图书馆行业内部对自身的思考。

(一) 对全球图书馆领域的建议

1. 我们要将图书馆视为各个领域政策制定的参与者

人们对于图书馆工作者存在一种刻板印象,认为我们可能倾向于与世隔绝,更愿意流连于书架间的宁静而不是直面社会挑战。作为一个行业,我们经常被认为是缺乏关联性的——有时候甚至我们自己也这么认为,我们被认为只专注于某一个特定领域或行动类型,无论是在教育、文化还是其他方面。

然而,刻板印象(在很大程度上)会出错,我们理所当然地需要对此进行质疑。同样错误的观点是,认为图书馆是“只会一种把戏的小马驹”,只能够执行一种政策优先事项。正如我们在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许多其他领域的工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图书馆工作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各种其他政策目标的一种手段。

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的使命是通过信息获取来改善生活,那么我们就有责任参与到这些不同领域诸多问题的探讨和决策中去,从卫生和健康问题到城市规划,从农业问题到社会安全,我们都要将自己视为利益相关者。

这也要求我们改变自身的思维方式。在确定未来优先事项和计划的初期,我们需要保持广阔的视野,才能正确评估社区需求。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某些问题不属于图书馆的传统活跃领域就将其排除在外。相反,我们要对图书馆的价值和优势怀有信心和憧憬,相信它们能够以更广泛的方式作出贡献。

接下来,我们可能还需要重新审视衡量自身成功的方式,从以图书馆为中心的指标体系转向更广泛的社会指标体系——特别是纳入更多决策者使用的指标,例如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来衡量成功与否。这也可以帮助我们从更广泛的角度思考我们的工作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

2. 我们应更加开放地选择宣传的地点和方式,让更广泛的社会主题成为图书馆领域的主题

在我们行业的讨论中,我们经常使用诸如“图书

馆政策”或“图书馆宣传”这样的术语。这可能会让人认为,图书馆与政府或其他政策决策者之间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互动关系,仅在某一个领域,与某一个人、机构或部门对接,并且还给人一种“图书馆工作的唯一目标就是图书馆本身”的感受。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上所述,只要是信息获取能产生影响的领域,图书馆都应该是参与者。因此,图书馆与许多不同的机构、部门和利益相关者都存在潜在的合作机会,不应只局限于某一种关系。

因此,我们应该将自身纳入到更广泛的政策制定中,如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因为我们是合法的行动者,有潜力做出真正全面的贡献。简而言之,我们应将更广泛的社会主题变成图书馆领域的主题。

对于我们行业自身而言,我们要勇于在图书馆服务发挥作用的方式上积极创新,也要实事求是地评估现有资源以及能够产生的影响,让整体效用最大化。我们应避免过度推销自己,做出承诺却无法实现会损害我们的信誉,但也应为大胆创新做好准备。

例如,图书馆作为环境政策和气候行动的参与者,这是一个新兴热点问题。显然,我们的机构受到了整个社会面临变化的影响,但我们并非无力应对。在不断提升自身环境素养的基础上,一方面,我们可以将环境评估纳入我们的工作和决策范畴,同时,也可以创造性地利用我们的资源——藏品、空间和员工——来激励和支持我们的社区行动。图书馆有潜力成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基石。

在就图书馆相关问题与他人进行交流时,我们要能清晰地表达广泛的政策目标和图书馆行动议程之间密切而牢固的关系,表明图书馆的行动有能力在赋能所有人实现自身潜力的基础上促进积极的社会变革。例如,在涉及公共卫生、健康的民主等话题的讨论中,信息素养等图书馆传统优势领域就有明显的应用价值。

3. 我们应加强和改进自身的宣传工作

如果我们不能将自身置于更广泛社会议程的核心,仅仅在行业内部更新理念和计划是远远不够的。正如上文所强调的,我们不仅要自己认识到,还要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建立起我们的工作与其他领域工作间更牢固的联系。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进行宣传。我们

要认识到有效沟通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一项值得投资和需要重点支持的技能。这包括能以值得信赖的方式与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政策制定者交谈的能力。这也许是老生常谈了,但以此为目标首先要做的就是成为更好的倾听者,花时间去充分理解对方关心什么,以及他们的语言体系。我们不能指望他人主动提及“图书馆”,我们要用他们习惯使用的语言来说话,以最大限度地产生共鸣。

还要确保对方认识到支持图书馆是双赢的。所有有可能资助图书馆的人都会有其他可投资的领域。我们要具备解释为什么投资图书馆相较于投资其他领域是更有价值的能力。

除了这些基础的方面,我们还要鼓励更多创新,准备好让交谈对象感到惊喜,更充分地参与进来。正如一直强调的那样,要创造机会让图书馆成为更广泛叙事体系的一部分,例如围绕“充满希望”的世界观叙事,即相信个体的能力,给予个体所需的技能和信息以充分实现其潜力。就像爱尔兰前总统玛丽·罗宾逊在2022年世界图书馆和信息大会的开幕式上所强调的:我们应将自己作为“希望的中心”来宣传。

显然,与新兴图书馆领导者合作是对我们行业和未来目标开展宣传的最佳方式之一。我们要找到方法,既能激励这些领导者,又能利用我们在这里强调的广泛的、雄心勃勃的视野和战术知识来建立他们成为成功宣传者的信心和技能。因此,那些有经验和人脉的图书馆领导者应该考虑让新鲜力量加入进来,这也是我们对自身未来的投资。

(二) 对国际图联的建议

A. 我们要在全球问题和个人经验之间建立联系

国际图联的作用非常重要。作为图书馆领域最重要的全球组织,国际图联具有在联合国和诸多联合国机构中的观察员身份,可以像“天线”一样关注、倾听各方那些可能影响到政策制定的关键(新的)想法、理解,甚至是分歧。

这是对我们现有工作的补充,即展现有关图书馆的信息,并以一种“翻译者”的新角色来游说我们领域之外的决策者。国际图联还应以帮助同事理解和内化关键主题的方式对这种参与行为做出报告和解释,让这些主题成为更多图书馆人行动和沟通的内容。这也是对上述建议1和2的支持。

当然,仅仅一小部分人的参与是不够的。要确保

图书馆领域有更多的人能以某种方式参与此类会议或进程。提供帮助,在图书馆领域的实践工作与全球问题间建立更直接的联系。当然,提升图书馆领域的多样性也能加强我们的宣传工作。

B. 我们应开发鼓舞人心的核心文本,塑造图书馆领域内外的思维

当然,我们不应只是向别人学习。当和合作伙伴一起工作时,我们要制定并阐释能够塑造我们思维的标准、指南以及高层次指导原则,我们有这个能力。这些材料也可以用来向其他人解释和推广图书馆领域,以简短有力的方式概括图书馆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帮助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者理解为什么图书馆如此重要。

国际图联有能力领导此类工作,因为它能够倾听和理解图书馆领域的广泛需求,能将志愿者和其他有能力把这些需求转化成鼓舞人心文本的人聚集在一起。近期一个典型例子是《公共图书馆宣言》的修订和发布,第三版宣言将先前版本的核心原则与当下全球图书馆员认可的关键问题进行了融合。该文本不仅将成为个体图书馆战略的一部分,而且将成为图书馆体系乃至法律层面的一部分。

在国际图联范畴内还有许多类似的文本,也还有许多可能开发类似文本的领域。这些文本不仅激发了图书馆行业新的能量和活力,也是向潜在合作伙伴发出参与邀请的名片。

在开展这项工作时,如果我们希望阅读这些文本的人认同我们的愿景和抱负,我们就必须有雄心和远见。这些文本有必要得到更多技术材料的补充,以便能以适应当地、国家和区域层面需求的方式提供实际的帮助和支持。

C. 我们要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一起,为图书馆有效发声

这或许不言而喻,但国际图联有责任确保它向其他利益相关者所做的宣传是有效的。国际图联应该成为一个榜样,在促进图书馆行业、图书馆利益和图书馆价值观,帮助其他领域理解图书馆的(潜在)作用并建立联系,为图书馆工作寻找拥护者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可参与的领域方面,国际图联要富有想象力,但也要严格将精力分配到可以获得最大利益的领域,比如直接产出方面(公约、建议、声明、与图书馆相关的研究报告),或是与国家层面的决策者建立联系,为成员开辟新的可能性。

为此，有必要吸引更多的志愿者参与国际图联的宣传工作。国际图联的众多分支机构首先是一个全球业内人士聚会，讨论、交流、了解图书馆领域面临关键问题的空间。同时，他们也是自身关注领域的图书馆代言人，是展示图书馆服务内容的一个窗口。国际图联的地区机构当然也是如此，它们可以让图书馆在地区层面的机构合作和政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参与

报告的这一部分就如何实现“全球图书馆界”的概念进行了探讨，以确保尽可能多的图书馆人不仅能够成为集体的一部分，更能感受到自己是集体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也对图书馆的工作进行了审视，以确保图书馆不仅是物理上的社区中心，也是人们心目中真正的社区中心，让每个受益于图书馆（或其网站）服务的人都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一）对全球图书馆领域的建议

4. 我们要对图书馆领域做更广泛的定义，并确保图书馆成为更广泛领域行动的一部分

图书馆领域的强大程度取决于有多少人对自己的职业有归属感。抽象地谈论图书馆和信息专业人士的集体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这与图书馆及相关领域的数百万从业人员是否与图书馆行业、图书馆行业的价值观以及图书馆行业的未来建立了强有力的关联是两回事。而这是实现我们经常谈论的“全球社区”的先决条件。全球社区是一个人们共享价值观、经验和想法，以推动我们实现目标的场所。

这样做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为社区服务。想象一下，如果我们都无法为行业内部的多样性以及为将整个行业凝聚在一起的协会提供支持，我们如何有能力为多样化人群提供有意义和有影响力的服务。通过放大那些鲜为人知的声音，我们可能会找到新的方法，例如，为那些面临边缘化风险的人提供帮助。

向这个方向迈进的关键一步是要确保志愿工作和行动主义得到重视。正如“激励”主题下所强调的，我们要将自己视为一个积极主动的职业，始终寻找新的、更好的工作方式。参与协会工作非常重要，为此（理想情况下）所投入的时间对个人和专业发展来说都物超所值。这种重要性已经在培训中得到了呈现，也可以将其作为更广泛的专业绩效和发展评估的

一部分。

与上述相关的第二步工作是，图书馆领域可以做什么，让新兴图书馆领导者感受到自己在这个行业中拥有一席之地，有表达观点的机会。在职业生涯初期就养成将自己视为更宏大领域一部分的习惯非常必要，事实上，它可以成为个人发展的关键推动和驱动力。

要做到这一点，很重要的是要确保新兴领导者拥有参与重要事务的机会，帮助那些刚接触图书馆行业的新人进行结构化反思，帮助他们认识到参与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障碍以及他们能够得到的支持。还应该尊重和感激那些已经在该领域担任领导角色，并时刻准备挺身而出支持新人的人。

5. 我们必须将外展视为实现使命的关键

在与图书馆领域的专业人员建立联系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同时，我们还要履行为所有人提供优质图书馆服务的承诺。

我们要将自己视为“社区”机构，鉴于“社区”涉及的概念广泛，不仅包括以生活地划分的社区，还包括大学社区、政府部门或议会官员社区、企业员工社区等。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随时从外部审视自己，反思我们的运作方式，观察它是如何影响人们使用图书馆的意愿或能力的。

这方面的关键是我们展示自身的方式。显然，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因为我们的用户类型是多样的，有些人更倾向于安静的图书馆，有些人则更需要自我表现和创新的机会。

与上一个问题相关的是我们如何进行双向沟通。在推广服务方面，我们应当善用工具，通过工具找到我们希望找到的人。这可能需要想象力，尤其是涉及某些被边缘化群体时，例如那些语言不通或缺乏归属感的人群。

然而，交流并不是单向的，它还取决于我们的参与程度，我们能否积极地倾听（潜在）用户的声音和需求。我们要有同理心，能看到他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技术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当然还要充分尊重人权。重要的是，我们要信任我们的社区会与我们互动并且给予反馈，而不是预先判断他们参与图书馆提供服务的方式。

同样需要转变的还有思维方式，我们要将自己视为是为群体需求服务的。如果处理得当，图书馆可以

通过其空间、馆藏和服务构建一个物理支点,帮助建立更牢固的联系。当然,这是需要思考和计划的。

与儿童和家庭建立联系具有特殊的意义。如果一个人在孩童时期就开始使用图书馆,那么大概率会在之后的人生中持续使用图书馆,甚至也会让自己的孩子养成这个习惯。这表明了投资学校、公共和社区图书馆的价值,也是宣传整个图书馆领域的有力证据。

(二) 对国际图联的建议

D. 我们要找到合适的工作方法,让国际图联的工作可以吸引每个图书馆人的关注并能轻松地参与其中

为了保证国际图联自身的充分参与,需要确保每个人都能在国际图联的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当然,这与上述建议4密切相关,参与国际图联是对更广泛领域归属感的一种体现。

在某种程度上,这关乎国际图联现有的志愿者队伍问题。不同的志愿者团队拥有不同的主题重点或区域归属,可提供的职位数已超出一千个。对于具有全球视野的人而言,这是他们将自己和他人的能力与知识结合起来创造新事物的绝佳机会。

最大化志愿者群体的多样性,不仅可以实现增强其所代表的全球图书馆工作价值的近期目标,也可以实现确保尽可能多的图书馆人将自己视为国际图联一部分的长远目标。国际图联有必要对实现更广泛参与可能会遇到的障碍以及如何克服这些障碍等问题进行思考。一些非常实用的方法是,比如在选举期间帮助有潜力的志愿者寻找提名人,或者采用多语言推介良好实践;另一些可能更多的是有关展示的,比如尽力表明每个人的经验都是有价值的。

国际图联也可以就人们更愿意担任何种角色作进一步的了解。有些人可能无法承诺长期参与国际图联工作,或者比起成为正式委员为一般性议程作贡献,他们更愿意为具体的项目和计划助力。在国际图联新的治理结构中,通过创建工作组和工作网络来开展行动是一个前进的方向,尤其是以更轻松友好的方式解决新问题,这可能适合那些期望首次尝试国际图联工作的人。

国际图联还需要开发尽可能广泛的参与工具包。这不仅指“单向”的网络研讨会,还意味着更多的互动形式,包括大师班、工作坊和更开放的讨论工作会议。应该认识到,图书馆领域还有许多人无法获取可

靠的互联网连接,因此我们准备的内容需可供下载,或者采用当地可以获取的格式,以便用于各地的面对面活动。这也有助于更好地服务那些更加重视面对面对交流文化的区域。

E. 我们要与新兴图书馆领导者开展对话和活动,塑造图书馆的未来

国际图联同样需要确保新兴领导者将与国际图联的合作视为他们自身发展的一个关键部分。事实上,正如本报告中提到的,这种参与本身可以成为个人和职业发展的驱动力。

国际图联有必要在其架构中为这些新兴领导者提供空间。不能低估(或给人以低估的印象)那些专业经验较少的人,要认识到活力、新观点和新视角于团队的价值。他们可以成为那些拥有更多经验人士的有效补充,从而形成一个更强大的、更具影响力的整体。

因此,要更清晰地表达对新兴领导者的欢迎,让更多的人觉得自己可以成为候选人。投票人在决定支持谁时也应牢记,国际图联的价值恰恰源于可以汇集多样性的观点,而不是仅为已经熟知的事情投票。

这种关注不应局限于选举。委员会内部的工作方式也应或多或少地向新兴领导者倾斜。国际图联已经在考虑任命一些导师,为新成员提供指导和支持。项目或工作组可以提供一些适当的途径,让人们能够参与、学习和作出贡献。各位主席和官员可以留意一些具备优势和潜力的人员,并与他们开展合作。

当然,这些工作也不必局限于现任委员会成员。允许非会员参与工作并获得经验更能体现这个机构的开放程度,也可以为这些非会员未来成为正式会员奠定基础。甚至,将新兴领导者参与委员会工作作为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也是有价值的。上文建议D中提出的许多观点显然也适用于此。

三、赋能

报告的这一部分汇集了关于图书馆领域和国际图联如何使“创新”和“学习”成为我们自身以及我们实践核心的观点。这与可持续性思维密切相关,确保我们在规划中充分重视未来,并据此作出决定。这一部分也强调了我们不能将自己视为未来的受害者,而应作为行动者积极参与其中,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也是出于社会整体利益的考虑。

（一）对全球图书馆领域的建议

6. 我们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拥抱未来

本报告已经提到，造成图书馆刻板印象的一个因素是认为图书馆是被动的，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不太可能主动寻求改变。这或许可以用图书馆的发展历史来解释，图书馆悠久的历史给人造成了一种永恒不变的错觉，甚至将不变当成了一种优点。虽然这对我们的价值观来说可能是有意义的，即把人人都有获取信息的权利作为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和发展驱动力，但在如何实现价值观方面就行不通了。

也可能存在一种恐惧感——认为变化的未来不如过去。对未知或不确定的事物感到恐惧，沉溺于回顾“美好的过去”是人类的天性，尤其是在图书馆（以及图书行业和其他领域的一些机构）因社会、经济、技术和政治变革而脱离舒适区的当下。

作为应对，我们不仅要对我们如何做（我们的行事方法）有信心，还需要对我们做什么和为什么做（我们的使命和价值观）抱有信心。这比特定的活动或服务更重要。只要我们对自身的使命和价值坚定信念，我们完全可以改变局面，将自己视为未来的参与者，而非受害者。

这需要对目前已经了解的事物保持务实的态度，包括解构自己并批判性地分析自己；同时，也要对我们尚未了解的事物保持好奇心，并且愿意接受新的工具和想法。这也需要我们接受合理的风险，当某些事情行不通时，能够把它当作一种学习经验，作为对未来行动的准备。

重要的是，一旦我们意识到我们对未来拥有自主性，我们就可以在思想上有所改变，而不仅仅是将未来视作我们无法改变的外部事物。

建立与未来的联系感也可以帮助我们推动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行动。如果我们认识到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的长期影响，就可以确保当下的工作和处理资源的方式可以在未来带来最大效益。

我们通过加强战略规划来发挥这种主观能动性。我们应以证据依据和现有资源为基础，始终从评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开始行动。我们需要明智地将资源分配到能够产生最大效益的地方，了解风险和障碍，并确保从一开始就将对成效的评估融入进来。

至关重要，我们应该秉持开放的态度，不要过早地放弃一些想法，例如某些可能只是在过去不同

条件下没有获得成功的想法。

7. 我们要乐于接受并分享创新

我们不仅要把自己看作是创新者，还应该勇于成为别人眼里的创新者，这一点与以未来为中心的理念密切相关。正如建议6所强调的，我们要坚守的是我们的价值观和使命，而不是具体的活动和服务，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满足现状，而是要不断地寻找、应用和分享新的工作方式。

这可能会让人感到不适。脑海中热衷于处理熟悉事务的那部分会倾向于抵抗，但我们需要克服这一点。上文提到的自主意识，即坚信我们都能够有所作为、塑造未来，可以在这方面有所帮助。

在个人层面上，我们要让反思和创新成为实践的一部分，无论是个体工作，还是与他人合作，始终确保有一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上。在整个领域层面，我们可能会在将创新作为一种职业素养进行鼓励和奖赏方面做更多工作，并为新思想和新工具在整个领域的传播提供渠道。与此紧密相关的是提供可以相互学习的空间和激励措施，这可以提升我们工作中的洞察力。

显然，数字工具可以在推动改革创新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在新冠疫情之前，许多人对技术的安全性感到担忧，但过去几年的经验表明，图书馆领域完全有能力让这些工具为我所用，完成使命。当然，数字鸿沟仍然存在，我们应努力解决这一问题，这是确保所有人都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并为日益增长的数字原生用户群体服务的关键一步。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图书馆不仅仅是技术的“接受者”，也可以成为塑造互联网的核心力量，正如我们过去所做的那样。图书馆甚至可以围绕所有人的权利和发展需求，构建互联网运作的新图景。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图书馆作为更广泛的“开放”运动的基石，不仅贡献了馆藏，还贡献了技术和价值观。开放获取，开放科学，开放美术馆、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Open GLAM）等等，所有这些行动都提供了一个以图书馆为核心，比纯粹由私人利益驱动的互联网更积极、更具公益性的互联网版本。整合“开放”的思维方式，支持其发展壮大，提供应对困难和挑战的解决方案，展示了图书馆对未来的重要贡献，也是巩固图书馆在他人心中创新者地位的重要方式。

8. 我们要将自己视为教育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

建议7强调了我们应该如何在图书馆领域和更广泛的世界中支持创新。对于教育,我们也应该秉持同样的支持态度。我们要将图书馆视为教育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可或缺的行动者,不仅是政策实施的一部分,也是根据我们对读者需求的了解和经验来帮助制定政策的一部分。

但是经常发生这样的状况,不论是早期教育还是成人学习,制定相关政策时,图书馆往往会被遗忘。这并不是图书馆员没有意识到自身具备为此作出贡献的能力。事实上,许多人已经将自己视作教育的培训者和支持者,组织开展可以为参与者带来真正益处的课程和活动,不让任何人在利用各种媒介实现信息获取方面掉队。这种广泛的服务尤其重要,对于已经错过或未能接受正规教育,以及面临边缘化风险的人群来说,图书馆大概率是(或者应该是)其第二次(或第一次)机会。

然而,这些努力极少成为更广泛政策或战略的一部分,也很少得到支持。最终往往会出现由图书馆发起的行动和由其他参与者发起的行动并行的局面。这些行动间缺乏协调,使得实现协同增效变得更加困难。

尽管如此,非正规学习被公认是对正规学习的补充,重要性不言而喻,这对图书馆来说同样是机会,尤其是对公共图书馆和社区图书馆而言。他们通常作为此类教育措施的一部分创建,尽管可能没有使用“非正规”这个词。他们被视为提高或保持读写能力的一种途径,特别是对超龄人群而言。

许多图书馆不仅承担了这一职能,还转换了角色,提供新服务,帮助用户学习新技能,应对新挑战。这些图书馆以用户需求为中心,超越了基本读写的服务范畴,正在成为更具适用性的多功能学习中心。随着教育政策的发展,非正规学习被赋予了与正规学习相当的作用,我们应该努力确保图书馆与学校、大学和其他机构一样,被视作这一领域的关键角色和工作伙伴。

鉴于图书馆可以带来的专业知识和洞察力,图书馆理应参与决策过程。任何严肃的循证政策制定进程都应借鉴最广泛利益相关人员的可用经验。当务之急是,图书馆要在教育政策的咨询或审查中更为积极主动地发声,以彰显图书馆的重要性。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许多国家,图书馆是学校或大学的标配。事实上,很难想象一所教育机构中

没有图书馆,而好的大学通常都有很好的图书馆。通过这种方式,教师和图书馆员在教育基础设施中一起工作,共同构建了一个教师、学生、信息和图书馆员紧密结合的学术环境。

9. 我们需要将支持新兴领导者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支柱,认识到所有人都有发展的潜力

在我们努力让教育成为每个公民生活一部分的同时,也需要强调让教育成为我们自己职业生活的一部分。根据建议6,我们自己将是成就自己未来的行动者,这也是未来规划的一部分。显然,现阶段的学习赋予了我们未来做出改变、并有能力做得更好的可能性。

最大的收获将来自于帮助新兴领导者养成学习习惯,但回报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当然,学习需要投资。这不仅仅是购买课程,还需要为学习者留出学习或参与活动的时间,如交换交流、工作见习或参与协会工作,要理解能够获得的收益比投入的成本更重要。这个过程中可能还需要那些经验更丰富的人放弃某些角色或机会,来帮助其他人。

还应提供支持,帮助新兴领导者为他们可能面临的挑战做好准备。需要思考图书馆领域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所需要的技能,这当然包括有效的宣传、与他人建立伙伴关系和合作的能力。

按照10%的学习来自正规学习机会,20%来自非正规学习机会(如见习或会议),70%来自日常工作的规律,我们也应该为这些领导者提供在工作中发挥作用、将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从而发展知识和技能的机会。这也要求做好准备放宽限制,增加信任。

还应强调的是,对“领导力”应该有更广泛的理解。并不是成为一名管理者才是领导者。任何有改变事物能力的人都可以证明自己具有领导力。图书馆和信息工作者也并非只能在行业内发挥领导作用,他们同样有潜力成为社区的领导者。因此,我们应支持和鼓励各种形式的领导力。

本部分虽然主要关注新兴领导者。但是,并不是一旦某个人“崭露头角”,或工作了一段时间,就可以停止学习和发展了。因此,上述提及的许多问题自然也适用于更广泛的人群,例如留出时间学习,认可和鼓励发展进步及提升领导力。为了支持学习,我们需要确保拥有自己领域的学习基础设施,既能满足对学习内容的要求,也能响应对学习方式的需求。

（二）对国际图联的建议

F. 我们应了解图书馆领域及其需求，寻求如何最有效地支持其发展的方法

上述建议中强调的关于图书馆领域的文化变革意味着图书馆协会，当然也包括国际图联，有责任发挥领导作用。国际图联需要表明对创新和学习的重视，并致力于利用自身资源来支持创新和学习。

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有深入了解图书馆领域及其需求的能力。正如在“参与”部分特别强调的，多个层面的多样性是图书馆领域的显著特点，这既包括了个体图书馆、信息工作者和信息机构能够利用国家或地区层面基础设施促进自身发展机会的多样性，也包括不同层次的可用资源以及多样性的学习文化。

对多样性的认识和理解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依靠群体而不仅仅是单体的力量。要将个体或地方层面的反思性实践和自我评估，与在汇集信息的基础上形成的区域和全球行动结合起来。同时，要智慧地评估我们需要什么，因为不是所有的需求都是明确的或一开始就能发现的，有些需求表现出来的只是一些不明显的表面特征。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发现这些需求是国际图联所有志愿者的责任。

最后，重申本报告在“参与”部分提出的观点，我们还要确保拥有广泛的资源来支持学习、发展和创新。某一个地区和群体内行之有效的模式在其他地方可能行不通。我们的责任是尽可能去适应，而不是期望其他领域来适应我们。

G. 我们应积极鼓励提供针对所有人的学习机会，以建立可持续性和领导力

我们应围绕可持续性和领导力提供学习机会。这些主题与所有人相关，贯穿各个领域，也要求我们在处理相关问题时尊重和适应当地状况。

在很大程度上，关注可持续性建议A合乎逻辑的后续，建议A关乎国际图联在为图书馆领域“翻译”全球问题方面的作用。这是30多年来联合国和其他机构工作议程中的重要内容。确保图书馆领域不仅理解相关术语，还要了解其应用于我们决策的方式，是国际图联的一项重要工作。

为了建立这种可持续性，各种工具和材料都可能是有价值的，例如，帮助我们评估面临的环境和需求、拥有的资源和机遇，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广泛的环境，包括图书馆如何融入更广泛的生态系统，以

及不同的问题是如何影响（或可能影响）图书馆领域的。国际图联还应继续努力，将构建评估机制纳入到世界各地图书馆的日常工作中，以便将资源集中在能产生最大效益的地方。

同样，国际图联也可以在建立领导力方面发挥作用。建议9中列出的所有要点在这方面也同样适用。需要明确指出，尽管成为领导者有多种途径，但其核心是承担责任和推动变革。要做到这一点，提供激发新思维的实践案例，向那些愿意站出来的人展示更积极工作（或组织网络）的可能性，为他们提供持续的指引，甚至只是道义上的支持都会有帮助。

正如本建议开头所强调的，我们需要以给予每个人参与机会的方式来提供支持。当然，国际图联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因此，最终的作用可能来自于我们在鼓励和激励其他人成为各个领域的学习提供者或支持者方面所做的努力。

H. 我们应为新兴领导者创造空间，帮助他们为全球图书馆领域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在帮助新兴领导人积累经验、塑造形象方面，国际图联正处于一个良好的时机，正如上文所强调的，现有的组织结构为培养和展示领导能力提供了很多可能性。

他们可以是较为正式的角色（如干事、召集人或理事会成员），通过以协调或其他方式推进的具体项目发挥作用，也可以是在国家、区域或专业组织网络中担任委员会工作的代表。在这方面，新兴领导者应得到导师的支持，或者得到其他专门的帮助，比如为他们创造全新的机会，激励他们作出贡献。

当然，也可以考虑更具针对性的计划，以补充国际图联正式的委员会结构（或者作为后备力量）。国际图联可以借鉴过去的领导人培育计划经验，评估其产生的影响，思考一项国际图联的倡议是如何增值或者填补某些方面空白的。显然，国际图联工作的国际性质以及对宣传和评价的重视提供了一个潜在的重点领域。国际图联也有回报，那就是拥有了一批令人兴奋的新人才，他们在传播良好实践、构建在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等方面的工作颇具成效，希望在未来几十年都能如此。

国际图联还应继续努力，确保提供的会议参与机会符合新兴领导者的需求。应继续向新兴领导者提供专项资助，尤其应考虑到那些没有其他途径参会人

员的需求。会议方案应当考虑到活动规模可能给参会者带来的压力,以及让新兴领导者上台发言的机会,或者优先解答他们在会场上提出的问题。这不仅关乎发言人的体验,还可能由此得到更好的发言案例。

在所有的这些工作中,我们需要确保提供的机会是有意义的。国际图联的目标群体是忙碌的专业人士或学生,他们没有时间参加纯粹理论的学习,并且,考虑到他们改变现状的潜力,纯理论学习也是一种浪费。为新兴领导者提供的参与方式应始终与国际图联正在进行的工作联系起来,这些参与能带来真正的产出,为现实世界带来成果。

四、连接

报告的最后一部分分享了在图书馆领域内以及图书馆与其他领域建立联系的方法。正如报告引言中所强调的,“连接”与报告中的其他主题是紧密相关的,尤其是“参与”主题。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连接”是我们具备达成目标能力的基础,毕竟我们无法仅仅依靠自己完成工作,建立联系可以帮助我们获取新工具和新知识,为我们所期待的“全球图书馆界”蓝图奠定基础。

(一) 对全球图书馆领域的建议

10. 我们必须将与同行建立联系作为工作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建议4已经强调了,“我们同属图书馆领域”不能只体现在口头上,还要让尽可能多的人感受到他们是图书馆领域的一部分。显然,与同行建立业内或私人联系可以帮助人们加强这种感受。

日常工作占据了我們大部分的时间,让我们无暇顾及其他任务,此外还有其他需要我们克服的障碍。其中之一就是图书馆领域工作类型的多样性。显然,国家图书馆文物保护专家的工作与学校或社区图书馆员的多任务处理工作有很大的不同。公共图书馆中的扫盲培训馆员也会觉得自己的工作和研究图书馆或公司图书馆中的学科专家相差甚远。

但是,我们同属图书馆领域,疫情也为许多已有的合作提供了新视角。例如,通过提供可获取的数字化遗产来支持学校的学习活动,鼓励与大学和研究中心有合作关系的图书馆开展公民科学活动。如前所述,让人们养成使用图书馆的习惯(通常指使用学

校、公共或社区图书馆)就可能将他们变成图书馆的终身用户。

因此,机构和角色的差异不应被视为障碍,而应视作一种机会,一种通过技能和资源的互补创造新事物的机会。文化、经验甚至地理上的差异也是如此。正因为图书馆的多元化,才产生了协同合作的可能性。多元化应该成为我们工作和思维方式的核心。

在建立联系时,还应考虑到持久性的问题。例如,机构与机构之间的联系不应仅仅依赖一两个人来维系,而应更广泛和可持续。协会与协会之间的联系也是如此。可以以建立私人联系为起点,但也要做好分享关系网、扩大联系的准备,否则可能就会遭遇发展瓶颈,错失可能存在的机会。

11. 我们应认真对待与合作伙伴和支持者建立联系的相关事宜

“激励”与“参与”主题中的建议强调了不论是在构想中还是在现实中,让图书馆成为更广泛政策领域的一部分都是十分必要的。尽管在价值观、资源和技能方面独树一帜,但图书馆和其他机构在为会员服务方面的心愿是相通的,都希望他们的权利得到维护,个人和社区得以发展。

因此,正如需要充分发挥想象力来思考我们能够产生积极影响的方式,我们在选择合作伙伴时也要持开放的态度。我们需要更加积极主动,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他人也会将我们视为合作伙伴。事实上,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近几年来图书馆发生了多大的转变。

我们可以寻求建立与城市发展和公共卫生领域更紧密的联系。就城市发展而言,图书馆扮演着多功能中心的角色,专注于满足个人需求,这与巴黎等全球中心城市倡导的“十五分钟城市”概念非常接近,然而当下的城市研究文献鲜有关关注图书馆可以做什么,图书馆和信息科学方面的出版物也很少提及图书馆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在公共卫生方面,信息显然非常重要,关系到人们的风险意识,行为举止等。图书馆是一个开放的、欢迎所有人的场所,图书馆员工和馆藏也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已经有一些强有力的案例表明,图书馆正在与公共卫生机构,甚至初级医疗保健供应商合作,为更加健康的生活提供支持,图书馆参与电子健康解决方案已经成为可能。

政府在卫生方面投入巨大,可以考虑并且应该在

建立公共卫生与图书馆的联系方面增加投入,保证将钱花在刀刃上。

还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来加强图书馆和多个领域政策制定者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局限于某一个政策领域。发挥政府和议会图书馆作用,以及图书馆和信息专家在政府和议会层面的作用,都是加强联系的关键所在。与一些没有设立独立图书馆服务的专门机构或地方政府部门合作也很有意义。通过此类合作,可以打通“科学——政策接口”,为信息获取这一使命带来积极改变。

(二) 对国际图联的建议

I. 我们应以创新和有吸引力的方式来建立图书馆领域内的联系

作为图书馆领域的高峰组织,国际图联的纽带作用非常显著。会员和志愿者制度是国际图联的工作基础,让尽可能多的图书馆和信息工作者以及他们所在的机构可以与国际图联建立直接联系。本报告已经对参与国际图联的方式,以及需要为此采取的灵活且富有想象力的方法展开了广泛的探讨。

接下来的工作是,将国际图联从单纯的“中心辐射”模式转变为可以建立直接联系的孵化器。虽然加入国际图联可以促成图书馆领域内联系的建立,但之后的发展和关系维护不需要依赖于国际图联,国际图联也不会参与所有对话或合作项目。

当然,国际图联已经有所行动,通过会议和志愿工作组的方式提供类似场所,但显然还可以提供更多机会,让有共同兴趣和抱负的人聚集起来,开展合作。国际图联应该为这些行动提供一个安全的、半结构化空间,供所有有决心和精力为图书馆领域作出积极贡献的人使用。

为实现这一目标,国际图联可以向其他领域学

习,在结构化和自由(从某种程度而言,两者都是必要的)、提供指导和自主尝试之间寻求平衡。国际图联还要提供支持,帮助解决在建立新联系时可能存在的成本问题。

J. 我们应与新兴图书馆领导者建立联系,支持他们的专业需求

本报告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与新兴领导者合作的重要性,以支持国际图联的宣传工作,让新兴领导者参与国际图联活动,推动他们的职业发展。报告已经用了大量篇幅阐述提供机会,以及以适合新兴领导者的方式响应其需求的重要性。

为了达成上述目标,首先需要确保与新兴领导者建立联系。对国际图联而言,这既是在短期内实现有价值目标的方式,也是让人们参与国际图联工作的一种方式,我们希望能够长久保持这种关系。

同样需要反思的是与新兴领导者建立联系的方式。国际图联的会员中包括了众多图书馆和信息科学研究机构,国际图联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然而,有一些同行还处在学习阶段,国际图联与他们之间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例如,通过加大会员优惠力度,举办竞赛或合作倡议等活动,让人们初步体会参与国际交流的感受。

我们还需要与那些已经离开或从未涉足图书馆专业院校的新兴领导者建立联系。灵活利用社交网络特别是他人的关系网,是建立联系的有效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阐明国际图联可以做什么,这一点已经多次在本报告中提及。但我们还应该发挥想象力,接触那些拥有图书馆和信息专业背景,但已经不再(或从未)在图书馆工作的人。在某些时候,这些人可以成为我们与其他领域沟通的桥梁。

原始报告链接: <https://www.ifla.org/news/a-call-for-radical-hope-ifla-trend-report-update-2022>

译者简介: 屠淑敏,浙江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殷叶玲,浙江图书馆馆员;胡洋,浙江图书馆馆员;杜雪琴,现工作于浙江图书馆。

收稿日期: 2023-02-21

本文责编: 李芳

· 学术论坛 ·

大数据技术赋能：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的向度发展和限度制定研究

马占民

(德州学院图书馆 山东德州 253023)

摘 要: 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技术力量,大数据技术嵌入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能够更为精准地探寻图书馆运行规律,提高文化治理效率。大数据技术赋能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具有协同化、扁平化、透明化等价值向度,具有科学化、精准化、高效化等功能向度。在运用大数据技术赋能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的同时,必须维护数据主权、反对数据垄断,坚持数据共享、强化数据协同,进行风险规避。

关键词: 图书馆;文化治理;大数据技术;价值向度;功能向度;风险规避

中图分类号: G250.7

文献标识码: A

Big Data Technology Enabling: Research on the Direction Development and Limit Formulation of China's Library Cultural Governance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technic of social governance, embedding big data technology into the cultural governance of libraries in China can explore the rules of library operation more precisely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ultural governance. Big data technology enabling for cultural governance of China's libraries features value directions such as synergy, parity, and transparency, as well as functional directions such as being more sound, accurate, and efficient. While using big data technology to empower the cultural governance of libraries in China, we must safeguard data sovereignty, oppose data monopoly, insist on data sharing and strengthen data collaboration, to avoid risks.

Key words library; cultural governance; big data; value dimension; functional dimension; risk aversion

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迭代发展和海量数据的沉积,大容量、快增速、高价值的大数据技术应运而生^[1],并技术支持于我国图书馆运行的各个方面。在人类社会文化演进中,现代科学技术嵌入并耦合图书馆管理实施多维度的互构是社会文化治理的主题。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结构的虚拟性呈现、国际化浪潮的冲击,引发了全球政治、经济的剧烈变化,传统的图书馆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形势。在现代社会背景下,我国图书馆如何依据现代科学技术红利来革新和发展社会文化治理模式,是一个具有探索

价值的课题。大数据技术能够有效嵌入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机制之中,创新治理理念,拓新治理方式,提升治理成效。在文化治理方面,欧美国家图书馆已经将大数据技术赋能上升为国家战略。2015年,我国系统部署大数据发展工作,颁布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该纲要明确提出了“推进大数据技术在全国范围的发展与应用,加快国家数字化和网络化建设”的发展目标^[2]。这为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大数据技术的赋能,促进我国图书馆收集和传输海量信息,开放实施文化治理,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体系中开始出现社会组织、社会个体等不同状态的主体形式,过去那些非公开、非完全信息形式的管理

思维方法,将会被全面整改而彻底改变^[3]。然而,作为一种描述数据真实状态的嵌入式技术,大数据技术并非尽善尽美,会因技术路线缺陷给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带来困难。因此,客观理性地审视大数据技术赋能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的向度发展和限度制定,既是促进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趋向国际化、实现治理机制创新转向的重要意义,也是明确数字技术精进与我国图书馆文化精神演进互动的重要参照。

2 大数据技术赋能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的价值向度

在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中,包含着多个协调统一发生变化的因素,因变化而形成了函数关系的逻辑形式。随着社会时代环境的变迁,作为支撑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的引擎,大数据技术以嵌入式的方式,对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产生深刻的影响。

2.1 大数据技术支撑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走向协同化

无论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还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影响,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总是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参与文化治理的各个主体之间在理念、方式、结果上不一致,无法协同一致,导致出现资源重构、理念割裂、服务短缺等问题。从理念上讲,我国图书馆是一个具有发展张力的有机体,其文化治理能力是持久的、治理标目是协同的;从实践经验上讲,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并非综合集中,图书馆内在的部门状态是分散的,分散状态体现在政体、行政和政策三个方面。在政体建设方面,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中讨价还价或寻求共识的做法就是权威主义的表现^[4];在行政施权方面,山头主义、条块分割、九龙治水^[5]等词语是对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利益碎片分割的描述;在政策实施方面,不连贯、分割管理、分离区域等原则性问题则是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实施的碎片化表现。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的碎片化表现导致主体之间不协同,彼此产生内耗并相互冲突,制约决策的实施,图书馆的高效服务、精准治理难以落实。

作为一项嵌入发展的现代技术,大数据技术赋能我国图书馆,将会在最大程度上促进文化治理的深入实施。对于图书馆文化治理来说,这种内在的、自动的赋能机制就是治理协同性的体现。协同治理的实现需要以信息对称为前提条件,而大数据技术能够解

决图书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大数据技术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赋能:一是数据整合。我国图书馆现有的信息数据种类多、格式不一,要真正将海量的信息数据转化为信息资源,就必须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实现数据的整合,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基础性问题。二是数据挖掘。数据挖掘是确保协同一致的实施手段,实施信息匹配和信息整合来消除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中的隐患。以数据挖掘为手段,遵循数据运行规律,可以增强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主体的协调性。三是数据预测。大数据技术赋能我国图书馆,主要作用在于分析信息数据,预判文化治理主体行为,提升文化治理主体的协调性。总之,大数据技术赋能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缓解因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治理主体之间的矛盾,促进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实施的协同与和谐。

2.2 大数据技术支撑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走向扁平化

实践证明,我国图书馆界文化治理理论研究中治理层级与治理幅度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般情况下,治理层级与治理幅度之间呈负相关,即治理层级越多,治理幅度越小。在传统理念中,图书馆的治理能力受限于信息资源的多少、技术工具的强弱,可以通过增加治理层级、缩小治理幅度来达到治理目标。但是,治理层级过多、治理幅度过小会出现:一是运转成本、实施效率问题。增加治理层次促使更多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引发图书馆信息数据体量增大,随之运行负担增加。同时,因治理幅度缩小导致信息发布时间延长、信息传输路径减少,这降低了图书馆运行效率。二是协调成本问题。治理层级的增加会导致数据协调的频次暴增,这很大程度上聚集了图书馆文化治理体系的风险和矛盾,也增加了图书馆治理结构中的协调成本。三是主体异化问题。治理层级的增加引发了主体数量和主体复杂程度的增加,导致在图书馆委托代理数据使用中产生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治理层级越多,主体被异化的可能性越大。

大数据技术的嵌入,促使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结构转变至治理幅度大、治理层级少的扁平化状态。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的扁平化,不仅表明了治理层级的减少和治理成本的降低,更加表明了文化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具体来说,大数据技术支持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

升了我国图书馆信息处理能力。通过大数据技术实施集约化、大批量化信息处理,减少了成本,扩大了范围。二是缩短了图书馆信息数据传输路程。无大数据技术支持,信息数据传输只能依赖于层级制约的科层体系,传输路径偏长,运行速度慢,效率低。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传输信息数据,促进信息沟通超越了科层制行为模式,趋向于扁平化、去中心化,运行速度快,效率高。可见,大数据技术的实现,从表面看仅仅是促进文化治理的层级之间沟通更为畅通,但实际上是大数据技术正在支撑一场渐近的文化治理革命,促进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层级走向扁平化。

2.3 大数据技术支撑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走向透明化

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的本质意义是行政权力运行的场域作用。权力规范运用的前提是加强权力运行的监督,监督是完善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的关键环节,也是全面优化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环境的重要保障。监督意味着在制度的约束下实施权利,然而实施监督并不是顺畅的,监督必然会遇到阻碍,因此在我国图书馆工作实践中,会出现监督乏力、监督缺位情况,这是由多个原因造成的:一是监督的自主性得不到保障。实际上,监督的力度和范围很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导致其客观、公平立场受到侵蚀。二是监督力度是有限的。监督应是持久的,但面对庞大的组织机构,很难做到全面系统的监督,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图书馆是“除了受到偶然性监督之外,对其实行任何实质性监督都不过实际的期望而已”^[6]。三是权力本身欠缺监督的“氛围”。无监督“氛围”的情况下实施权力,会影响到图书馆的全局发展。监督的乏力说明监督本身出了问题。因此,如果监督缺少了公平性,就有可能扰乱我国图书馆的治理秩序,造成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

实践已经证明,大数据技术赋能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能够简化监督程序,提高监督执行率。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表现监督的客观性。大数据技术支撑主要是整合信息数据,结合服务清单、权力实施清单进行对比分析,来监督我国图书馆行为。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监督过程,人为干涉的因素少,能够保证客观公正。二是增进监督的全面性。因人力、物力有限,对图书馆治理的全面监督是困难的,由此也在组织者中产生了机会主义和侥幸心理。大数据技术的数据要素分析能够对我国图书馆主体

进行精准匹配,通过分析比对,在短时间内完成监督任务,这样弥补了定时、定期监督的缺陷,确保实施全面、系统的监督措施。三是提高监督的前瞻性。图书馆在信息数据的挖掘、匹配的基础上,进行大数据技术数据要素分析,描述现象,发现规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监督实施的效率,以此提高监督的前瞻性。

3 大数据技术赋能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的功能向度

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呈现的是一个层次分明、复杂多样的系统,大数据技术的支撑运作,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操作过程,而是一种理念发生深刻变化的化学反应过程。大数据技术赋能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的功能向度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

3.1 大数据技术支撑我国图书馆决策走向科学化

决策制度制定与实施是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的重要内容。科学执行决策会对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产生推动效应,影响着信任程度和效益效率,因此决策的科学化执行一直是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要求达到的目标。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行政机关在我国图书馆事务决策中处于领导地位,尤其是决策权高度集中在行政机关,所以就会出现有些事务“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7]。这种民主程序导致我国图书馆事务决策效率低下。现实社会中,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决策的科学性欠佳、有效数据支撑少。然而,大数据技术支撑海量数据的逻辑分析,可以多向度分析、挖掘治理决策的内在规律,实施交叉验证,提高决策的精准度。大数据技术的实施实质上是一种扁平化的数据传输和技术改造方式,这种扁平化方式也符合我国图书馆事务决策的科学化标准。

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决策之所以能够被大数据技术所支持,是因为大数据技术具有弥补文化治理缺陷的功能。大数据技术驱动我国图书馆决策的战略意图是非常明显的,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中的供需关系经常出现结构性短缺,进而导致治理层次出现或多或少的现象,对我国图书馆的事务决策造成不良影响。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上,如果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的层次忽多忽少,就会影响我国图书馆事务决策的准

确性和精准性。如果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分析、统计我国图书馆事务决策中的海量数据,就会预算出今后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的供给规模,并革新供给结构。通过对我国图书馆信息供需关系的分析,明显看出大数据技术支持我国图书馆制定政策的力度和支撑我国图书馆作出科学决策的强度。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的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决策,依赖的是大体量信息数据,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日趋成熟,其将成为我国图书馆科学决策的重要推手。

3.2 大数据技术推动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走向精准化

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具有面广量大、繁杂细致、碎片化等特征,导致文化治理的有效措施落实得不精准。随着大数据技术的运用,图书馆海量信息数据得以科学处理,实施数据挖掘和信息制定措施,达到了文化治理的精准程度,从而也提高了治理效率。

我国图书馆不仅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互联网数据分析,还嵌入非互联网实施大数据文化治理的数据分析。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中所实施的数据转化促进了大数据技术更为广泛的应用,不断扩展着大数据技术的作用场域。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促进运行空间更加开放、运行方式更加简捷、运行效果更加精准。

3.3 大数据技术驱动我国图书馆公共服务走向高效化

由于图书馆文化治理中不可分割性、不可排他性因素的存在,引发了图书馆公共服务的“搭便车”问题,图书馆公共服务时常处于低效状态,为此我国图书馆的公共服务不能只是简单地依赖社会机制来配置。我国图书馆公共服务低效化的另一个诱因是供给的非均等化。非均等化问题导致我国图书馆的公共服务不仅在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之间不平衡,而且在供需之间也不平衡,导致短缺与过剩并存等一系列问题。

社会公共服务新理论的出现,促进了我国图书馆信息供需平衡问题的研究,也超越了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的研究,推动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研究及时转入“人的精神”层面。我国图书馆实施公共服务不仅要公平公正,提高效率,还要做到人性化、温情化。尤为重要,进入新时代,社会民众对图书馆的要求,尤其是在公共服务上的要求,也已经达到了一个新水平,这要求现代科学技术赋能,与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理念相匹配,来驱动公共服务趋向高效化,而作为代表先进性的大数据技术能够起到支撑作用,能够

满足我国图书馆高效化发展的需求。在常规技术条件下,图书馆很难做到为所有信息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但是在大数据环境下,我国图书馆的公共服务可以结合每一位信息用户获取信息的习惯进行综合测算,给服务对象以最为合适的获取信息的路径。

4 大数据技术赋能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的风险规避

作为嵌入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实施的现代技术,大数据技术本身就是一种客观、中立的实用性工具。同时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也是一个具有价值观念的行为,因而大数据技术支撑文化治理会保留着主权偏执、安全风险等问题,我国图书馆必须具备有效规避和应对的能力。

4.1 实施数据主权的维护

数据主权是“在大数据、云计算背景下,一国对本国的数据及本国国民的跨境数据拥有的控制权、管辖权和使用权,是国家数据主权和个人数据权利的总和,体现为对内的最高数据管控权和对外的数据处理权”^[8]。现实情况下,数据主权给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带来了一定的冲击,表现在数据输出、数据部署和数据统治等对文化治理的影响上。

我国图书馆的信息安全是建立在社会竞争基础之上的,而大数据技术的实践操作也会推动社会竞争力的提高。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撑下,图书馆的信息竞争是一场无形的“战争”,它不是简单的信息争抢,而是对数据的掌控。随着大数据平台建设战略规划的提升,我国图书馆所进行的信息博弈和数据竞争将会更加激烈。在我国图书馆数字化工程建设中,大数据技术能够提升数据挖掘效能、改进智能操作方式,从而进一步促进文化治理的全面升级,提高社会竞争力。通过大数据技术的信息分析、信息监控等手段,支撑我国图书馆社会网络舆情建构,理清文化意识的方向,提升国际话语权。

我国图书馆是一个行使自主权的社会组织形式,其大数据的信息研究和数据挖掘能够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提供参考,协助社会管理机构制定社会治理决策,督促管理社会措施的落实,在预防重大安全事故发生上发挥重要作用。运用大数据技术,促进我国图书馆的数据分析和信息预判在社会发展中发挥越来越

越重要的作用,大数据技术支撑的信息数据也成为国家之间竞争发展的必然之物。可以说,谁掌握了大数据的信息主动权,谁将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势。总之,我国图书馆要切实维护数据主权,将文化治理提升至国家社会战略层面。一旦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我国图书馆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挖掘的信息数据资源不仅是实现国家科学治理的重要资源,还是国际竞争的关键资源。

4.2 实施数据隐私的保护

我们要从实施技术改造的可靠性上考虑我国图书馆数据隐私的保护问题。大数据技术支持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技术运用、道德思想约束、制度实施制约等问题。我国图书馆通过数据分析来驱动决策部署,也需要大数据技术的支撑。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是以数据分析来推动决策实施的,遵循“数据—信息—决策”的直通路径,这说明图书馆要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出有效信息。但是在图书馆实践中,数字信息是由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元化混合数据化形式组成,“大数据的异质性、规模性、及时性、复杂性以及隐私问题,都阻碍了数据价值的获取”^[9]。可见,大数据技术有效推进我国图书馆决策的同时,也带来了管理方面的挑战,引发了数据隐私不能被彻底保护等问题。为此,我国图书馆具有数据挖掘、数据获取的能力对文化治理决策至关重要。我国图书馆在文化治理领域的规划与决策质量,依赖于客观信息的大数据技术的分析、收集和解释,并能够进一步发现文化治理趋势和优化决策过程。另外,大数据技术所支撑的是全局数据,所以在对文化治理的支撑上运用价值很高,无论是系统生成的数据,还是人力收集的数据,都是局部的、区域化的,若以局部数据代替全局数据实施逻辑分析,则会出现结论偏失的风险。

从数据属性来看,虽然大数据技术实现的是我国图书馆公共服务的高效化,但是这是在一定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实现的。图书馆信息传输平台对用户的选择、浏览、收藏进行分析,从而掌握用户信息需求状况,以准确推送信息为用户服务,这实际上是对信息用户个人隐私的一种监控,这一过程存在对信息用户隐私权的侵犯。图书馆的信息传输采用大数据技术,其背后有很大可能隐藏着道德风险,这给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的大数据技术的运用提出了警示。

4.3 实施数据关系的协同

大数据在本质上是一种客观、中立的信息资源,需要借助一定的信息组织结构才能发挥作用。如果在信息技术上受到限制,信息组织结构中出现区域隔断,信息环境处于封闭状态,则会引发大数据鸿沟。大数据鸿沟的出现加剧了数据分化,出现了数据落差,这对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的协同化形成了挑战。

在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过程中,我们要倡导反对数据垄断,强化数据协同。我国图书馆应从信息用户的信息需求利益出发,实施信息数据的开放和共享,把利用大数据资源优势扩大至社会最大范围,形成信息竞争和信息输出结果的公平性。另外,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要关注拆解数据围墙,强化社会协同。文化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治理主体涵盖政府组织、企业单位,群团组织、社会个人,范围较为广泛,因而协同文化治理主体是非常有必要的。大数据技术支持“全数据”的形成,而文化治理主体的协同有助于形成整合性的全局信息,文化治理中的数据围墙需要大数据技术来拆解,需要大数据技术支持的文化治理协同来予以化解。

5 结语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嵌入性发展,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的多为耦合和深度互构模式已经在深刻地改变着社会文化治理方式。当前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模式可以全方位地塑造图书馆发展的未来图景,并且在大数据技术的赋能下,我国图书馆的组织结构将会实现层级的扁平化、决策的科学化、服务的精准化和主体的协同化。但是,这些大数据技术主导的治理红利只能说明治理的有效结果,并不是大数据技术治理作用的全面奏效,也不代表着图书馆可任意、自由地发展。

在现实社会中,大数据技术会在社会利益的驱动下变得不再中立平衡,数据垄断、技术霸权等治理隐患会给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带来阻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以治理的协同化打破数据垄断、消除技术霸权。这是大数据技术赋能我国图书馆文化治理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也是今后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下转第25页)

· 学术论坛 ·

基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书香社会建设思路与实践

——以“书香东莞”建设为例

施志唐

(东莞图书馆 广东东莞 523000)

摘要: 东莞在2020年提出“品质文化之都”建设目标,打造高品质“书香东莞”,2021年进一步提出以“书香镇街”行动为抓手,实现“书香东莞”提档升级。通过制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明确“书香镇街”创建的必备要求和创建标准。在指标体系制定和推行过程中,东莞以目标明确、制度保障、体系整合、技术支撑为思路,通过党政引导,部门协同;调研分析,指标构建;技术支撑,平台支持;独立测评,树立标杆等具体实践,实现“书香镇街”行动进一步推进。

关键词: 全民阅读;书香社会;书香镇街;指标体系;东莞

中图分类号: G252

文献标识码: A

Scholarly Society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larly City in Dongguan as an Example

Abstract In 2020, Dongguan proposed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a quality culture city" and create a high-quality "Scholarly Dongguan". In 2021, it further proposed to take the campaign of "Scholarly Town"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upgrade "Scholarly Dongguan".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the requirements and standards of "Scholarly Town" are clarified. While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index system, Dongguan clarifies its goals, builds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integrates various systems, and strengthens technical support. Dongguan insists on being guided by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strengthens cooperation among various departments; build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s after research and analysis. It aims to do a good job of technical support and establishes facilitating platforms. It also conducts independent evaluations and strives to set examples to follow for other cities. That is how "Scholarly Town" can be achieved.

Key words nationwide reading; scholarly society; scholarly town; index system; Dongguan

1 书香社会指标体系研究与实践现状

1.1 国外实践现状

书香社会建设在国外主要是以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形式存在,发达国家的政府、公共图书馆、学校及其他社会机构每年都会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活动提高公众阅读素养^[1]。为了评估阅读推广成效,国外很早就进行阅读推广评估,评估方式多样。根据评估

范围可分为综合阅读评估和专项阅读评估,如英、美、法的综合性国民阅读调查评估,美国“消费者调查”、英国“阅读与写作调查”、德国“最喜爱的娱乐休闲活动”等专项阅读调查评估。根据评估对象可分为面向所有人群阅读评估和面向特定群体评估。面向特定群体评估在欧美主要是对青少年综合阅读能力的评估,如英、法未成年人阅读调查项目和美国国家教育进展评估项目等。根据评估主体,可分为由项目方独立评估、第三方独立评估和多方合作评估,

如加拿大“暑期阅读俱乐部”的评估工作由活动主办方和第三方机构共同完成,英国国家图书馆组织的“夏季阅读挑战计划”通过委托市场调查公司独立进行数据收集和评估。按评估指标体系涵盖范围可分为综合性指标和活动成效指标,如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开展的“一城一书”(One city, One book)活动评价指标涵盖经费保障、阅读设施、馆藏资源、服务均等化及阅读推广效果等范围,由多个国家或地区共同发起的“阅读起跑线”(Bookstart)计划则重视活动推广经验和评估活动成效^[2-4]。

总体而言,国外阅读推广评估起步早,发展成熟,特点鲜明。主要体现在评估主体相对独立,评估对象偏向未成年人,评估方式多样,重视定量或量性结合,评估内容偏重活动推广及阅读成效,评估常态化。

1.2 国内实践和研究现状

国内自2014年起,“全民阅读”每年都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10月,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明确深入推进全民阅读,树立典型加强宣传^[5]。2012年,张家港推出首个覆盖城乡的书香城市指标评价体系^[6]。2016年,江苏省制定了数量多达138个指标的评价体系,涵盖“书香城市”测评的方方面面^[7]。近年来,包括深圳、杭州等多地纷纷推进书香城市建设,推出适合当地实践的指标体系。

在指标体系研究方面,许多学者基于不同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但在实践中由于各地情况差异太大,目前还没有一套具有普适性的通用指标体系。在指标的维度构建方面,李婷、杨海平^[8]基于政策因素等方面考虑,从体制机制、资金资源、组织人员、阅读行为、阅读绩效5个维度构建了一套包含192个指标的评价体系;康健、祝小宁^[9]基于均等化视角,从政策环境、公共设施、阅读服务、阅读行为和满意度等维度构建了一套包含91个指标的评价体系。为解决指标体系共性问题,李雅等人^[10]综合分析了我国指标体系构建现状,提取了阅读设施、阅读资源、阅读环境、阅读保障和阅读成效5个共性维度。这些指标体系从书香社会构建的不同维度考虑,科学客观、覆盖面广,但难以适应不同城市实践,而且指标数量越多,操作难度越大。

在推进措施方面,多数学者认为需要政府引导、政策保障、加强宣传和多种措施协同。郭添泉认为应

以政府、公共图书馆、传媒和公民个体等多元主体角度进行阅读内容建设、阅读服务提升、阅读文化渲染和建设效果评估^[11]。孙杨等人^[12]则认为应从政策、组织、经费和人才方面提供保障,打造品牌吸引力,搭建信息平台,加大宣传力度,线上线下结合进行推进。在实践上,武汉设立“全阅办”全权负责,实质上也是以政府引导方式推进^[13]。这些措施为东莞实践提供了有益参考。

1.3 东莞书香社会发展现状

东莞自2005年举办首届读书节起就一直进行全民阅读推广。2020年,东莞制定实施了《全力打响东莞文化品牌加快建设“品质文化之都”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明确推进书香社会建设,推出适合本地实际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打造高品质“书香东莞”。作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东莞目前已经具备完善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体系,并已出台《东莞市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保障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在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建设方面不断完善和深化。截至2021年底,东莞已建立起1个总馆、52个分馆和102个图书流动车服务站的分布格局,实现了自助借阅服务全市覆盖,形成总馆、分馆、服务站、图书流动车、自助图书馆、城市阅读驿站和绘本馆等多层级、多形态的体系化布局^[14]。2020年度东莞全民阅读指数一直位居广东前列,成效明显,但是,东莞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存在^[15-16]。为落实高品质“书香东莞”建设目标,东莞在2021年起通过“书香镇街”提升行动,建立测评指标,重视基础,以评促建,树立标杆,以点带面,最终实现高品质“书香东莞”目标。

2 东莞“书香镇街”指标体系建设思路

2.1 明确目标导向

评价指标具有导向性,应明确指标体系目标导向,以“品质文化之都”战略目标定位,确保指标体系与“书香东莞”建设相适应。目前,东莞全民阅读基础建设不平衡不充分,局部基础薄弱和部分品质高端同时并存。因此,指标体系应明确基础和提升两大方向:一是保障基本投入,指标体系必须体现对基本阅读设施和服务的保障;二是激励高品质阅读文化活动品牌的创建,促进各镇街发掘特色阅读文化、创新阅读活动,促使阅读活动特色化、高端化和品牌

化；三是保持目标导向总体稳定，根据形势和现实情况适时微调，维持目标导向的稳定性、连续性，确保“书香东莞”建设大方向和总体目标不变。

2.2 落实制度保障

落实制度保障是“书香镇街”测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基础。开展“书香镇街”指标测评必须建立制度要求，落实制度保障。保障措施从制度要求和组织保障两方面开展：一是建立保障制度，在现有管理体系上强化工作要求，优化工作流程，使得数据上报和考核反馈有规可依，流程规范；二是落实组织保障，由政府相关部门联合推动，明确各责任主体在书香社会构建过程中的职责和任务^[11]，成立工作小组或由某一部部门牵头落实，落实“书香镇街”测评工作。

2.3 整合现有体系

为了提高“书香镇街”测评工作的可操作性，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推行必须依托现有体系，整合现有资源。东莞市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和东莞读书节运行机制已经有一套成熟的基础流程和范式，应该厘清当前基础体系架构，整合现有资源实施新的测评指标。在指标构建方面，结合国家及广东省相关政策，参考省内外指标体系，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构建全民阅读领域指标体系，尽可能减少指标总量，确保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可实施性。在实施层面上，依托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和东莞读书节全市阅读活动，加大社会宣传，提高社会参与，推动测评工作落实，提高测评工作的可操作性。

2.4 架设平台支撑

综合指标评价的长期发展必然需要信息化平台支撑，刘旭青等人在其文章中阐述了评估信息化的必要性^[17]。信息化能提高测评工作效率，但是由于测评工作的复杂性，应该针对测评工作的不同主体、特定范围、特定任务提供处理子系统。系统平台应建立数据常态采集和监测机制，优化数据采集和管理流程，促进指标体系制定、决策的科学化，保障测评过程客观化和准确化。在系统规划过程中，需要分析和确定好目标需求，细化功能，选择适当的技术平台，预留数据接口，为系统智能化、互联互通做好准备。

3 东莞“书香镇街”指标体系建设实践

3.1 党政引导，部门协同

“书香镇街”测评指标以东莞读书节举办为契机，以“党政引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广泛宣传”模式推出，并作为各镇街建设“书香东莞”的具体行动目标。2021年东莞读书节工作方案提出“书香镇街”行动起步试行，逐步推进，五年内所有镇街（园区）达到“书香镇街”要求。工作要求以文件形式通过各部门协同下发，辐射至全社会。同时，广泛发动媒体宣传报道，形成社会宣传效应。随着“书香镇街”行动的推进，测评工作的制度要求及保障作用将逐步增强，推动各镇街落实要求。

3.2 调研分析，构建指标

在指标的构建过程中，指标模型的构建立足于“书香东莞”建设全局，以效能为导向，拟定基础性和必备性指标。

3.2.1 指标构建

在调研分析阶段，东莞图书馆结合《广东省“书香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借鉴江苏、深圳等地的具有代表性的国内相关指标体系，同时调研东莞文化体系建设和发展相关规划，参考历届东莞读书节工作方案，并在长期绩效管理研究和实践基础上，制定出一套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指标体系作为初始指标。

为了保证测评结果的公正性、全面性和科学性，在保持“书香镇街”测评指标总体框架稳定的前提下，东莞图书馆召开多次专题研讨会修正指标，厘清指标架构，调整指标体系，明晰指标含义，确定指标权重。必备基础性指标体系的制定是一个从少到多再从多到少的过程。首先是从本地实际出发，在初始指标基础上继续丰富和扩展指标体系，使得指标体系覆盖全面。其次是投票选出若干基础必备性指标，合并相似指标，剔除得票较少的冗余指标和无法操作的指标。最后是讨论确定指标数量，选出具备基础性和必备性的指标体系。

3.2.2 指标测评

为提高指标体系的合理性和准确性，东莞图书馆一是组织专家投票形成镇街排名作为参照；二是收集历史数据，通过模拟运算、可视化分析等手段，定性和定量分析各镇街的评估结果，并参照镇街排名，反复调整指标权重。在模拟测评过程中，大多采用2019年或之前的数据，避免疫情因素影响而使数据失真，定性数据由专家打分获得，问卷调查数据留缺。

测评综合得分采用相对分计算方法。首先，对

任意一个二级指标,将指标值进行离差标准化,得到 $[0, 1]$ 区间的值乘以指标分值的积即为该指标得分。其次,对任意一个镇街,累加所有二级指标得分即为该镇街综合得分。用公式表示,即第 i 个镇街的综合得分为:

$$s_i = \sum_{j=1}^m \left(\frac{x_{ij} - \min_{1 \leq i \leq n} x_{ij}}{\max_{1 \leq i \leq n} x_{ij} - \min_{1 \leq i \leq n} x_{ij}} \right) w_j, i \in [1, n], j \in [1, m] \quad (1)$$

其中, S_i 表示第 i 个镇街综合测评得分, w_j 表示第 j 个指标的分值,这里要求指标分值 $w = \sum_{j=1}^m w_j$ 之和为1 000, x_{ij} 表示第 i 个镇街第 j 个指标的值, $\max_{1 \leq i \leq n} \{x_{ij}\}$ 表示针对第 j 个指标在所有镇街中取最大值, $\min_{1 \leq i \leq n} \{x_{ij}\}$ 表示针对第 j 个指标在所有镇街中取最小值。

综合得分后镇街综合排名为 $\{r_i\}$,专家投票镇街排名为 $\{R_i\}$,其中, r_i 表示测评中第 i 个镇街的名次, R_i

表示专家投票中第 i 个镇街的名次。那么,只要找到一组分值 w_j ,使得总排名差值 d 尽可能小,就能够找到符合专家期望的分值。 d 的计算公式如下:

$$d = \sum_{n=1}^m |r_j - R_j| \quad (2)$$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直接找最小分值组,而是根据一般经验,参考其他省市指标体系提出几组分值分配方案,同时满足总排名差值较小,最终由专家研讨选定。

3.2.3 确定指标

最终,确定了一套包含5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的指标体系。指标体系涵盖阅读设施、阅读资源、阅读服务与活动、书香成效和保障条件5个方面,包含了17个直观量化指标,2个专家评价指标和1个问卷调查评分指标(见表1)。

表1 2021年东莞市“书香镇街”测评指标

序号	指标名	单位	分值	指标解释与说明
1	阅读设施		200	
1.1	镇街(园区)图书馆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67	1、镇街(园区)级公共图书馆单馆建筑面积,不含职工宿舍及临时建筑。2、评估前已立项并开工的图书馆面积(含正在扩建、尚未竣工的建筑面积),按1/2计算,待完工后计算全部面积
1.2	每千人拥有公共阅读设施面积	平方米/千人	50	镇街(园区)图书馆、农家书屋、村(社区)图书室、城市阅读驿站(粤书吧)等建筑面积的总和/常住人口数*1 000
1.3	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图书馆(室)、实体书店数量	个	50	包括学校(不含幼儿园、高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等设置的图书馆(室)和实体书店数量(书店营业面积100平方米以上,提供图书品种5 000种以上)
1.4	阅读氛围设施数量	个	33	指街道、车站、集贸市场、商场、广场、居民小区等人流密集场所设置报刊亭、公共阅读栏(屏)、电子阅报屏数量
2	阅读资源		200	
2.1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室)藏书数量	册/人	80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实体文献资源数量/常住人口数(按Interlib系统数据计算)
2.2	人均年新增公共图书馆(室)藏书数量	册/人	80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一年内新入藏实体文献资源数量/常住人口数(按Interlib系统数据计算)
2.3	学校图书馆、职工书屋、农家书屋藏书总量	万册	40	学校(含幼儿园、不含高校)图书馆、职工书屋、农家书屋藏书总量
3	阅读服务与活动		200	
3.1	读书节活动场次	场次	50	参加及举办市镇两级的读书节活动场次
3.2	培育阅读品牌数量	个	50	培育地方阅读推广品牌项目,持续开展两年(含)以上,获得市级以上表彰认定,有较好引领方向和示范作用,具有一定品牌效应
3.3	镇街(园区)图书馆每周开放时间	小时	50	镇街(园区)图书馆单馆一周内开放的小时数
3.4	特殊群体服务		50	定期开展特殊群体阅读关爱服务(本指标所指“特殊群体”,包括但不限于少年儿童、老年人、残疾人、进城务工人员、监狱服刑人员等)
4	书香成效		250	
4.1	阅读状况调查		25	定期对各镇街(园区)人均年阅读量、公众综合阅读率、公众阅读满意率、家庭阅读状况等进行调查
4.2	公共图书馆(室)年人均到馆量	次/人	50	镇街(园区)图书馆、村(社区)图书室、城市阅读驿站(粤书吧)等年到馆总人次/常住人口
4.3	公共图书馆(室)年文献外借量	万册次	50	镇街图书馆以及辖下联网服务点借书册次(按Interlib系统数据计算)

续表

4.4	图书馆持证读者占比	%	25	镇街图书馆以及辖下联网服务点年有效读者证数 / 常住人口 *100% (按 Interlib 系统数据计算)
4.5	数字阅读量	次	50	各镇街 (园区) 图书馆数字阅读量 (以目前可统计可测量的数据为主, 包括社区网络学堂扫码阅读次数、东莞数字图书馆访问次数、电子书下载量等)
4.6	阅读活动参与人次	人次	25	政府部门主导、各方力量承办的各类阅读活动的参与人次
4.7	书香话题媒体报道	条	25	市级及以上各类媒体 (含传统媒体和新媒体) 对当地书香话题的报道情况
5	保障条件		150	
5.1	制定“书香镇街”阅读促进和保障政策、阅读发展规划等		50	由党委政府主导, 制定本地区关于推进全民阅读的有关政策、规划等文件, 从组织、经费、人才、机制等多个方面进行组织与引导
5.2	公共图书馆年人均财政拨款	元 / 人	100	镇街财政拨款给公共图书馆年度经费 / 常住人口数。财政拨款包括本级财政所拨的文献购置费、运行费、人员经费、专项经费等全部拨款, 不含新馆建设和装修的经费

注: 表中指标分值仅为初定版本。

3.3 技术支撑, 平台支持

为满足测评工作需要, 东莞图书馆通过搭建“书香镇街”评估系统提供技术支撑。系统基于 SpringBoot+Mybatis+Mysql 实现, 按照业务需求划分为数据采集模块、指标管理模块、测评模拟与分析模块等。总体上, 系统有以下特性: 第一, 满足数据报送工作、指标管理与测评打分的需要, 为模拟测评提供有效的软件支撑, 提高测评效率; 第二, 支持管理员、镇街用户和专家不同用户主体的需要, 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数据同步和信息互联互通; 第三, 支持实现数据可视化分析, 通过提供多维度、多种类和自动化的数据综合分析, 完成普遍化、常态化的测评任务, 提高测评的可信度, 确保测评流程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第四, 系统拥有良好的稳定性, 数据安全性, 满足数据保密需要; 第五, 支持多端用户, 系统提供 PC 端和移动端入口, 方便用户灵活参与数据报送和测评分析。系统在 2020 年底启用, 各镇街相关人员参与数据报送, 形成每月数据报送制度, 可实时生成测评结果, 提高测评效率。同时, 研究人员能够及时了解镇街基层数据变化情况, 掌握数据变化趋势, 为以后完善指标做好准备。

3.4 独立测评, 树立标杆

为了体现测评客观性和公正性, 测评由第三方评估机构按照指标要求独立完成。测评由 3 个部分组成: 一是基于数据的计算, 根据指标收集数据, 计算指标值; 二是专家调研评分, 由调研机构协同专家实地调研, 按照指标要求评审材料评分; 三是阅读调查, 设计问卷调查, 在网上进行用户调查, 并汇总评分。

综合得分经过排名后形成综合排名, 在综合排名基础上, 选出 5 至 8 个镇街作为东莞市首批“书香镇街”, 树立标杆, 以点带面, 最终实现“书香东莞”建设达标。

4 结语

东莞市“书香镇街”测评指标是在图书馆绩效管理的实践经验基础上, 以其他省市的相关指标体系为借鉴, 经过反复的专家研讨和模拟测评而建立的一套适合东莞本地实际的测评指标, 也是一套以效能为导向、易于操作、易于实施的评价体系。目前, 东莞“书香镇街”测评正在推进中, 由于各种因素, 测评指标体系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但随着“书香东莞”建设逐年推进, 测评指标将不断完善, 助力东莞进一步推进“品质文化之都”建设。

参考文献:

- [1] 富琳. 国外全民阅读面面观及其启示[J]. 图书馆学研究, 2014(18): 76, 84-87.
- [2] 屈明颖. 国外阅读调查与评估发展历程述略[J]. 出版与印刷, 2019(1): 41-49.
- [3] 朱伟, 于凤姣. 国际阅读评价研究对我国阅读教学的启示: 以 PIRLS2011 和 PISA2009 为例[J]. 上海教育科研, 2012(4): 52-55.
- [4] 王学贤, 魏祥丽. 加拿大“暑期阅读俱乐部”评估实践与启示[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21(5): 71-76. DOI:10.16384/j.cnki.lwas.2021.05.010.

- [5] 中宣部.《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EB/OL].(2022-03-04)[2022-07-12].<https://www.wzlib.cn/gxjz/zcywj/31830.html>.
- [6] 佚名.张家港发布全国首个“书香城市”指标体系[J].领导决策信息,2012(49):18-19.
- [7] 中国长安网.江苏创建“书香城市”[EB/OL].[2021-11-12].http://www.c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28591/2012-12/14/content_11963104.shtml.
- [8] 李婷,杨海平.书香社会综合指标体系构建[J].中国出版,2016,383(6):12-17.
- [9] 康健,祝小宁.均等化视域下的全民阅读指数测评指标体系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20,476(9):65-71.
- [10] 李雅,周梦瑶,费巍.我国书香社会建设指标体系比较分析和优化[J].图书情报工作,2018,62(15):41-48.
- [11] 郭添泉.论书香社会建设的内涵、主体与措施[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8(24):127-128,130.
- [12] 孙杨,张鹏,彭立.基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书香社会建设探讨:以西安市书香城市建设为例[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8,30(6):113-118.
- [13] 夏立新,李成龙,孙晶琼.全民阅读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探索:以《武汉市全民阅读综合评估指标体系(试行版)》为例[J].图书情报知识,2015,166(4):106-112.
- [14] 东莞图书馆.图书馆之城介绍[EB/OL].[2021-11-12].<https://www.dglib.cn/dglib/tsgjs/201511/c2507d77143a45399abf835afd0450c1.shtml>.
- [15] 东莞日报.一定要着力解决好东莞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EB/OL].[2021-11-12].https://epaper.timedg.com/html/2018-03/16/content_1526034.htm.
- [16] 许垂龙.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的实践与探索[J].上海文化,2014(3X):23-26.
- [17] 刘旭青,柯平,刘文宇.公共图书馆评估信息化[J].数字图书馆论坛,2017,156(5):8-17.

作者简介: 施志唐, 东莞图书馆馆员, 研究方向为机器学习、智慧图书馆。

收稿日期: 2022-10-09

本文责编: 王晓琳

(上接第19页)

参考文献:

- [1] 陈潭,等.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治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9.
- [2] 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EB/OL].[2022-04-17].<https://wenku.baidu.com/view/3f45a884de3383c4bb4cf7ec4afe04a1b071b003.html>.
- [3] 陈潭.大数据驱动社会治理的创新转向[J].行政论坛,2016,23(6):1-5.
- [4] LIEBERTHAL K, OKSENBERG M. 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22.
- [5] 朱光磊,张志红.“职责同构”批判[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2005(1):101-112.
- [6] 韦斯特.控制官僚:制度制约的理论与实践[M].张定淮,白锐,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152.
- [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8.
- [8] 杜雁芸.大数据时代国家数据主权问题研究[J].国际观察,2016(3):1-14.
- [9] ANURADHA B, GAURAV V. Big data—a review[J]. IEE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Sciences & Research Technology IJESRT, 2013(5):38-46.

作者简介: 马占民, 德州学院图书馆馆员, 研究方向为理论图书馆学。

收稿日期: 2022-07-27

本文责编: 王晓琳

我国图书馆读者参与研究：观念演化、主题分布与发展趋势

章先贵

(西藏农牧学院图书馆 西藏林芝 860000)

摘要: 重视读者的价值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传统,网络时代图书馆服务意识的提高与技术推动下图书馆读者参与的深入与普遍使当前图书馆读者参与研究得到快速发展。文章在对相关研究文献计量分析的基础上,从理论构建、实践领域与个体行为分析三个维度对我国图书馆读者参与研究进行系统梳理,总结研究特点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 图书馆; 读者参与; 理论构建; 实践研究; 个体行为

中图分类号: G252.8

文献标识码: A

Library Reader Participation Research in China: Conceptual Evolution, Subject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s

Abstract Valuing the reader is an important tradition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in China. The increased awareness of library services in the internet era and the deepening of library reader participation driven by technology have led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urrent library reader participation research. Based on the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relevant research literature, the article systematically studies library reader participation research in China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practice areas and individual behavior analysis,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earch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Key words library; reader participatio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practical research; individual behavior

后续研究提供借鉴。

1 引言

读者是图书馆服务的核心,无论是传统图书馆时代或是数字图书馆时代,读者从未被视为单一的服务接受者,而是作为具有参与动因与能力的重要力量,在图书馆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Web2.0环境下,技术发展带来的便利以及开放、包容、共享的时代理念推动参与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的兴起,读者参与实践的深入和普遍使读者参与研究成为图书馆学研究重要议题之一。随着混合型图书馆向智慧图书馆转型,当前图书馆读者参与研究在核心概念上呈现出“读者”与“用户”并行从而更具包容性,本文以图书馆读者参与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为基础,对目前国内图书馆读者参与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以期为该领域

2 读者参与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2.1 读者价值的认知与演化

读者作为图书馆服务对象,指接受图书馆资源或服务的个人。1957年,刘国钧的“要素说”使读者对图书馆的重要性开始彰显。20世纪60年代,“矛盾说”^[1]提出图书馆学研究主要围绕文献资源的收藏与利用展开,而二者连接的纽带即是读者。1981年,彭修义^[2]将图书馆学研究扩展到知识层面,仍将读者视为图书馆学四大研究对象之一。该时期语境下的读者,是与场馆、设备、文献资源等物质基础相对应的概念,意指图书馆服务的受众,相关研究尽管强调读者的重要价值,但尚未深入分析读者与其他要素的关联以及图

图书馆读者参与问题。1982年,郭星寿^[3]的“系统说”开始引入系统论强调图书馆要素之间的整体性。此后,“交流说”在国内图书馆学研究中逐渐盛行,无论是“文献信息交流”“知识交流”,亦或是把图书馆视为交流中介的“中介说”,该时期研究开始把图书馆活动视为一种社会交流现象,认为文献信息(知识)的开发和利用是图书馆最本质的核心,而读者不仅是受众,而且还是这一过程的实际参与者。

2.2 读者与馆员的竞合

20世纪90年代,知识经济的发展推动人本管理的兴起,图书馆学研究开始注重“人”的因素并引发读者与馆员关系的讨论,出现“读者第一”与“馆员第一”之争。该时期研究在继续强调读者重要性的同时,提出馆员主体能动性发挥问题,相关探讨的成果从不同维度厘清了“读者第一”与“馆员第一”的关系,包括二者在管理理念上的一体两面^[4]和在矛盾根源上的非同一性^[5]。该时期图书馆学研究对读者参与问题出现了不一样的认知。孙长怡^[6]从专业性知识缺乏视角强调读者参与图书馆决策与管理的现实困难,而崔红雁^[7]则认为读者素质问题并不能否定读者参与理论的正确性。相关争论一方面在于人本思潮下馆员价值的回归,同时也体现出在激发馆员能动性的同时发挥读者作用的复杂性,该时期国内图书馆读者参与研究整体呈现人本管理、馆员价值、读者素质以及读者权利等诸多问题的交叉与融合。

2.3 新技术环境下的读者参与

数字与网络技术的应用带来图书馆管理的变化,同时促进图书馆学研究对读者作用认知的深化。在新的学术语境下,读者与馆员之间的关系逐渐多元化,其各自价值与目标诉求在新技术的支持下实现更为和谐的统一。2006年“图书馆2.0”^[8]概念的引入推动了国内图书馆学研究话语体系的重构,并引发了一场涵盖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图书馆2.0运动”。受此影响,鼓励读者参与,重视用户体验的观念在图书馆得到进一步推广。同时,在实践层面,数字图书馆与智慧图书馆建设为读者(用户)参与提供了多种可能,读者(用户)参与在技术、途径与理念上不断深化,对该阶段相关研究的梳理也是本文的主要内容。

3 文献调研与分析

3.1 样本选取与方法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万方数据”与“维普数据库”为期刊论文数据来源,以“主题/标题/关键词”为检索路径,将文献来源学科限定为图书馆情报学研究,将来源期刊限定为核心期刊或CSSCI(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在3个数据库中分别以“读者参与”与“用户参与”为检索词,检索截止时间为2021年12月31日。经过文献去重以及非相关研究文献排除等数据清理,共获得符合分析要求的457篇文献。本文重点对文献的年度变化与关键词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主题梳理与特点揭示。

3.2 文献年代分布

图1显示出我国读者参与研究在成果产出方面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90年代,我国图书馆事业日趋开放,社会力量参与开始得到认知并推动读者参与研究的出现,该阶段读者参与研究尚未理论化,相关研究成果较少;21世纪前十年,国内读者参与研究成果快速攀升,显示出研究者对该问题的关注;2010年以后,该问题的研究有所回落,但仍保持在一定热度区间,考虑到大数据技术以及图书馆数字化、智慧化等因素的影响,这种回落可以理解读者参与相关理论与技术正在整合沉淀并酝酿新的生长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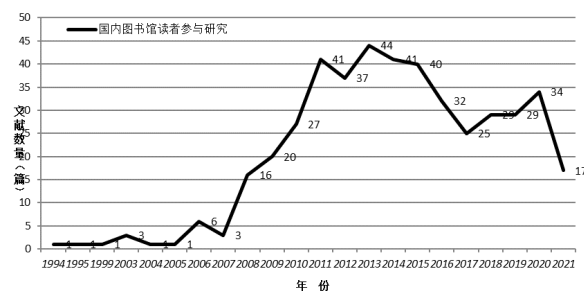


图1 我国图书馆读者参与研究文献年代分布

3.3 关键词词频统计

关键词词频统计从研究主题角度对该领域研究的关注点进行扫描。本文所获取的457篇文献中共出现了1 783个有效关键词,篇均3.9个。高频关键词(见表1)统计显示研究主题分布如下:①图书馆2.0、社会网络、知识共享以及价值共创赋予图书馆读者参与新的理论基础,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尝试构建读者参与的理论体系。②读者参与理念与图书馆实践活动的结合,包括图书馆管理、资源建设与服务等传统领域,以及网络环境中的读者参与问题。③读者参与过程

中的个体行为分析,包括读者个体行为规律以及影响因素。基于此,本文拟从理论构建、实践领域与个体行为分析三方面对我国图书馆读者参与研究进行梳理。

表 1 我国图书馆读者参与研究高频关键词分布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用户参与	92	阅读推广	15	影响因素	11
高校图书馆	71	图书馆 2.0	15	社交媒体	11
图书馆	60	社会网络	15	微博	10
Web2.0	36	服务创新	15	资源建设	9
信息服务	22	用户需求	14	用户行为	9
数字图书馆	21	图书馆管理	13	读者荐购	9
数字资源	20	激励机制	13	参与意愿	9
读者参与	20	知识共享	12	游戏化	8
学科服务	18	知识服务	12	用户体验	8
公共图书馆	17	用户	12	价值共创	8
信息组织	16	OPAC	12	互联网	8
众包	15	在线社区	11	馆藏建设	8

4 我国图书馆读者参与研究主题分布

4.1 图书馆读者参与基础理论构建

我国研究者对图书馆读者参与理论的构建包括阐述本学科理论对该问题的适用性以及从外学科相关理论寻求支持,涉及公共管理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学科,具体如表2所示。

整体来看,研究者关注图书馆读者参与的理论构建,尝试从不同视角扩大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将该问题置于新语境与研究范式,从宏观与微观层面寻求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以及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和社会文化治理等视角论述图书馆读者

参与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4.2 图书馆读者参与实践研究

图书馆读者参与实践研究关注读者参与与图书馆具体工作实务的结合,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图书馆管理以及读者服务。

4.2.1 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过程中的读者参与

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中读者参与问题的研究涉及图书馆文献资源集藏、整理和评价。

首先,相关研究关注不同资源类型以及不同采购方式下的读者参与问题,涉及传统文献资源采购^[8]与数字馆藏建设^[9],读者参与方式包括现场采购^[10]、读者荐购^[11]、读者主导采购^[12]以及众包众筹^[13]等。同时,研究者对读者参与图书馆资源集藏模式进行细分,如李书宁等人^[9]将用户参与馆藏建设模式分为专家用户群体参与模式、志愿者用户群体参与模式和付酬用户群体参与模式;廖书语等人^[14]将读者参与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模式分为间接参与模式、直接参与模式与赋能建设模式等。

其次,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读者深层次参与图书馆文献资源的整理和揭示创造了条件,图书馆文献资源编目等序化过程中的读者参与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包括OPAC系统构建^[15]、叙词表编制^[16]和网络搜索引擎建设中的读者参与^[17]等。

此外,作为图书馆文献资源的最终使用者,读者参与图书馆文献资源评价受到研究者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图书馆数字资源评价,包括评价方法的设计^[18]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19]等。

4.2.2 图书馆管理过程中的读者参与

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对读者参与图书馆管理进行了研究,集中在读者参与图书馆管理的必要性、参与路径与影响三方面。

表 2 我国图书馆读者参与相关理论研究梳理

相关理论	所属学科	涉及内容	作用与意义
图书馆 2.0	图书情报学	图书馆 2.0 服务模式; 图书馆 2.0 资源共建; 图书馆 2.0 环境下读者参与激励机制的构建	为图书馆读者参与提供新语境
知识服务	图书情报学 & 知识学	知识服务系统构建; 隐性知识转化; 知识服务转型动力机制构建	为图书馆读者参与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和方法论工具
公共治理	公共管理学	图书馆治理主体; 图书馆治理路径; 图书馆治理法治化; 公众文化权利; 公共文化治理有效性	阐述了图书馆读者参与的合法性
社会网络	社会学	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 阅读推广; 在线知识社区	基于人际关系认知为图书馆读者参与微观层面研究提供支持
价值共创	经济学	图书馆创新; 图书馆服务价值构建; 众包、众筹等新型资源建设模式	基于读者体验与感知为图书馆读者参与微观层面研究提供支持

对于读者参与的必要性,研究者一方面从微观层面探讨了读者参与对提高图书馆管理有效性的作用,如朱荀^[20]阐述了用户参与式设计(participatory design)对高校图书馆空间设计与服务改善的价值,成骥^[21]分析了读者参与图书馆制度设计在改善公众对图书馆消极态度上的作用。同时,研究者还从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视角分析读者参与对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的价值,如霍瑞娟^[22]就社会力量参与对公共图书馆管理制度完善作用的分析,李国新^[23]对我国公共图书馆立法过程中鼓励公众参与对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建立作用的分析等。

读者以何种方式参与图书馆管理是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相关研究涉及制度构建、方法选择以及条件保障。首先,研究者从读者权利出发对读者参与图书馆管理权进行细化,包括读者参与管理权利的内容^[24](知情权、建议权、决策权、申诉权)和相关权利的法律位阶^[25](应然权利、法定权利及实然权利)。同时,研究者提出理事会决策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听证制度以及管理委员会制度等制度构建以及读者参与的图书馆管理平台构建问题^[26]。

在读者参与对未来图书馆发展影响方面,研究者认为读者参与会使未来图书馆发展更加开放,因此,参与原则将集成和实施于图书馆核心工作而非停留在表面^[27],以及“社区”、“授权”和“体验”将会成为未来参与式图书馆发展的根基^[28]。读者参与会使未来图书馆“转向外部”,从“以用户为中心”转向积极关注社区,从而使图书馆更加开放^[29]。

4.2.3 图书馆读者服务过程中的读者参与

图书馆服务读者参与研究涉及读者参与方式、参与范围和读者参与对图书馆服务创新的影响。

研究者探讨了读者以何种路径与方式参与图书馆服务,并对相关模式进行提炼和明晰。如李广平等^[30]依据用户参与程度的不同将图书馆知识服务过程中的用户参与分为出席、合作、替代;张莉^[31]根据参与过程的不同将读者参与公共图书馆新服务开发模式分为读者概念源参与模式、读者全程参与合作模式和读者全程参与独立模式;李永明等人^[32]从效果上将用户参与图书馆知识服务划分为使用性参与、评估性参与和建设性参与等。此外,研究者还关注读者参与过程的控制。彭志平^[33]从用户参与的形式选择、内容选择、激励机制、引导监督四方面提出控制策略。

研究者结合案例分析,对特定图书馆服务过程中的读者参与进行梳理和分析,涉及图书馆学科服务、参考咨询、阅读推广、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以及信息素养教育等。此外,研究者还分析了读者参与对图书馆服务绩效的影响^[34]。

研究者将读者参与视为图书馆服务创新的动力并探讨了相关过程与机理,包括用户智慧融入对图书馆知识服务创新的驱动^[35]、图书馆与用户的深度交互对大学图书馆空间与服务设计的优化^[20]以及读者参与对公共图书馆新服务开发的推动等。

综合而言,当前图书馆读者参与实践研究体现出继承性和生长性,既关注传统图书馆形态下的读者参与问题,同时又尝试结合图书馆向混合型以及数字化、智慧化转型的时代特点,关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实践过程中的读者参与问题。从读者荐书到读者决策采购,从读者参与图书馆管理到图书馆治理现代化以及数字图书馆发展过程中的读者有效参与,相关问题构成了图书馆读者参与研究新的生长点,特别是随着后疫情时代图书馆线上服务比重的增加,图书馆线上线下行为的衔接需要更加充分考量读者参与的价值。

4.3 图书馆读者参与过程中的个体行为研究

除上述外,研究者还关注读者参与过程中个体行为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体特征对读者参与行为的影响,参与主体之间交互关系对读者参与的影响以及环境因素对读者参与的影响。

4.3.1 个体因素对读者参与行为的影响

研究者关注到年龄、知识结构、心理特征以及动机等因素对读者参与图书馆活动的影响,主要涉及老年人、儿童以及大学生等群体,影响主要涉及图书馆阅读推广、志愿服务、课程教育等活动。其中,在动机研究方面,研究者对不同群体的参与动机进行明晰,如潘伟^[36]将老年群体参与农村图书馆志愿服务动力来源总结为文化上的代际传承、政治上的集体主义洗礼和经济上的“道德人”感召,黄梅林^[37]将高校学生参与图书馆活动的动机总结为个人心理与提高信息素养的需要,李永明等人^[38]认为虚拟社区中的用户行为受到内在动机、社会动机与情境因素的重重影响等。

4.3.2 交互关系对读者参与行为的影响

研究者就交互关系对读者个体参与行为的影响进行分析,包括读者与读者之间交互关系以及读者与馆员之间交互关系。

研究者注意到读者在参与图书馆活动中相互之间的影响并进行分析,如张华等人^[39]对读者参与图书馆课程中交互行为的研究,黄琳等人^[40]对阅读社区内读者交互行为的分析等。相关研究既关注网络环境下或图书馆网络服务过程中的读者交互行为,也关注图书馆线下活动中的读者交互行为。研究者以数据分析为基础,对读者交互行为进行特征分析并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

研究者同时关注读者与馆员间互动的质量以及影响互动质量的有关因素。首先,研究者基于实证研究构建读者与馆员互动质量模型,如邹薇^[41]、褚兆麟等人^[42]对馆员与读者互动质量模型的构建。其次,研究者注意到读者与馆员行为正相关关系并分析了两者间满意度的传导机制,并借鉴SE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结构方程模型)^[43]与市场营销^[44]等理论进行了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此外,研究者分析了冲突管理^[45]、敬语使用^[46]和非语言交流^[47]等影响因素对读者与馆员交互行为的影响。

4.3.3 环境因素对读者参与行为的影响

当前研究对读者参与个体行为产生影响环境因素的分析主要涉及图书馆空间再造与服务平台构建。

图书馆空间是指物质条件、政策环境与技术支持的综合,研究者认为图书馆空间会影响读者参与行为,包括读者参与意愿和分享意愿,因此图书馆应创设鼓励读者参与的实体或网络空间,如潘洋等人^[48]认为基于读者需求的空间再造会提高读者对图书馆的利用率与参与度,夏轶群等人^[49]的研究证明人际关系网络与技术支持与图书馆创客空间用户参与意愿呈现正相关性,明均仁等人^[50]的研究表明了图书馆基础设施、使用时间成本及价值认知会影响图书馆用户的知识分享意愿等。

研究者认为图书馆服务平台性能会影响用户使用行为,并提出基于用户行为分析的平台改进策略,如陈则谦等人^[51]通过对用户参与行为研究提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改进策略,郑德俊等人^[52]分析了用户参与程度对提升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平台用户满意度和持续使用意愿的作用等。

综合而言,当前个体行为研究主要聚焦在对读者参与过程中个体行为影响因素,研究者利用社会学工具以及大数据技术,对微观层面的读者参与活动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对图书馆相关活动的改善提

供支持。相关研究体现跨学科性与实践性,对于推动图书馆读者参与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5 总结与展望

5.1 我国图书馆读者参与研究的特点

本文以我国图书馆读者参与观念形成和发展为基础,基于相关文献对该领域研究进行梳理,揭示出相关研究的基本特点。

(1)从文献数量而言,读者参与问题仍是当前我国图书馆读者(用户)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随着国家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化发展,公共文化治理现代化的进步以及技术与服务理念提升所带来的读者(用户)观念的深入,读者参与问题仍是未来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构成。

(2)从研究方法而言,相关文献尽管体现出当前研究方法上的多样性,但重理论阐述轻实证研究的问题依然存在。同时,研究者在运用社会统计、心理分析以及模型构建等方法进行研究的同时,在相应基础理论阐释方面仍显薄弱,在理论引入与图书馆学衔接上仍显不足。

(3)从研究内容而言,当前研究从理论、实践与个体行为分析三方面勾勒出较为完整的读者参与问题研究框架,为该问题的后续研究奠定基础。同时,该领域研究对读者决策采购、图书馆治理以及读者行为分析等问题的关注较好回应了不同阶段图书馆转型需要,从而使该问题研究为我国图书馆实践发展提供借鉴。

5.2 未来展望

通过对我国图书馆读者参与理念形成过程及当前国内相关研究主题分布的梳理,结合当前及未来国内图书馆事业发展情况,本文就我国图书馆读者参与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1)拓宽理论基础,进一步完善图书馆读者参与研究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当前,互联网发展使图书馆与读者之间日益形成一种融通互联、价值共享与交互影响的关系,读者参与研究需要脱离传统思维的束缚,构建更为广泛的理论框架,为构建透明、基于规则和共同价值观的读者关系创造条件。

(2)充实研究内容,扩大图书馆读者参与研究范围。当前研究关注传统环境与网络环境中读者参与行

为的区别,但研究视域仍集中在资源建设、图书馆管理及图书馆服务领域,从而造成研究范围的狭窄。随着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发展以及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构建,读者参与研究应立足图书馆基本社会职能,结合时代需要拓展研究视野,包括从图书馆本质与社会职能出发拓展读者参与的合理性,从图书馆发展研究出发寻求读者参与与图书馆精神、图书馆形态演变以及图书馆与社会互动研究的联系,从图书馆治理研究出发探讨图书馆事业制度化、法治化过程中读者参与的权利设置与制度安排,以及从图书

馆职业化视角分析图书馆职业理论和职业精神与读者参与的关系等。面对“双减”“一老一小”等社会问题,图书馆读者参与研究还应加强对特殊读者群体的关注。

(3) 丰富研究方法,重视实证研究。图书馆读者参与研究在方法选择上需要更为多样化,包括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公共管理学等学科基础理论的引入,以及统计学、心理学等微观层面研究工具的应用,特别是通过实证研究的开展,为读者更好参与图书馆活动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 [1] 黄宗忠.浅谈图书馆的藏与用[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2(9):91-98.
- [2] 彭修义.关于开展“知识学”的研究的建议[J].图书馆学通讯,1981(3):85-88.
- [3] 郭星寿.浅谈现代图书馆学的结构[J].图书馆界,1982(10):10-14,22.
- [4] 王世伟.从“读者第一”到“图书馆员第一”——知识经济带给图书馆管理的思考之一[J].图书馆杂志,1999(2):5.
- [5] 黄俊贵,林汉城.“馆员第一”的辨识与实现[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4(1):32-35.
- [6] 孙长怡.建立在流沙上的理论:读者参与图书馆管理——读者参与图书馆悖论[J].图书馆建设,2008(11):92-93.
- [7] 崔红雁.“读者参与是建立在流沙上的理论”吗——与孙长怡先生商榷[J].图书馆建设,2010(1):87-89.
- [8] 刘西义.“互联网+”环境下读者参与选书模式微探:以长沙市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2016(9):109-111.
- [9] 李书宁,方春燕.特色数字馆藏用户参与建设模式研究[J].图书与情报,2014(1):59-64.
- [10] 祝朝安,朱自强.读者参与图书馆现场采购的思考[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2(8):100-102.
- [11] 史丽香.高校图书馆读者网上荐购的现状与思考:基于对50所高校的调查[J].图书馆论坛,2013(9):117-122.
- [12] 王春生.我国图书馆实施读者主导式采购的策略[J].图书情报工作,2013,57(5):71-75.
- [13] 亢琦,孙泽.图书馆纸质资源建设的读者众筹模式研究[J].图书情报知识,2018(2):69-76.
- [14] 廖书语,叶继元.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中的读者参与研究[J].图书与情报,2020(5):31-38.
- [15] 江佳惠.强调读者参与和资源揭示的OPAC[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1(10):24-26.
- [16] 陈红艳.网络环境下用户参与叙词表优化与维护方式探讨[J].图书馆学研究,2016(15):35,55-57.
- [17] 王娜,刘倩瑜.用户参与性分类法在泛在网络搜索引擎中应用的探索[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5(12):115-119.
- [18] 刘慧.基于网络行为的图书馆数字资源评价方法研究[J].现代情报,2015(2):62-66.
- [19] 韩正彪.基于用户心智模型的文献数据库评价研究[J].图书与情报,2018(4):72-79.
- [20] 朱荀.美国大学图书馆用户参与式空间与服务设计案例与启示[J].图书与情报,2018(5):87-93.
- [21] 成骥.读者参与图书馆制度设计的问题当议[J].图书馆,2015(8):19-22.
- [22] 霍瑞娟.新环境下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管理运行创新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7(9):19-23.
- [23] 李国新.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促进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佛山市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的特色与亮点[J].图书馆论坛,2021(7):27-28.
- [24] 冯天宇.读者参与管理权的制度保障措施研究[J].图书馆,2015(5):26-29.
- [25] 兰孝慈.图书馆制度检视:读者权利实现的重要向度[J].图书馆建设,2015(2):53-56.
- [26] 曹雪梅.自主管理、互动发展——图书馆打造读者主导型互动文化平台的实践探索[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4(4):83-84.
- [27] 程文艳.参与式图书馆:现代图书馆发展模式的新趋势研究[J].图书馆杂志,2013(10):13-19.

- [28] 刘云,洪同华.基于扎根理论的参与式图书馆模式研究[J].情报资料工作,2016(4):104-109.
- [29] 李娜.图书馆服务转型:从“以用户为中心”到“转向外部”——美国图书馆协会图书馆转型项目对我国图书馆的启示[J].图书馆建设,2017(7):36-42.
- [30] 李广平,王婧怡,袁润.用户参与图书馆知识服务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7(10):40-45.
- [31] 张莉.公共图书馆新服务开发过程中的读者参与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7(6):82-86.
- [32] 李永明,郑德俊.用户参与对图书馆知识服务绩效的影响模型[J].图书情报工作,2020(2):42-52.
- [33] 彭志平.图书馆2.0环境下用户参与数字参考咨询的路径选择[J].图书情报工作,2011,55(17):66-69,104.
- [34] 袁红军,任志芳.知识转移视域下读者参与图书馆服务创新绩效研究[J].现代情报,2012,32(8):55-58.
- [35] 李杨,郑德俊.与用户共创图书馆的知识服务价值——云舟知识空间的用户智慧融入案例及其启示[J].图书情报工作,2020,64(4):34-42.
- [36] 潘伟.老年群体参与农村图书馆志愿服务的动机:对绮罗图书馆的调查[J].图书馆论坛,2019(11):94-103.
- [37] 黄梅林.试析高校图书馆用户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J].图书馆论坛,2012(11):24-27.
- [38] 李永明,郑德俊,周海晨.用户知识贡献的心理动机识别[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8(12):126-132.
- [39] 张华,魏大威.基于大数据的“国图公开课”用户学习行为研究[J].国家图书馆学报,2019(3):63-74.
- [40] 黄琳,李桂华,黄安妮.生命周期视角下的阅读社区读者交互特征[J].图书馆论坛,2017(7):48-54.
- [41] 邹薇.图书馆员与读者互动质量模型实证研究[J].图书馆论坛,2014(3):8-13.
- [42] 褚兆麟,邹薇.学科馆员与读者互动质量及其对关系质量的影响研究:以人际互倚理论为视角[J].图书馆学研究,2015(5):83-87.
- [43] 刘海萍,阳海燕,符勤,等.馆员满意度与读者(用户)满意度传导机制实证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1,55(3):70-73,133.
- [44] 杨秀敏,黄辉.馆员—读者满意镜”模型及实证研究[J].图书馆论坛,2017(1):79-85.
- [45] 王孝.试析图书馆员与读者的冲突管理[J].图书馆杂志,2010(9):39-41.
- [46] 王少薇,李聪敏,刘国敏.敬语的使用对高校图书馆读者与馆员关系的影响:基于实验方法的实证分析[J].图书馆论坛,2012(9):47-50.
- [47] 周顺和,赵恒芬.论高校图书馆员与读者的非语言交流行为[J].图书馆,2010(3):101-102.
- [48] 潘洋,顾建新.空间即服务:新加坡公立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项目扫描[J].图书馆杂志,2018(12):74-82.
- [49] 夏轶群,苏洪锐.图书馆创客空间用户参与意愿研究:基于创客创业生态系统视角[J].图书馆,2019(8):64-70.
- [50] 明均仁,赵鹤,吴诗嫚,等.图书馆创客空间用户的知识分享意愿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9(14):58-65.
- [51] 陈则谦,郑娜静,李亚灿,等.一站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支持用户参与的服务现状、主要问题与优化建议[J].图书情报工作,2021,65(7):78-89.
- [52] 郑德俊,王敏,李杨,等.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平台用户参与行为研究:以LibGuides为例[J].国家图书馆学报,2020(2):89-101.

作者简介:章先贵,西藏农牧学院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数字图书馆。

收稿日期:2022-06-14

本文责编:王晓琳

· 阅读文化 ·

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陈红艳¹ 罗媛²

(1.湖北大学图书馆 湖北武汉 430062)

(2.湖北省图书馆 湖北武汉 4300071)

摘要: 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评价是彰显阅读推广价值、评价阅读活动成效、促进阅读推广可持续发展的手段,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达成评价目标的重要工具。在现有的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评价指标体系中,用户视角下的阅读推广成效评估相对弱化,未能充分体现出阅读推广的价值。对此,文章从图书馆、用户两个评价主体出发,结合大数据环境下数字阅读推广的现状,解构儿童阅读推广的核心要素,从馆藏文献资源、阅读推广环境、阅读推广人力资源、阅读推广服务、合作与支持等方面构建当前儿童阅读推广评价指标体系。

关键词: 图书馆; 儿童; 阅读推广; 评价指标

中图分类号: G252.17; G258.2

文献标识码: A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Children's Reading Promotion in Libraries

Abstract Evaluation of children's reading promotion in libraries is a means of highlighting the value of reading promotion,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reading activities and susta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ading promotion. A sound and reasonabl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s an important tool to achieve the evaluation objectives. In the existing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hildren's reading promotion in libraries, the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reading promotion from the user's perspective is weak, and the value of the reading promotion is not fully reflected. In this regard, the article deconstructs the core elements of children's reading promotion from two evaluation subjects, libraries and users, and combin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igital reading promotion against the big data context. The curr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hildren's reading promotion is constructed from the aspects of collection literature resources, reading promotion environment and talent pools, services, as well as cooperation and support with other sectors.

Key words library; children; reading promotion; evaluation index

1 引言

儿童阅读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广泛重视。1994年,IFLA(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和UNESCO(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共同发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指出,

从小培养和加强儿童的阅读习惯应当成为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核心内容之一^[1]。在我国,自2014年起,全民阅读连续九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全民阅读事业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儿童阅读作为全民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2022年4月23日,习近平在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举办的贺信中指出,希望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为了更好地指导图书馆有效开展儿童阅读推广,彰显阅读推广的价值、评价阅读活动成效,厘清阅读推广

的核心,对儿童阅读推广实施评价研究显得非常重要且迫切。鉴于目前国内外儿童阅读推广领域缺乏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的现状,本文以多学科的理论视角,在借鉴国内外儿童阅读推广评价实践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和我国实际,构建了一套适用于数字环境下的儿童阅读推广评价指标体系。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我国儿童阅读推广评价研究主要涉及儿童阅读推广服务指南与政策^[3-4]、推广要素评价^[5-7]、推广分众评价^[8-11]、绘本阅读推广评价^[12-13]、推广合作评价研究^[14-15]、推广活动评价^[16-19]和区域儿童阅读推广评价^[20]等方面。从研究维度而言,可分为结果影响维度、服务维度、过程维度和要素维度等。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素芳等人从图书馆投入—产出、结果—影响的维度,构建探索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活动成效的综合评估三级指标体系^[16]。张蕴娣等人、周同等人借鉴“全评价”分析框架,分别构建了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评价体系和青少年阅读评价体系^[17-18]。刘斯博借鉴LibQUAL+模型,建立了适用于未成年群体的阅读服务评价标准^[19]。柯平等人以“儿童优先”为指导原则,梳理历次公共图书馆的评估标准,构建了未成年人服务评价指标体系^[21]。戚敏仪从多个主体角度,对未成年人阅读障碍症群体服务进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9]。封晔基于角色认知理论,构建了儿童阅读推广馆员能力评价指标体系^[6]。

国外对儿童阅读推广评价亦展开了丰富研究。由英国^[22]率先展开,在德国、荷兰^[23]等多国广泛推广的“阅读起步走(Bookstart)”项目,使用实验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多种定性定量结合的方法,不间断地对该项目进行了20余年的跟踪研究。美国“暑期阅读计划”项目通过对参与项目学生开展前测和后测,辅以教师、图书馆员、监护人和学生问卷调查和访谈,用标准化的实验设计及长时程的追踪调查,得出了系统性的结果^[24]。美国公共图书馆发起低幼儿童早期读写能力服务,其中“图书馆的每个孩子都做好了阅读准备”项目(Every Child Ready to Read@YourLibrary, ECRR)引起了广泛社会影响。2013年至2016年,研究团队利用ECRR项目模型连续观察并评估了全美36个不同的图书馆系统中57家图书馆分馆的

故事时间项目^[25]。日本文部省于2016年开始,每年开展关于儿童阅读活动促进计划的调查研究,调查主题依据当年计划和社会进步而变化^[26]。

目前,国内对儿童阅读推广评价的研究主要为理论和案例研究,多侧重对阅读推广某一要素开展评价,较少能从用户角度评估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成效。国外则侧重结合定量与定性方法对阅读推广项目开展评价,同时注重根据时代发展不断更新评价标准。本研究结合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注重儿童数字阅读推广的发展趋势,开展实证研究,从图书馆和用户2个维度,构建一套较为全面且注重阅读推广服务导向的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评价指标体系,以期为图书馆改进儿童阅读推广方式、优化儿童数字阅读推广环境提供参考。

3 理论架构和研究过程

3.1 理论架构

美国学者托马斯提出,影响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的五大因素是专门馆藏、专门空间、专业人员、专项服务、合作网络。托马斯五因素理论作为适应于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的最早理论,目前仍指导着世界范围内公共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的实践工作。本研究在梳理文献的过程中,归纳的五个一级指标与托马斯五因素理论不谋而合,并以此作为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框架。

图书馆阅读推广具有大众传播性质,本研究结合拉斯韦尔的5W理论,将阅读推广主体归纳为图书馆;推广手段归纳为环境、人力资源、合作与支持;推广内容归纳为馆藏文献资源与服务;推广客体归纳为儿童、监护人等用户;推广影响包括对社会和对用户两方面的影响。综合归纳儿童阅读推广全过程中多要素影响,增强指标构建的完备性。

福林在原3E理论(Economy、Efficiency、Effectiveness)的基础上增加了“Equity”公平维度,提出了4E绩效标准^[27]。在公共服务中,公平维度是重要的绩效服务衡量指标。本研究以4E绩效标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中公平性评估的理论依据,在指标设置中特别注重特殊儿童阅读推广、多元化阅读推广资源和服务指标的构建。

综上,本文的研究思路如图1所示。

3.2 研究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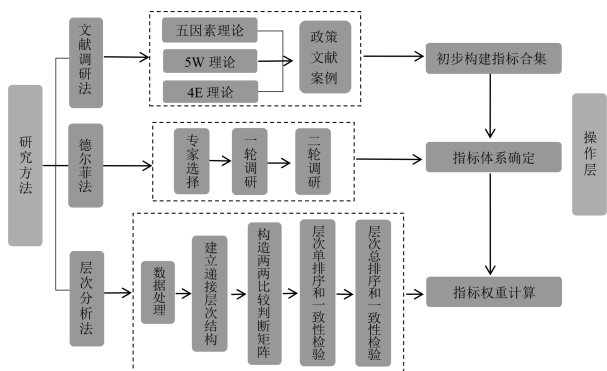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思路框架图

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及意义,利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儿童阅读推广指标体系并确定指标权重。研究时间从2021年10月至2022年6月。

其一,遴选指标。系统梳理我国《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童服务规范(GB/T 36720—2018)》《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GB/T 28220—2011)》《公共图书馆评估指标第3部分:省、市、县少年儿童图书馆(WH/T 70.3—2020)》,国外《儿童图书馆服务发展指南》(IFLA, 2011)、《0—18岁儿童图书馆服务指南》(IFLA, 2018)、《儿童阅读推广基本计划》(日本, 2018)、《儿童图书馆服务指南》(俄罗斯, 2016)等国内外标准、规范、指南;研读2010—2022年我国公开发表的儿童阅读推广评价主题的核心文献,以及2012—2021年中国图书馆学会举办的阅读推广案例征集中的优秀案例,从图书馆和用户两个主体角度分类归纳阅读推广要素。关注数字环境下阅读推广发展与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同时结合专家意见,进行指标内容再提炼,初步遴选出较为全面的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评价体系指标集合,包括5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58个三级指标。

其二,选择专家。为保证专家权威性和研究可信度,设置条件选择调研专家,具体条件为从事阅读推广相关工作10年以上或具有副研究员/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结合本研究实际情况,最终确定12名专家,分别为公共图书馆馆长(6人)、从事儿童阅读推广工作的部门主任(4人)和高等院校图书情报领域学者

(2人)。

其三,开展调研。2021年11月至2022年1月,拟定并向专家发放《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评价指标体系专家调查函》(以下简称《专家调查函》),对专家开展了两轮正式意见咨询。在调研专家意见基础上确定指标体系构成后,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各层次指标权重。

4 调查结果分析

4.1 专家权威程度

本研究主要利用专家积极系数 K 、权威程度 C_R 等衡量德尔菲法有效程度^[28]。专家积极系数 K 是指专家对调查研究的关心程度,为实际填写《专家调查函》并进行评分的人数与全部参加调研的专家人数之比。在本研究中,发放《专家调查函》12份,共回收12份。 K 值为100%,专家积极性非常高。

专家权威程度 C_R 为专家对问题的熟悉程度 C_a 和专家的判断依据 C_b 的算数平均数,如表1所示。

当 C_R 大于0.8时,可认为研究选取的专家权威性较强并且指导建立的儿童阅读推广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可信度。本研究中,专家权威程度均大于0.8,有超过66.7%的专家权威程度大于0.9,表明本研究构建的儿童阅读推广评价体系具有较高可信度和权威性,参与调研的专家均对儿童阅读推广有较深研究。

4.2 专家意见反馈与指标修订

根据德尔菲法的要求,专家评分的重要性均值、满分频率和变异系数能反映该指标设置合理程度和专家协调程度。重要性均值体现专家意见的集中程度,均值越大,表示该指标重要性越高,一般认为指标重要性均值应大于3。变异系数代表专家在指标相对重要性认识上的差异程度,变异系数越小,专家对该指标的协调程度越高。一般认为,变异系数小于0.25,说明专家对该指标认同程度较好^[29]。

在第一轮专家调查中,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重要性均值全部大于3,变异系数均小于0.25。三级指标中,“文献资源利用率”“读者接受度”“读者参与

表1 专家权威系数

专家	E1	E2	E3	E4	E5	E6	E7	E8	E9	E10	E11	E12
熟悉程度 C_a	1	0.9	0.9	0.9	1	1	0.9	0.9	1	0.9	1	0.9
判断依据 C_b	0.7	0.9	0.9	0.9	0.9	0.7	0.9	0.9	0.7	0.9	0.9	0.7
权威程度 C_R	0.85	0.9	0.9	0.9	0.95	0.85	0.9	0.9	0.85	0.9	0.95	0.8

度”变异系数大于0.25,结合专家意见进行了删除。

经过第一轮调研,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指标合集,对12名专家开展第二轮调研,所有指标重要性均值大于4且变异系数小于0.25,可以保留。至此,完成了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评价指标体系合集的构建,包括5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和55个三级指标。

4.3 确定指标权重

指标体系确定后,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通过建立递阶层次结构,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层次单排序、总排序并分别进行一致性检验,设置完成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评价指标合集及其权重,如表2所示。

4.4 确立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评价指标体系

本研究构建的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评价体系包括5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和55个三级指标。

从重要性均值和满分频率来看,重要性均值超过4.5(满分5),且满分频率超过75%(共计12名专家打分,有9名及以上打满分)的一级指标有“阅读推广服务”“合作与支持”“阅读推广人力资源”“阅读推广环境”4个,占所有一级指标数量的80%。二级指标有“文献资源内容”“环境功能”等9个,占二级指标总量的45%。

在5个一级指标中,相对重要性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阅读推广服务”“合作与支持”“阅读推广人力资源”。“阅读推广服务”为阅读推广的主体内容,重要性程度最高,“合作与支持”与“阅读推广人力资源”同等重要。二级指标中,“阅读推广人素质”“服务形式”“服务管理”“经费”“阅读推广人管理”重要性较高,这些指标集中于阅读推广服务和人力资源方面,与三级指标中重要性较高的“使命愿景”“职业道德”“服务态度”“环境年龄适宜性”“分级性”“兼职阅读推广人建设”集中指向性一致。

5 评价指标体系解析

5.1 指标体系的特点

一是指标体系体现出了儿童阅读推广评价的时代性。在当前信息环境下,图书馆数字资源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数字资源在阅读推广中所扮演的角色亦愈发重要,图书馆阅读推广需要不断重视数字资源的建设和利用。二级指标“数字资源平台建设”下设

“检索工具易用性”“用户数据安全性”“绿色阅读”等三级指标,从检索系统易用性、安全性等方面反映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和儿童利用数字资源情况。“利用网络新媒体开展服务”体现了线上服务在智慧化、数字化阅读时代的新趋势。

二是指标体系体现出了儿童阅读推广评价的导向性。一级指标“阅读推广服务”下设7个二级指标和23个三级指标,占三级指标总量的41.8%,体现出阅读推广服务在儿童阅读推广评价中的主体导向地位。指标体系分别从用户和图书馆两个角度构建评价指标,特别表现在“阅读推广服务”指标下设置“阅读行为”“阅读能力”“阅读兴趣”二级指标,体现阅读推广对用户的阅读能力、兴趣和行为起到正向激励作用,从“服务管理”“服务内容”“服务形式”二级指标考察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使命愿景、专业化流程和社会影响力。

三是指标体系体现出了儿童阅读推广评价的全面性。除“阅读推广服务”外,设置其他四个一级指标,全面覆盖了儿童阅读推广的影响要素。“馆藏文献资源”通过设置具体指标评价文献资源藏量、载体、形式,体现馆藏对阅读推广的基础重要性。“阅读推广环境”通过考察图书馆馆舍建筑、设施设备、馆藏布局,体现出环境对阅读推广的影响。“图书馆人力资源”通过考察儿童阅读推广人员能力素质和管理,体现其对推广整体效果的影响。“合作与支持”体现政府、行业的支持和指导,馆际合作、社会合作的重要性。

5.2 指标体系的功能导向

其一,指标体系具有描述功能。根据托马斯五因素理论,影响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的五大因素主要是专门馆藏、专门空间、专业人员、专项服务、合作网络。本研究在文献总结归纳过程中,总结梳理的五个一级指标与托马斯五因素理论不谋而合,包含儿童阅读推广影响因素,能反映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的状况,从整体上描述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相关要素内容与执行情况。

其二,指标体系具有评价功能。本研究在一级指标的框架下,构建自上而下、从宏观到微观层层深入的指标体系。每一层级指标能较好归纳包含下一层指标意义;同层级各指标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儿童阅读推广主要特征和影

表 2 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评价指标及其权重

一级指标及权重	二级指标及权重	三级指标及权重	一级指标及权重	二级指标及权重	三级指标及权重
A1 馆藏文献资源 0.074	B1 文献资源内容 0.034	C1 文献资源充足性 0.019	A4 阅读推广服务 0.375	B11 社会影响力 0.034	C29 品牌建设 0.010
		C2 文献资源配置分级性 0.010			C30 规模化 0.006
		C3 文献内容多元特色性 0.006			C31 均等性 0.018
	B2 文献资源载体 0.007	C4 文献载体丰富性 0.007		B12 服务形式 0.034	C32 线下服务形式多样性 0.023
	B3 文献资源易用性 0.012	C5 文献资源易获得性 0.012			C33 利用网络新媒体开展服务 0.011
	B4 数字资源平台建设 0.020	C6 检索工具易用性 0.006		B13 服务内容 0.098	C34 分级性 0.034
		C7 用户数据安全性 0.011			C35 丰富性 0.020
		C8 绿色阅读 0.003			C36 创新性 0.020
A2 阅读推广环境 0.121	B5 环境功能 0.081	C9 功能分区化 0.022			C37 系列性 0.007
		C10 环境年龄适宜性 0.038			C38 互动性 0.012
		C11 布局合理性 0.013			C39 多元文化性 0.005
		C12 交通便利性 0.008		B14 阅读行为 0.040	C40 用户阅读时间 0.008
B6 设施设备 0.040	C13 设施设备安全性 0.027	C41 用户主动获取信息 0.004			
	C14 设施设备齐全度 0.013	C42 用户忠诚度 0.006			
A3 阅读推广人力资源 0.215	B7 阅读推广人管理 0.064	C15 兼职阅读推广人建设 0.034	B15 阅读兴趣 0.048		C43 用户亲子阅读行为 0.007
		C16 结构层次化 0.010		C44 用户阅读习惯 0.015	
		C17 继续教育 0.019		C45 用户阅读理念 0.026	
	B8 阅读推广人素质 0.116	C18 举止规范 0.013		C46 用户满意度 0.008	
		C19 职业道德 0.041	C47 用户心情愉悦度 0.014		
		C20 服务态度 0.041	B16 阅读能力 0.023	C48 用户阅读指导度 0.016	
		C21 主动学习意愿 0.022		C49 用户知识扩展度 0.008	
	B9 阅读推广人能力 0.035	C22 组织策划能力 0.006	A5 合作与支持 0.215	B17 合作类型 0.049	C50 馆际合作共享 0.016
		C23 营销推广能力 0.003			C51 社会合作共享 0.033
		C24 沟通协作能力 0.006		B18 经费 0.091	C52 阅读推广经费 0.091
C25 问题解决能力 0.012		B19 宣传 0.049		C53 宣传力度 0.033	
C26 阅读指导能力 0.006				C54 宣传形式 0.016	
	B10 服务管理 0.098	C27 使命愿景 0.066		B20 评估 0.026	C55 反馈评估 0.026
		C28 内部流程规范化 0.033			

响因素，共同构成一个科学完整的评价体系。

其三，指标体系具有指导功能。本研究收集采纳了行业专家指导意见，提炼了国内外规范、标准、指南、文献和案例，采取实证方法科学选择评价指标，能服务

儿童阅读推广的发展策略。同时，结合数字环境开展评价，能一定程度上引导未来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的发展趋势，有利于儿童阅读推广的长期健康发展。

5.3 指标体系的实际使用及数据统计

建立儿童阅读推广评价指标体系后,还需对其进行实际评测,以检验其科学性、合理性、可操作性。本研究从用户和图书馆角度分别收集指标评价信息。从用户角度,收集用户对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环境、馆藏等的主观评价;从图书馆角度,收集内部流程、人员管理、合作、经费等指标信息。以期发挥外部用户对图书馆服务效果直观感知的优势,又便于内部评价主体收集图书馆管理、运行信息^[30]。

在实际评测中,采用了三种调研方式收集数据。一是针对外部用户开展问卷调查,了解用户对阅读推广服务的直观感受;二是针对内部图书馆员开展访谈,了解馆员对阅读推广的直观感受并获取相关数据;三是针对馆藏、硬件设施设备开展文献调研和实地调研,根据实际情况获取数据。设置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评价指标体系总分为100分。问卷调查和部分访谈中,采用李克特五级评价量表进行相关指标等级评定。非常不同意计1分,比较不同意计2分,一般计3分,比较同意计4分,非常同意计5分,计算时求出三级指标对应读者问卷问项和馆员访谈问项等级评定的

均值,将其转换成百分制形式,按照指标权重进行加权即为该指标得分。如以下公式所示,其中a为该指标得分, a_i 为每一个调查对象对该指标评分, i 为调查对象个数, W_{C_i} 为该指标权重。

$$a = \frac{a_1 + \dots + a_i}{5i} \times W_{C_i} \times 100$$

通过实地调研和文献调研中获取的数据,结合《公共图书馆评估指标 第3部分:省、市、县级少年儿童图书馆(WH/T 70.3-2020)》《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GB/T 28220-2011)》《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童服务规范(GB/T 36720-2018)》相关条款设定分值,满分为5分,将其同样转换成百分制形式,进行加权即为该指标得分。通过对所有三级指标的加权后得分求和,即为总得分。具体调研方式及指标评分设置如表3所示。

6 结语

本研究利用文献调研法、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

表3 三级指标调研方式及评分标准设置

指标	调研方式	评分标准设置
C1 文献资源充足性	文献调研	结合《公共图书馆评估指标 第3部分:省、市、县级少年儿童图书馆(WH/T 70.3-2020)》,设置评分方式为:馆藏配置低于15万册件计1分;多于15万册件,少于40万册件计3分;多于40万册件计5分
C13 设施设备安全性	实地调研	结合《公共图书馆评估指标 第3部分:省、市、县级少年儿童图书馆(WH/T 70.3-2020)》,图书馆建筑或设施设备能满足少年儿童图书馆读者安全环保的需求,重点考察图书馆建筑设计安全、消防设备、安全保卫设施设备、应急疏散通道。考虑安全是最基础的保障。设置评分方式为:以上四项都有,则此项指标满分,缺少其中1项,则此项指标0分
C14 设施设备齐全度	实地调研	结合《公共图书馆评估指标 第3部分:省、市、县级少年儿童图书馆(WH/T 70.3-2020)》,重点考察图书馆配备读者使用的电子终端、读者服务区有无线网覆盖、残障儿童辅助阅读设备等情况。设置评分方式为:以上三项都有,计满分5分;有2项,计3分;有1项,计1分;没有则计0分
C16 结构层次化	访谈	结合《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GB/T 28220-2011)》,重点考察具有相关学科背景(教育学、心理学、图书馆学等)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占在编人员的75%以上。设置评分标准为:专业技术人员/在编人员>=75%则计5分;>=60%则计4分;>=45%则计3分;>=30%则计2分;>=15%则计1分;<15%则计0分
C17 继续教育	访谈	结合《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童服务规范(GB/T 36720-2018)》,重点考察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童服务馆员年接受专业知识教育培训时间不低于60学时/人。设置评分标准为:年培训学时>=60学时,计5分;>=48学时,计4分;>=36学时,计3分;>=24学时,计2分;>=12学时,计1分;<12则得0分
C30 规模化	文献调研	结合《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童服务规范(GB/T 36720-2018)》,公共图书馆应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年万人开展读者活动场次不低于0.4。根据《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GB/T 28220-2011)》,区域服务人口数为各级公共图书馆所在行政区域的常住人口数。设置评分方式为:图书馆年开展活动场次/服务人口/10000,若>=0.4则此项指标满分,未达到则0分
C31 均等性	访谈	重点考察为残障读者或者是各类特殊少年儿童读者开展阅读推广服务的情况。设置评分方式为:若有,则此计5分;若无,则此项指标0分
C52 阅读推广经费	文献调研	重点考察政府财政拨款年增长率与当地财政收入年增长率的比率。设置评分标准为:财政拨款年增长率/当地财政收入年增长率*100%>=85%,计5分;>=75%,计4分;>=65%,计3分;>=55%,计2分;>=45%,计1分。因当地财政收入递减而导致财政拨款增长比率为负的,按满分计算
其他	访谈/问卷	设置评分方式为:按照李克特量表重要性等级1—5级评分

注:“其他”指除C1、C13、C14、C16、C17、C30、C31、C52外所有的三级指标。

法,从图书馆和用户两个维度构建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该指标体系重点考虑数字时代阅读推广内涵要素,从馆藏文献资源、阅读推广环境、阅读推广人力资源、阅读推广服务、合作与支持等方面构建当前儿童阅读推广评价指标体系,比较符合当前国内阅读推广的现实,对当前儿童阅读推广实践具有一定的导向意义。同时,本研究能进一步丰富图书馆儿童阅读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内容和理论体系,

为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性。在构建阅读推广服务对用户影响相关指标时,设置亲子阅读相关指标未考虑儿童年龄跨度,较为笼统。未来,研究还将进一步调研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实际情况,强化指标体系应用的实操性,结合最新国际国内标准化研究成果,进一步优化评价指标质量,促进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效能提升。

参考文献:

- [1] 公共图书馆宣言[EB/OL].[2022-06-30].<https://repository.ifla.org/bitstream/123456789/691/1/pl-manifesto-zh.pdf>.
- [2] 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EB/OL].[2022-06-30].<http://www.gov.cn/zhuanti/2019qglh/2019lhfgzbg/index.htm>.
- [3] 张怡.全民阅读地方立法保障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21:16.
- [4] 徐阳泰,毛太田,秦顺.儿童阅读权利保障的体系化与标准化:《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童服务规范》解读与启示[J].图书馆建设,2020(3):50-59.
- [5] 王海辉.基于馆配服务的少儿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探讨:以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为例[J].出版发行研究,2018(8):97-100.
- [6] 封晔.儿童阅读推广馆员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分析[D].保定:河北大学,2020:5.
- [7] 杜船.儿童绘本馆室内空间与家具使用后评价研究[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20:71.
- [8] 吴建华,张小雨.贫困地区基层图书馆服务农村儿童阅读实践研究与策略建议[J].图书情报工作,2022(3):4-10.
- [9] 戚敏仪.图书馆面向未成年人阅读障碍症群体服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J].情报探索,2021(3):99-106.
- [10] 陈筱琳.公共文化服务与流动儿童成长关系研究:兼论面向流动儿童的传统文化阅读推广[J].图书馆建设,2021(1):157-166.
- [11] 陈媛媛.公共图书馆特殊儿童阅读权利保障问题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9(9):112-116.
- [12] 毛韵寒.我国公共图书馆少儿分级阅读服务评价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21:20.
- [13] 周璿莉.全民阅读视角下我国儿童读书会发展策略探析[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0(5):48-52.
- [14] 孙蕊.馆校合作儿童阅读推广现状调查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9(12):114-122.
- [15] 唐小姣.多主体合作视角下安徽省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的调查[D].合肥:安徽大学,2018:14.
- [16] 王素芳,孙云倩,王波.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活动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3(6):41-52.
- [17] 张蕴娣,侯明艳.基于“全评价”分析框架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评价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22(2):85-93.
- [18] 周同,谢欢.青少年阅读评价体系初探[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5(6):11-15.
- [19] 刘斯博.图书馆未成年人阅读服务评价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20:22.
- [20] 范华秀.台湾地区“阅读起步走”计划推广十年:成效、困境与展望[J].图书馆,2021(11):76-81.
- [21] 柯平,张瑜祯,邹金汇,等.基于“儿童优先”原则的公共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评估标准研究[J].国家图书馆学刊,2021(5):37-46.
- [22] Bookstart[EB/OL].[2022-06-30].<https://www.booktrust.org.uk/about-us>.
- [23] 唐雅琳.阅读起跑线:荷兰婴幼儿阅读推广项目探析[J].图书馆学研究,2021(12):77-85.
- [24] 卫垌圻,刘颖.儿童图书馆促进读写能力效益评估研究[J].图书馆,2021(5):85-91.
- [25] Every Child Ready to Read 2nd Edition[EB/OL].[2022-06-30].<http://everychildreadytoread.org/evaluation-report>.
- [26] 日本文部科学省.子どもの読書活動の推進に関する基本的な計画[EB/OL].[2022-06-30].<https://www.kodomodokusyo.go.jp/happyou/hourei.html>.

(下转第63页)

我国副省级城市少儿图书馆微信阅读现状及对策研究*

毛志宣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湘潭 411105)

摘 要: 在少儿数字阅读方兴未艾的发展背景下,文章利用网络调研方法对我国副省级城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栏目设置和服务情况、微信小程序的使用状况和功能设置以及微信视频号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以下优化策略:优化微信平台栏目设置,增加特色服务功能;整合微信小程序的服务入口,加大其宣传推广力度;引入“故事类短视频”等,以期少年儿童图书馆微信阅读活动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 数字阅读推广;微信平台;少年儿童图书馆;副省级城市

中图分类号: G258.7; G252.17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mproving Measures of WeChat Reading in Children's Libraries in Sub-Provincial Cities in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reading for children is on the ascendant.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olumn settings and services of the WeChat official accounts of children's libraries in sub-provincial cities, the usage and function settings of WeChat applets and the usage of WeChat video accounts by using web research methods. After that, the following refining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We can improve the column settings of WeChat official accounts and add special service functions. We need to integrate the service entrance of WeChat applets and work to improve their role as a publicity channel. We also need to introduce "short-story videos". We hope this paper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children's libraries' WeChat reading activities.

Key words digital reading promotion; WeChat platform; children's library; sub-provincial city

1 引言

2021年4月23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指出:2020年我国0—17周岁未成年人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为72.3%^[1]。2022年2月2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CNNIC)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未成年网民已达1.83亿,

互联网普及率为94.9%,远高于成年群体互联网普及率^[2]。2022年6月1日,中国少年先锋队全国工作委员会在微信视频号进行直播,共吸引了1 823万青少年和家长一同“上队课”,收获7.3亿次点赞^[3]。随着互联网普及率不断升高,未成年读者更容易接触到数字阅读,并成为数字阅读的重要用户。微信已成为当今人们网上交流的重要工具,也是公共图书馆推广数字阅读的重要媒介。副省级城市的经济文化建设具有代表性,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又能有效助推图书馆的数字阅读推广水平,故选取我国副省级城市的少年儿童图

* 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AI赋能公共图书馆儿童数字阅读推广智慧化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BTQ008)的成果之一。

书馆(以下简称“少儿图书馆”),对其官方微信平台开展调研,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2 文献回顾

笔者以“(少儿+未成年人+青少年+儿童)+少年儿童*微信阅读”为检索式,在中国知网学术平台上进行主题检索,检索到与该主题密切相关的文献14篇,研究内容如下:

(1) 儿童微信阅读需求与行为研究。如李武等学者以上海市初高中生微信阅读为例,对青少年社会化阅读动机^[4]、动机与行为之间的关系^[5]、社会化阅读的使用强度^[6]等进行分析研究。

(2) 儿童微信阅读平台的影响与优势研究。如赵谔炯等人从菜单功能和推送消息两方面对少儿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的应用情况进行研究分析,并提出五个方面的针对性建议^[7];王思楠以天津地区少儿图书馆为例,探究其微信公众平台的应用和运营情况,并提出针对性的优化建议^[8];霍蕾分析了少儿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推广阅读的优势、现状和策略,力求对少儿图书馆推广阅读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有所帮助^[9]。孙威和张际对10家少年儿童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具体服务情况进行研究,探讨特殊时期少儿图书馆微信阅读发挥的特殊作用^[10]。姜珍玉从营销推广的视角对我国少儿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运营问题进行分析,并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措施^[11]。

(3) 少儿图书馆微信阅读推广内容研究。如倪萍选取国内17家少儿图书馆,对其微信公众号的开通情况和阅读推广内容进行分析,利用微信传播指数(Echat Communication Index, WCI)进行阅读推广效果分析,提出了开展多样化微信阅读推广活动等推广策略^[12];万宇、周晓舟以江浙地区6家国家一级少儿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为例,从传播内容、传播受众、传播方式等角度分析少儿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阅读推广的效果,并提出相关建议^[13];陈媛媛通过对国内15个公共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少儿书目推荐消息进行调研,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探讨利用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少儿书目推荐工作的方法^[14];张际对自媒体时代少儿图书馆进行微信阅读推广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措施和策略^[15]。

顾运捷提出优化推广内容、注重粉丝互动、引流

线下阅读的优化策略,以期推进少儿图书馆微信阅读推广^[16]。王茜茹基于公共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研究儿童分级阅读推广策略^[17]。

总体来看,现有成果主要集中于儿童数字阅读的需求与行为研究以及图书馆为儿童开展数字阅读推广的影响因素及推广内容等方面,对于少儿馆如何利用微信平台开展阅读推广的研究则较少,尤其是针对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微信视频号等开展较为深入的儿童数字阅读推广研究更是不多见,而这些正是本文研究价值和意义所在。

3 调研设计

3.1 调研对象

副省级城市的行政级别于1994年2月25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中编[1994]1号)发布后正式实施。目前我国副省级城市有15个,其中省会城市有10个,计划单列市有5个^[18]。由于青岛市、宁波市、哈尔滨市和成都市并未单独设立少儿图书馆,而济南市、南京市和西安市作为省会城市,其所在地的省属少儿图书馆都未单独在微信平台上提供服务,所以此次调研暂未将它们纳入进来。最终确定的调研对象如表1所示。

3.2 调研内容

少儿图书馆利用微信平台为广大读者提供服务的主要渠道是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和微信视频号,这三大渠道也是本次调研的主要内容。参考胡媛等人构建的数字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平台服务评价指标体系,其包括用户个性化、交互能力、知识服务、检索服务、动态通知、易用程度和主动推送7个方面^[19],本次调研即参照这7个方面分别调研微信公众号的栏目设置、功能布局和服务情况。

2017年1月,腾讯正式推出了微信小程序。小程序“即点即用、用完即走”的特点^[20],加上微信众多的用户和社交的属性,使得其成为移动互联时代替代APP的理想方案。随着微信小程序的不断发展,功能性和服务性、个性化越来越被使用者所重视,所以对微信小程序的调研在数量和受认可程度的基础上,着重于小程序的功能和服务两方面。

微信视频号是其推出的短视频平台,日活量已达到4.5亿^[21]。根据数据分析平台清博指数建立的微信

表1 8家副省级城市少儿图书馆基本情况统计表

馆名	建馆时间	是否开通微信公众号	注册时间	是否开通微信小程序	是否开通微信视频号
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2015年3月1日	是	2013年11月	是	否
深圳少年儿童图书馆	2009年4月23日	是	2014年4月	是	是
沈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1951年4月	是	2015年4月	是	否
大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1997年12月27日	是	2017年11月	是	是
杭州图书馆少儿分馆	1999年6月1日	是	2015年3月	是	否
厦门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1986年1月1日	是	2013年5月	是	否
长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1982年	是	2014年9月	是	否
武汉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1958年	是	2015年6月	是	是

视频号传播力指数^[22],本次调研将选取视频号于相同时期内发布的作品进行比较分析,降低作品发布时间差异对传播力指数的影响,并着重统计视频作品的转发量、点赞量和评论量,以探究视频号的传播力指数。

以上三项调研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7月1日至2021年7月31日,2022年4月中旬对相关数据作了跟踪补充调研。

4 调研结果分析

4.1 微信公众号栏目亟需优化,特色服务有待加强

对8家少儿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栏目设置现状进行调研,得知各馆的栏目设置存在部分问题需要优化。首先,少儿图书馆未能充分利用微信栏目数量。微信公众号最多可设置3个一级栏目,15个二级栏目。在调研的8家少儿图书馆中,仅有3家的二级栏目超过了10个,总体来说各馆的二级栏目设置数量偏低,为读者提供的功能和服务数量也受到限制。其次,存在一级栏目和二级栏目内容不对应的问题。部分少儿图书馆在一级栏目后接不相关的二级栏目,如“活动”后接“数字资源”、“服务”后接“活动”、“互动”后接“扫码借书”等。再次,在“数字资源”栏目设置中,还存在资源交叉重复设置的问题。如部分少儿图书馆在两个一级栏目后分别设置数字资源二级栏目,也有将单个数字资源和总体“数字资源”栏目并列设置的情况,使得资源设置的级别不清晰。最后,“互动”功能栏目设置率不高。只有一半的少儿图书馆在一、二级栏目中设置“互动”功能,不利于少儿图书馆在微信平台与读者进行及时的沟通交流。

从具体服务来看,“书目检索”“证(解)绑

定”“活动报名”“入馆预约”“图书续借”等基础性服务在各少儿图书馆的应用率较高,“微信交款”“网上办证”等增值性服务也在部分少儿图书馆中应用。但是,少儿图书馆的特色服务还较为匮乏,8家少儿图书馆中,只有大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的“滨城约书”接入了“嘉图借书”小程序,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能实现在家中借阅纸质图书,比较有特色。从总体来看,少儿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基础服务较为丰富,而特色服务不足,需要加强建设。

4.2 微信小程序功能丰富,但宣传力度不够

首先,从微信小程序的数量来看,8家少儿图书馆共有16个小程序,应用了25次。其中,大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和武汉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有5个在用的小程序,数量最多。厦门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有4个在用小程序,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杭州图书馆少儿分馆和长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有3个,而深圳少年儿童图书馆的2个和沈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的1个小程序排在最后。总体来看,各馆的小程序应用数量差距不大,部分少儿图书馆需要增加小程序应用数量。

其次,从微信小程序的功能分析,“数字阅读”功能有5个小程序,共应用了10次,使用占比达到了40%,最受欢迎。接下来3个“线上教学”和1个“在线朗读”功能小程序,分别应用了5次和3次,应用次数分列二、三位。而数量为2的“进馆预约”“学习/阅读打卡”功能小程序应用分别应用32次,剩下3种小程序功能只有个别少儿图书馆应用。总体而言,“数字阅读平台”小程序是各馆建设应用的热点,调研的8家少儿图书馆都有应用“数字阅读”功能的小程序,而其他功能的小程序应用分散。

最后,从微信小程序受认可度来说,由中国图书

馆协会与众多数字资源提供商提供的一站式资源整合平台“读联体”小程序最受欢迎,共有5家少儿图书馆应用。“博看期刊”和“启航互动+”都有3家少儿图书馆使用,“网络书香 阅见美好”有2家少儿图书馆使用,其余的12个小程序都各只有1家少儿图书馆在使用,受少儿图书馆认可的小程序集中度较高。

虽然少儿图书馆微信小程序功能较为丰富,但其宣传推广力度还有待加强。8家少儿图书馆中,沈阳、大连、杭州、厦门和武汉五家少儿图书馆将小程序设在微信公众号的一、二级栏目,但是只有厦门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在微信公众号的二级栏目中明确设置了“小程序(试用)”的模块,能够提示读者对小程序进行使用。笔者调研的多数小程序都是在少儿图书馆“数字资源”板块中,很多都只是提供简单的介绍和一个小程序码,需要扫码使用,不能直接使用相关功能,使得过程变得更繁琐,降低了读者的使用体验感。此外,在各家少儿图书馆2021年7月的微信消息推送中,也未见对图书馆小程序的相关宣传和推广信息。

4.3 微信视频号使用率低,重视程度不高

微信视频号是2020年1月22日腾讯公司官微正式宣布开启内测的短视频平台^[23]。清博指数依据视频号的特点建立了微信视频号传播力指数^[22],主要的评价指标有发布作品数、转发量、点赞量和评论量,分别代表活跃度、传播度、认可度和互动度。在调研的8家少儿图书馆中,只有大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武汉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和深圳少年儿童图书馆开通了官方视频号,其中深圳少年儿童图书馆还未发布作品,所以使用视频号进行宣传推广的只有大连市和武汉市两家少年儿童图书馆,总体使用率偏低。

为分析两家少儿图书馆微信视频号的传播力,笔者选取了2021年7月31日前两个视频号在同一时期发布的5个视频作品,统计作品的点赞数、转发数和评论数,与微信视频号传播力指数的认可度、传播度和互动度一一对应。从视频主题来说,武汉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以荐书系列活动《这就是好书》为主,而大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则主要记录少儿图书馆开展的活动,主题较为集中单一。从视频的数据进行分析,武汉市少年儿童图书馆视频的平均点赞数为53.4次,远多于大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平均的11次,视频作品的受认可度更高;在平均转发数上,武汉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的32.2次也远多于大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的0.4次,视

频作品的传播度更广;武汉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和大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的平均评论数只有0.8次和0.2次,说明互动度都比较低,还需要加强互动。从微信视频号的传播力指数来看,两家少儿图书馆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需要投入更多的运营力量,增强视频作品的传播力。

5 少儿图书馆微信平台阅读推广优化策略

2018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应当……开展面向少年儿童的阅读指导和社会教育活动,并为学校开展有关课外活动提供支持^[24]。微信平台作为少儿图书馆进行数字阅读和推广的重要平台,在数字阅读的推广中具有重要作用,笔者基于前述调研提出优化策略,期望能够更好地促进少儿数字阅读推广活动的开展。

5.1 优化微信公众号栏目设置,增加特色服务功能模块

少儿图书馆应对推出的服务和功能进行合理的栏目设置。在一级栏目设置中,图书馆应设置重要且高频的服务和功能,方便读者使用。有学者对我国省级以上公共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一、二级栏目进行统计,得出“服务”“资源”和“活动”三种栏目的数量均位居前列^[25]。笔者参照学者的统计结论和少儿图书馆微信平台的发展趋势,建议各少儿图书馆可将服务、活动和资源三大内容设为一级栏目,这三大内容迎合少儿图书馆在微信平台提供服务、开展活动、进行数字阅读推广的需求。在二级栏目设置中,少儿图书馆应充分利用二级栏目的位置,将公众号上提供的功能和服务系统地展示出来,但同时也要尽量避免功能和服务的重合交叉。此外,二级栏目中也应注重“互动”功能的设置。

少儿图书馆特色功能服务可以从服务内容、环境支持和服务交互^[26]3个方面进行建设和优化。在服务内容上,少儿图书馆要注重内容的丰富性、优质性和持续性,强化品牌服务建设。如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的“少图小书虫”系列栏目,以丰富的童书推荐,加上图文并茂的内容介绍,再辅以精彩的音频,让少儿读者享受阅读的视听盛宴。在环境支持上,主要分为物理环境的支持和图书馆员的支持,而微信平台则更侧

重于图书馆员的支持,所以少儿图书馆要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对微信平台的服务环境进行及时的更新和维护,保证特色服务的稳定和持续。在服务交互上,注重的是交互频率和交互形式,少儿图书馆要在特色服务功能的设计中丰富交互形式,除提供微信平台的留言交互、微信读者群的交互之外,还可以设计智能机器人实现24小时的及时交互,为读者解答少儿图书馆的服务和活动,机器人无法回答的内容再由图书馆员于工作时间及时回复,提高交互频率和交互效率,从而提升读者的满意度。

5.2 整合微信小程序服务入口,强化内容建设和宣传推广

少儿图书馆需要整合小程序的服务入口,将图书馆的小程序进行汇总,选择设置在微信公众号的相同栏目下,并标注“小程序”服务字样,方便读者使用。在小程序服务入口整合后,少儿图书馆还需要强化小程序的内容建设,以丰富的内容来吸引读者使用。一方面,各少儿图书馆可以尝试研发高频率的功能型小程序,如汇集进馆预约、图书查询、图书续借等全面的功能,使得读者能够在一个小程序内实现所有的高频功能,提高读者使用小程序的满意度。另一方面,少儿图书馆也可和各机构进行联名合作,制造“爆款小程序”。如敦煌研究院、腾讯和人民日报新媒体联合推出的首个在线体验敦煌石窟艺术的微信小程序——“云游敦煌”,运用VR技术进行仿真模拟,创造出三维的敦煌石窟空间,使受众产生强烈的临场感和更为真实的视觉冲击,带来沉浸式体验。自上线以来,“云游敦煌”已拥有独立用户551余万,获得超2 200万的阅读量,总曝光量突破12亿^[27]。

少儿图书馆加强对微信小程序的宣传推广,对其微信阅读推广有重要作用。首先,少儿图书馆要在微信公众号的栏目中设置明确的“小程序”入口,还应在图书馆每期的推文中介绍小程序提供的功能和服务,形成小程序固定的推送板块。其次,少儿图书馆可以在小程序中设置一些少儿喜爱的动画界面和装饰,以提升小读者的使用观感,促进其再次使用。另外,少儿图书馆也可在小程序中添加O2O社会化服务功能^[28],为读者提供便捷的线上、线下服务。最后,各少儿图书馆还能将小程序应用到读者活动中,进行“嵌入式宣传”,让参与活动的读者直接体验图书馆的小程序功能,例如进行小程序资源的专题亲子答题

活动,或者使用图书馆的“打卡”小程序进行亲子阅读打卡等。

5.3 积极探索运营微信视频号,引进“故事类短视频”

首先,在视频拍摄主题的选择上,少儿图书馆不能仅局限于馆内单一的活动主题,需要探索更丰富的活动主题,如积极进入校园、艺术馆以及博物馆等关联性强的机构联合举办活动,共同选取视频拍摄主题,进行联动宣传推广。如深圳少年儿童图书馆联合深圳市各中小学共同建设的“常青藤”项目,实现了图书馆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图书通借通还,构建了深圳市少年儿童文献保障体系,开展了深圳市中小学生阅读推广活动,可以探讨进一步的视频阅读推广合作^[29]。其次,少儿图书馆在视频的拍摄主题选择上还可以紧扣热点话题,如重大的节日和活动,以及和少儿相关的时事热点,新颖的主题更能吸引广大读者观看的兴趣。最后,在微信视频号作品的宣传推广上,知名互联网博主白玉珊在其著作《视频号掘金》^[30]中提到,视频号最核心的推荐机制——社交关系链推荐,就是视频号作品被点赞或转发后会被系统自动优先推荐给其好友,增加视频的曝光率。所以少儿图书馆可以主动寻求视频号作品的点赞、转发,可以由馆内工作人员率先进行点赞和转发,并鼓励各自的亲朋好友帮忙点赞、转发,利用好馆员的自有流量,再将视频作品嵌入公众号文章,并在公众号文章中引导读者进行观看点赞和转发。少儿图书馆还可以建立读者交流群,并由馆员进行运营,将视频作品发布在群里,鼓励群内成员点赞和转发,并收集读者对视频作品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善视频内容,为读者呈现更加优质的视频作品,从而得到更好的视频传播效果。此外,少儿图书馆在视频号的发布时要注重加入定位信息,视频号平台会优先将设置了定位的作品推送给定位附近可能感兴趣的用户,扩大视频传播效能。

笔者认为针对精力不易于长时间集中的少年儿童,可以引入“故事类短视频”,吸引其观看兴趣。“故事类短视频”以3—5分钟为宜,可以以少儿读者喜爱的动漫片段为切入点,为读者讲述小故事,故事的内容要简单易懂且积极向上,能让小读者看完觉得有趣且有收获。图书馆还可以探索和当地的电视广播台进行合作,由专业的播音主持人为小读者讲述“故事类短视频”,进一步增加视频的质量。同时,少儿图书馆在发布短视频时可以将视频作品适合观看的年龄

进行标示,可以使得视频的内容是相应观看读者所能理解的,提升视频的观看体验和选择视频的效率,让“故事类短视频”成为小读者喜爱的视频栏目。

参考文献:

- [1] 澎湃新闻.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权威发布[EB/OL].[2022-03-30].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369739.
- [2]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2-04-10].<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
- [3] 网易.六一“云队课”获赞7.3亿次! 微信发布青少年模式数据报告[EB/OL].[2022-07-10].<https://www.163.com/dy/article/H8SI94PU0550AXYG.html>.
- [4] 李武.青少年社会化阅读动机研究:以上海初高中生微信阅读为例[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4,40(6):115-128.
- [5] 李武,吴月华,刘宇.青少年社会化阅读动机与行为之关系研究:以上海市初高中生微信阅读为例[J].图书情报工作,2014,58(23):61-68.
- [6] 李武,陈美玲,肖洋.上海市青少年社会化阅读的使用强度分析:以微信阅读为例[J].科技与出版,2015(1):99-103.
- [7] 赵谓炯,石焕发,郭帅.少儿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应用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7(8):119-123.
- [8] 王思楠.微信公众平台在少儿图书馆的应用:以天津地区为例[J].图书馆建设,2019(S1):89-94,102.
- [9] 霍蕾.少儿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推广阅读的优势研究[J].传媒论坛,2021,4(15):125-126.
- [10] 孙威,张际.特殊时期少儿图书馆微信阅读价值研究[J].山东图书馆学刊,2020(3):87-90.
- [11] 姜珍玉.少儿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运营实证研究[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0(12):69-72,82.
- [12] 倪萍.少儿图书馆微信阅读推广研究[J].数字图书馆论坛,2017(6):58-64.
- [13] 万宇,周晓舟.少年儿童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阅读推广传播效果研究:以江浙地区国家一级少年儿童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7(10):110-117.
- [14] 陈媛媛.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公共图书馆少儿书目推荐工作研究[J].四川图书馆学报,2019(5):89-92.
- [15] 张际.自媒体时代少儿图书馆微信阅读推广研究[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8(3):64-69.
- [16] 顾运婕.自媒体时代少儿图书馆微信阅读推广研究[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0,40(2):139-140.
- [17] 王茜茹.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公共图书馆儿童分级阅读推广策略初探[J].晋图学刊,2020(4):46-51.
- [18] 看点时报.副省级城市的来历 副省级城市的确立[EB/OL].[2022-05-01].<http://qd.efang.tv/qd/2021/0322/37300.html>.
- [19] 胡媛,曹阳.数字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平台服务质量评价研究[J].现代情报,2017,37(10):58-65.
- [20] 黄悦深.我国图书馆微信小程序应用调查[J].图书馆学研究,2020(12):37-43.
- [21] 信息时报.微信视频号日活已达4.5亿[EB/OL].[2022-03-30].https://www.xxsb.com/content/2021-07/22/content_156865.html.
- [22] 清博指数.微信视频清博指数[EB/OL].[2022-03-30].<http://www.gsdata.cn/site/usage-19>.
- [23] 人民网.内测视频号微信“亲征”短视频[EB/OL].[2022-05-10].<http://media.people.com.cn/n1/2020/0123/c14677-31560591.html>.
- [24] 中国人大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EB/OL].[2022-05-10].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2017-11/04/content_2031427.htm.
- [25] 王丽丽,于纯良,张晓青.我国省级以上公共图书馆移动服务发展现状调查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9(15):14-21. DOI:10.15941/j.cnki.issn1001-0424.2019.15.003.
- [26] 钱明辉,徐志轩,陈相仪.中外公共图书馆特色服务类型识别与比较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20,64(5):60-70.
- [27] 赵哲超,王昕.媒介记忆视域下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以微信小程序“云游敦煌”为例[J].新闻与写作,2021(3):99-102.

(下转第70页)

· 阅读文化 ·

基于图书共借数据的阅读社群分析*

潘文佳

(南京图书馆 江苏南京 210018)

摘 要: 高校图书馆里存在一种别样的阅读社群, 会员之间虽然并不相识但是共读一本书, 共享作者建构的意义空间。文章利用复旦大学图书馆开放图书借阅数据集建构图书共借网络模型, 以网络模型中形成的25万个大小各异的阅读社群为研究对象,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考察其规模和数量特征, 以及时间、空间和成员角色等形态特征。文章总结归纳出高校图书馆依托共借数据建立阅读社群的三大优势, 即“满足普遍的读书会弹性参加意愿”、“具有时空累积优势”和“营造社交式阅读环境”, 并提出“建立读者评论机制”和“打造虚拟阅读社群”两项推动阅读社群建设举措, 以期促进阅读社群的持续发展。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 读书会; 图书共借网络; 阅读社群

中图分类号: G258.6

文献标识码: A

Reading Community Analysis Based on Book Sharing Data

Abstract There is a different kind of reading communitie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Although readers do not know each other, they read the same book and share the meaning space constructed by the author. The article uses the open book lending data set of Fudan University Library to construct a book co-borrowing network model. Based on the 250,000 reading communities of different sizes formed in the network model, the article applie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to examine their scale and quantity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ime, space and members' roles.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three strengths of establishing reading communities by relying on co-borrowing data, namely, "satisfying the public's willingness of flexible participation in reading clubs", "spatial and temporal accumulation", and "creating a social reading environment". The paper also proposes two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reading communities, namely, "establishing a reader review mechanism" and "creating a virtual reading communit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ading communities..

Key words university library; reading club; book lending network; reading community

1 引言

2022年4月首届全民阅读大会在北京开幕, 习近平主席^[1]在贺信中指出,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 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 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长

期以来, 阅读推广活动就受到各大高校以及图书馆的重视。曹桂平^[2]发现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阅读推广活动规模可观, 发展成熟, 但大陆地区阅读推广还处于起步阶段, 存在诸多不足。吴惠茹^[3]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大学生普遍愿意参加高校阅读活动, 但由于高校读书会数量较少且宣传不足, 真正参与活动的大学生只有8.2%。杨淑琼等人^[4]认为因休闲娱乐方式增多,

* 本文系江苏省图书馆大数据课题“面向精准服务的图书馆用户画像和智慧推介研究”(项目编号: 2021JSTD030)的成果之一。

阅读兴趣下降,阅读呈现出碎片化、浅层化、功利化现象,高校图书馆需重视读书会阅读推广方式。向剑勤等人^[5]调查显示,大型读书推广活动的影响已大不如前,急需探索新的阅读推广模式。吴波^[6]提出图书馆阅读推广需要寻找一条有利于师生健康发展又契合大众阅读心理和阅读习惯的有效途径。

当前,高校图书馆里的非专业图书往往是借阅的重点,且师生共借同一本图书是常见的现象,师生之间存有泛阅读、浅阅读的交流意愿。本文从一个全新视角提出高校图书馆可以依托图书共借网络促成师生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从而推动阅读活动在高校的进一步发展。

2 阅读社群的形成

阅读是作者与读者之间跨越时空的对话,在对话中作者只有一次发言机会,而读者只能倾听、没有发言机会,这种受限的对话模式给阅读带来了困难。由于读者没有发言机会,读者的疑惑和见解将无法表达,独立阅读者只能尝试借助新媒体技术来打破传统阅读时空局限性。由此,有着相同阅读偏好的读者逐渐凝聚在网络中形成一个个阅读社群,并在社会层面、功能层面为阅读推广带来了契机。

在图书共借网络中的阅读社群是指因存有图书共借关系而建立起来的读者群体。他们或许彼此相识,或许不认识;读者或许是学生,或许是教职工;读者可能来自相同院系,也可能来自不同院系;甚至他们可能不在同一时间段里出现在这所大学;由于共同阅读过同一本书,他们被视作围绕这本书构建的阅读社群成员。成员之间并不知晓彼此的存在,他们的阅读行为是一种孤独的个人行为。通过图书共借网络建立起成员之间的联系,他们的阅读将呈现出社群化倾向,他们可以互相交流、互相讨论、提出问题、回答疑惑、碰撞观点。他们的阅读会更深,阅读的效果会更好。阅读社群的发掘是图书馆深度导读功能的体现,有助于提升读者服务质量,进而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将得到更好地放大和体现。

3 阅读社群的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图书借阅数据是图书馆日常运营的基础数据。如何利用图书馆中现有大数据提升读者服务质量成为图书馆工作者普遍关心的话题。本文选取2021年第三届“慧源共享”高校开放数据创新研究比赛提供的复旦大学图书馆2015—2020年间部分图书外借和归还记录作为高校图书馆阅读社群研究的数据来源。

数据集总共有160余万条记录,记录了复旦大学图书馆5.5万余名读者对44万余种图书的借阅行为。每条记录描述了图书信息、读者信息以及借阅行为信息。图书信息包括图书题名、作者、ISBN、出版社、馆藏地、索书号等字段。读者信息包括读者借书证号、读者身份(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教师等)和读者所在院校等字段。借阅行为信息主要是借阅图书和归还图书的时间。

3.2 建模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7]是探索实体之间关系的有效工具,阅读社群是对图书与读者、读者与读者之间关系的描述,因此本文选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图书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将图书和读者两类实体抽象为社会网络中的节点,将读者与图书之间的借阅关系抽象为社会网络中的连边,形成的这类网络集合称为图书共借网络。图1是图书共借网络的示例,图中正方形节点代表图书,圆形节点代表读者,图书节点与读者节点之间的连边代表读者借阅过这本书。图书与图书之间、读者与读者之间没有连边。图1中阅读社群抽象为图书共借网络中的一类子网络,所以构建图书共借网络是研究阅读社群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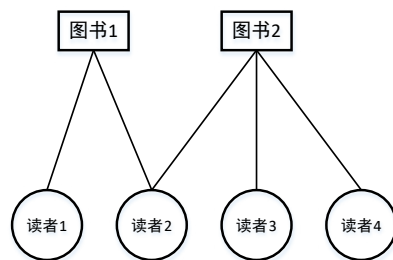


图1 图书共借网络示例

3.3 复旦大学图书馆图书共借数据情况

以复旦大学图书馆图书共借数据集建模形成的图书共借网络,共包含49.5万个节点,分别由5.5万个读者节点和44万个图书节点组成;总共包含142万条连边,低于160余万条借阅记录,原因是存在一名读者重复借阅同一本书的现象,模型中一名读者重复借阅一

本书的行为被处理为同一条连边。分析图书共借网络的连通性时发现该网络由865个大小不等的互不连通的子网络构成,其中最大一个不连通子网络包含485 456个节点,占节点总数的99.56%;其余互不连通的子网络节点总数仅占全部节点的0.45%,这些互不连通的子网络主要由冷门读物组成,且阅读过这些读物的读者的图书借阅量普遍偏低。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高校图书馆里的图书共借网络规模巨大,且绝大多数图书和读者在共借关系的作用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连通网络。它们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探索共借网络中的各种关系以及关系之间的形成模式,将有助于加深对“读者与图书馆”关系的了解。

4 阅读社群的研究分析

依据社会网络类型进行划分,阅读社群在图书共借网络中被称为个体网,图书是个体网的中心,读者是个体网的边界成员。对阅读社群的研究主要考察其规模和数量特征,以及时间、空间和成员角色等形态特征。

4.1 阅读社群的规模和数量

一本书拥有了两名读者即可视作一个阅读社群。在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图书共借网络中,阅读社群的最大规模为229人,由《组织病理学彩色图谱》一书的读者群构成,读者来自基础医学院、医学试验班、中山医院等15个院系,主要读者群体是本科生,也有硕士生、博士生、教师和医生等读者类型;从图3中可以发现,图书馆中总共拥有24万个阅读社群,其数量远远大于一所大学通常能够组织的几个或数十个有形读书会,阅读社群存在巨大的潜在价值。从阅读社群的规模分布特性可以看出,规模为“2”的阅读社群数量最多,随着阅读社群规模的增加,阅读社群的数量呈指数级下降;规模小于“6”的阅读社群超过19万个,占阅读社群总量的80%。读者阅读的小众化是阅读社群的典型特征,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促进这些小众化阅读社群成员间的交流,无疑会带来巨大的价值。与此同时,读者规模在20人以上的阅读社群也有6千多个,这些阅读社群或许可以成为组织线下读书会的潜在群体(见图2)。

4.2 阅读社群的时空特征研究

高校图书馆中拥有数量庞大、规模各异的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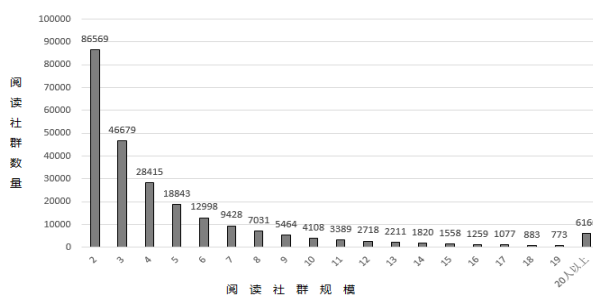


图2 复旦大学图书馆阅读社群规模和数量

社群,这些阅读社群的形成源于时间和空间维度的累积。线下阅读活动要求成员在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聚集,正是在这种聚集活动中,成员之间才得以互相交流、碰撞观点、解答疑惑,但也正是这种聚集的要求限制了线下阅读活动的发展,使得在当时没有时间或者无法赶到现场的读者错过了读书会活动。高校图书馆里的阅读社群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图书是读者之间连接的唯一渠道,无论他们何时读过这本书,无论他们来自哪个校区、哪个院系,他们都被视作这个阅读社群的成员。

在时间累积效应下,阅读社群的规模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总共有三种增长模式:线性增长模式、对数增长模式和锯齿型增长模式,三种模式的增长曲线如图3所示。线性增长模式是阅读社群中最常见的增长模式,该模式源于图书持续地被不同读者借阅,是图书馆中最理想的增长模式;对数增长模式中,阅读社群的规模在最初增长迅速,但是随着时间的增加,规模的增长速度逐渐下降,形成该模式的原因或许是该种图书的丢失、读者对该书热度的下降等;锯齿型增长模式是指阅读社群的规模在短时间内迅速增长,在一定时间内又趋于平稳没有增长。这种增长模式源于读者集中性借书,形成的原因或许是某门课程开设以后急需该种图书。三种增长模式是阅读社群作为一个有机体随着时间的增加而逐渐变迁的内在特性,都反映出阅读社群的时间累积特性。

阅读社群的空间累积效应表现在读者来源广阔,不局限于特定校区和特定院系。尤其在图书通借通还制度支撑下,读者的阅读共享活动进一步摆脱空间束缚。仍以规模为“2”的8万多个阅读社群为例,76%的阅读社群由来自不同院系的读者构成,24%的阅读社群成员来自相同院系。阅读社群成员的空间累积效应不仅表现在院系构成多样化上,而且表现在读者身份的多样化上。高校图书馆的读者身份主要有



图3 阅读社群规模随时间增长的三种增长模式

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以及教职员工等类型，他们之间有各自独立的活动空间，各个群体之间的交集不大，但是在阅读社群中却表现出交融状态。仍然以上述阅读社群为例，37%的阅读社群成员属于同一读者类型，63%的阅读社群由两种及以上不同身份的读者组成。由此可见，阅读社群是构建高校图书馆读者之间连接的桥梁。

4.3 阅读社群个案分析

以小说《追风筝的人》读者群形成的阅读社群为例，讨论该阅读社群的形态特征和潜在价值。该社群的阅读关系如图4所示，图中最中间的节点代表图书《追风筝的人》，图形节点代表本科生，盾形节点代表硕士生，水滴形节点代表博士生，星形节点代表教师。图书与读者之间存在一条连边，代表节点间的阅读关系；读者之间如果属于同一院系，也建立一条连边以表征读者之间的空间关系。该阅读社群包含120名成员，其中本科生58人，硕士生47人，博士生8人，教师7人。成员来自38个不同院系，管理学院人数最多，有22人，在图的右上区域形成一个凝聚性较强的子群体，该群体主要包含本科生、教师和硕士生；经济管理试验班人数次之，有13人，在图中右下区域形成了一个凝聚性相对紧密的凝聚子群；其余人员比较均匀地分散在各个院系中，凝聚特性并不明显。

这些成员来自不同院系、分属不同角色，他们之间或许彼此认识，或许不认识；他们不必在同一空间里共读此书，也不必在同一时间里共读此书。他们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共享作家卡勒德·胡赛尼建构的意义空间，他们属于共同的一个阅读社群。如果能够通过某种途径建立起读者之间的联系，他们的阅读将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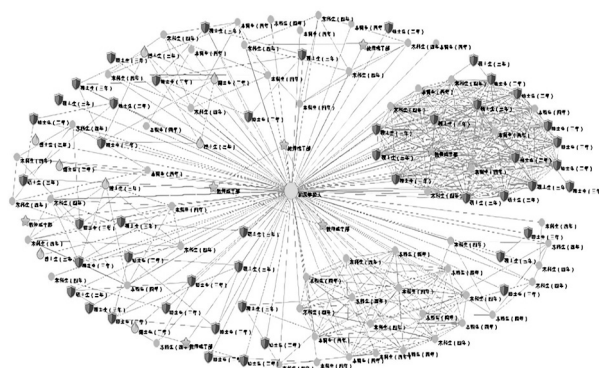


图4 《追风筝的人》阅读社群网络结构

有深度、更有价值，图书馆的平台作用功能将得到进一步体现。

5 阅读社群的价值体现

高校图书馆依托共借数据建立阅读社群，是推动阅读活动在高校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高校图书馆建设阅读社群具有以下优势。

5.1 满足普遍的读书会弹性参加意愿

高校图书馆作为阅读推广主阵地之一，理应加大阅读活动推广力度，但图书馆有限人力和物力资源难以支撑大规模线下读书会的举办。而阅读社群是建立在以读者需求为导向、兼顾运维成本的线上社群，具有随时互动、自愿参与等特点。这与高校师生弹性阅读习惯相契合。因此，阅读社群模式可以作为一种长效阅读推广方式，帮助图书馆以最少投入满足高校师生普遍的读书会弹性参加意愿。

5.2 具有时空累积优势

高校各类阅读社团众多，例如有形读书会、阅读协会等，但真正能吸引读者参与线下阅读活动的社团偏少，读者难以在现场找到共同兴趣爱好者，而本文讨论的阅读社群能够发挥时间、空间累积效应，在图书共借网络中有较强的凝聚特性。即便是最有个性化的读者，伴随着时空累积变化，也能在共借网络中找到因趣结缘的“书友”，逐渐形成阅读社群。

5.3 营造社交式阅读环境

阅读社群是一种以阅读为核心、以校友关系为纽带的新型阅读社交模式。在这种社交化阅读形式下，每位读者都可以成为“领读者”，能够加深成员之间的密切交流，更易形成观点上的碰撞、情感上的升华，以此满足阅读与社交的需求。对于读者来说，与

一本好书不期而遇是一种机缘,而在阅读社群中,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书友会聚在网络,共享读者构建的“意义空间”,更加显得难能可贵。

6 阅读社群发展策略

立足高校图书馆发展现状,结合高校师生阅读行为特点,本文提出两项阅读社群建设建议。

第一,建立读者评论机制。读者评论机制帮助阅读社群成员之间建立历时沟通,主要包括点赞打分和文字评价两种类型。点赞打分是阅读后评论图书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也是阅读前发现“好”书,过滤“坏”书的有效工具。文字评价则是读者进一步表达观点、抒发感情的方式,高质量的书评也是其余读者阅读前的“导读”。豆瓣的打分已经成为当前人们阅读图书、观看电影的重要参考标准。大学师生的打分将更具有代表性和价值性,长期积累的图书评论也将成为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的依据,甚至会成为作者了解读者的重要渠道。图书馆无需另起炉灶建立图书评论系统,利用mashup技术^[8]在原有OPAC系统基础上升级改造是比较高效且成本低廉的方法,主要的改变包括在图书版权页面新增图书评论界面以及在后台数据库中新增图书评论记录。

第二,借助微信群打造阅读社群。图书评论机制

是一种历时交流工具,无法满足读者之间的即时通讯需求,微信群将弥补这一缺陷。微信已经成为当前最流行的即时通讯和社交网络工具,大学师生几乎人人使用微信,微信群是阅读社群成员间及时交流的有效工具。微信群二维码具有七天后自动失效特点,因此不可直接使用二维码作为推广虚拟阅读社群的工具。图书馆可以申请专门的读者服务微信号作为读者与微信群之间交流的桥梁。读者添加微信以后需要向工作人员表达入群意向,工作人员向读者表达入群规则后即可邀请读者入群。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同样可以作为读者与微信群之间交流的桥梁且覆盖面更广。图书馆不必针对每一本书建群,可以根据读者借阅规律,以作者、中图法分类号、学科、学院或主题为中心建立专门微信群,甚至建立图书馆读者服务大群,供读者之间阅读交流。如果各类虚拟阅读社群规模较大、数量较多,图书馆应当安排专人维护群秩序,营造良好社群氛围。

此外,除了虚拟阅读社群,还有其他发挥阅读社群潜在价值的方法,比如生成社群书单。推荐书单是图书馆提升借阅量的常用做法。传统的书单通常由专家经验推荐或者根据统计方法发现,但这种书单的生成忽略了用户的社群属性,在个性化阅读时代缺乏针对性。而根据阅读社群生成的书单将更具针对性,更符合读者的潜在阅读需求。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举办的贺信[EB/OL].[2022-04-23].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2-04/23/c_1128588166.htm.
- [2] 曹桂平.我国高校图书馆读书会现状与发展对策探讨[J].图书情报工作,2015(2):44-50.
- [3] 吴惠茹.高校读书会对学生个体成长的影响及其推广策略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6(2):105-109.
- [4] 杨淑琼,牛波.“图书馆+社团”读书会阅读推广模式实施策略探析[J].情报探索,2021(2):112-116.
- [5] 向剑勤,徐小帆,曹桂平.浙江省读书会发展现状调查研究[J].图书馆研究,2017,47(2):11-16.
- [6] 吴波.阅读推广视角下高校图书馆读书会实践研究:以湖北工程学院图书馆为例[J].河北科技图苑,2016,29(5):74,75-77.
- [7] 刘军.整体网分析:UCINET软件使用指南[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77-82.
- [8] 朱思渝,陈琳.Mashup在图书馆的应用[J].现代情报,2008(6):142-144.

作者简介:潘文佳,南京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信息技术与图书情报服务。

收稿日期:2022-04-21

本文责编:孙晓清

· 信息素养 ·

新文科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四级信息课程体系”创新理论研究

钟 戈

(辽宁科技大学图书馆 辽宁鞍山 114051)

摘 要: 文章分析了高校图书馆信息课程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创新性提出了新文科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四级信息课程体系”理论框架,具体是从一年级到四年级依次设置阅读鉴赏课程、文献检索课程、文献评价课程和成果转化课程,并分别从教学目的、教学重点和教学方式及考核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

关键词: 新文科; 高校图书馆; 信息课程; 信息素养; 四级信息课程体系

中图分类号: G252; G258.6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Theory of the "Four-Level" Information Curriculum System"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Liberal Arts

Abstract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information course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four-level" information curriculum system"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liberal arts is innovatively proposed. Specifically, a reading appreciation course, a literature retrieval course, a literature evaluation course and a results transformation course are set up from the first year to the fourth year, and the specific contents are elaborated in terms of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priorities, teaching methods and assessment.

Key words new liberal arts; university library; information course; information literacy; Four-Level Information Curriculum System

新文科建设是当今高等教育领域最热门、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2018年8月,中共中央在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之前的文件里正式提出“高等教育要努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正式提出了新文科概念,教育部也颁布多项举措大力推进新文科建设。具体来说,新文科是以新科技革命、新经济发展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背景,突破传统文科的思维模式,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为途径,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推动传统文科的更新升级^[1]。可见,它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创新。近年来,信息素养教育是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的重点,也是高校的重要职能之一,而信息课程是高校开展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要手段,因此,在新文科背景下,高校图书馆信息课程创新发展就成为业界研究的热点。

1 高校图书馆信息课程现状

根据1984年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的意见》和2015年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2],多数高校图书馆已经开设了信息检索类课程,并且打造了许多精品课程(见表1)。从表1中能看出,信息课程以文献检索课为主,少数高校图书馆会结合专业特点和实际应用开设其他相关课程。其中开展比较好的有清华大学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和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山东大学图书馆,由于篇幅所限,除了表1中列出的课程之外,其还开设了“发现图书之美”“中西文学比较”“中国学术评价”“经济情报”和“文献

阅读”等极具特色的课程,可以说是开展信息课程的典范。但是在调研中也发现,一些经济相对落后和偏远的地区由于资金和设施不足,信息课程开展得还不够好,学生信息能力还不够强。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并结合当前形势,我们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新经济时代和新文科背景下,传统的文献检索课是否是信息课程的全部?是否完全等同于信息素养教育?是否能够满足学生对于知识的需求?下面,笔者通过查阅资料并结合多年教学实践分析当前信息课程存在的问题。

2 高校图书馆信息课程存在的问题

2.1 课程设置单一

绝大多数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方式就是通

过文献检索课,而且多年来一成不变。虽然有一些图书馆能够针对文、理科学生分开授课,但毕竟是少数且细分程度也不够,从实际效果上来看也是形式大于内容,存在应付了事的现象。究其根本,还是重视程度不够,不能做到与时俱进,改革创新。

2.2 教学方式传统

高校图书馆信息课程主要以灌输式教学为主,按照固定的教学计划授课,教学内容也都以信息检索基础理论结合数据库操作为主^[3],没有创新性,且受课时限制,只能泛泛地讲。由于缺乏互动性和针对性,教学效果不理想,学生独立解决问题和自主创新能力得不到提高。

2.3 专业人才匮乏

多数高校图书馆拥有图书情报专业背景的馆员少,从事信息教育的人员也不足,且多为兼职,学历、

表 1 我国部分高校图书馆信息课程情况一览表

高校图书馆名称	课程名称	学时学分	课程属性	授课对象	授课内容
清华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概论	1	选修	本科生(低年级)	现代图书馆运作规律、资源整理过程,以及主要资源和服务
	文献检索与利用	1/2	选修	本科生(中高年级,化工、理工、社科)	理论+数据库操作
	文献检索与工具书利用	2	选修	本科生(社科及艺术类)	理论+数据库操作,讲解不同工具书的基本特征、使用方法和评价标准
	信息素养——学术研究的必备能力	1	选修	本科生	帮助学习者以批判性精神发现和利用信息,将已有知识和社会学习目标融合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1	必修	研究生	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资料搜集、排版撰写、投稿、相似性检测、答辩等
	信息资源获取与专题应用	1	选修	研究生	理论+实践操作
北京大学图书馆	电子资源的检索与利用	38/2	选修	全校	介绍数字资源内容,掌握各类数据库检索方法,掌握网上查找知识并分析应用、管理知识的技能
山东大学图书馆	信息检索	16/1	选修/必修	本科生(文科、理工)	理论+数据库操作
	医学文献检索	24	选修/必修	本科生、研究生分开授课	理论+数据库操作
	文献获取与利用	16/1	选修/必修	研究生	理论+数据库操作
东北大学图书馆	信息检索与利用	16/1	选修	本科生	基础知识、综合性学术信息检索、特种文献检索、毕业论文及综述写作
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	文献信息检索	30/2	选修	本科生	数据库操作、学术课题案例分析等
	毕业论文写作精讲精练	30/2	选修	本科生	学士学位论文选题、资料搜集、排版撰写、投稿、相似性检测、答辩等
	文献信息检索	30/2	选修	研究生	数据库操作、文献软件、数字参考咨询论坛、论文写作与投稿
华中师范大学	文献信息检索	1	选修	本科生	理论+数据库操作
上海大学	文献检索	25/2	公共基础课	本科生(文科、理工)	理论+数据库操作
中国石油大学图书馆	信息检索与网络资源利用	32/2	选修	全校	理论+数据库操作

注:本表只收录了正式列入学校教学计划的课程。

专业水平和科研能力不够,不能满足一些高层次信息课程的教学任务,一般的普通院校也不容易吸引到高素质人才,这成为制约信息素养教育普遍开展的关键因素。

2.4 硬件设施不齐全

硬件设施和技术平台是开展信息课程、提升信息素养教育水平的保障^[4]。多数高校未设置信息素养空间,开展教育实践的地点多为电子阅览室,有些经济不发达地区的高校条件更差,硬件设备老旧,教学效果不理想。

2.5 评价反馈机制不健全

好的评价反馈机制能够修正教学过程中的不完善环节,及时发现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学习难点,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目前来看,这方面还比较欠缺,评价反馈制度不健全、体系不完善、标准不科学、方法不规范等情况普遍存在,学生与老师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不能及时发现问题,教学和培训目的性不强。

3 高校图书馆“四级信息课程体系”

综合上述原因,在新文科背景下,高校信息素养教育模式必须进行创新改革,从信息课程的角度来看,仅开展文献检索课教学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因为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每个年级对信息素养的要求是不同的,用一种教育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需求^[5]。笔者认为,应该按年级设置“四级信息课程体系”,从一年级到四年级依次开设阅读鉴赏课程、文献检索课程、文献评价课程和成果转化课程,前一级课程是后一级课程的基础,类似金字塔结构,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如图1所示,主要教学环节如表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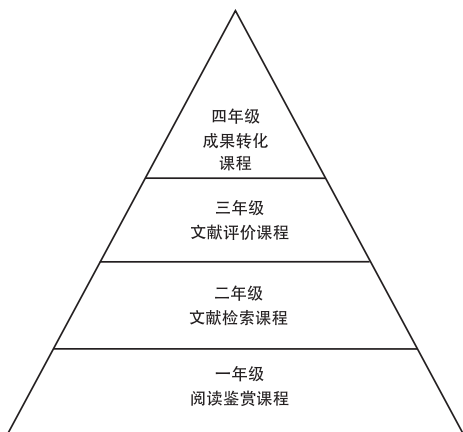


图1 高校图书馆“四级信息课程体系”

表2 “四级信息课程体系”主要教学环节

年级	课程	教学目的	教学重点	教学方式	考核方式
一年级	阅读鉴赏	提高阅读能力,培养信息意识	阅读鉴赏、阅读方法、联系实际	翻转课堂、启发式教学、案例教学	读书笔记
二年级	文献检索	掌握检索技能,提高信息获取能力	理论知识、常用中外文数据库操作	上机操作、自学辅导模式	上机考试
三年级	文献评价	掌握文献优选方法,为学术研究打基础	CSCD、ESI、JCR等评价工具用法	案例教学、上机操作、分组讨论模式	评价报告
四年级	成果转化	扩大成果影响力,创造社会价值,培养学术诚信意识	学术论文、基金项目和专利	案例教学、协作研究模式	申报书

3.1 一年级——阅读鉴赏课程

3.1.1 教学目的

阅读鉴赏是信息课程和信息素养教育的基础,也是终身受益的能力,应该在一年级时设置阅读鉴赏课程^[6],解决阅读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让一年级新生在刚进大学校园时就知道应该读什么和怎么读,指导他们制定读书计划,培养信息意识。此外,还要注重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课后的自主学习。

3.1.2 教学重点

(1) 提高鉴赏能力,包括阅读材料的选择、欣赏和评价能力。在新经济时代和新文科建设的大背景下,阅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阅读内容也是丰富多彩,时常令我们眼花缭乱,这就需要我们擦亮双眼,选择适合我们且有用的文献阅读^[7]。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网上看书、看文章和看新闻,但是互联网上的书籍和文章鱼龙混杂,因此,本课程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提高大学生的阅读鉴赏能力,解决应该读什么的问题,使他们学会选择适合自己并具有正能量的书籍阅读。

(2) 培养阅读方法。根据阅读对象不同,这部分讲授的重点包括精读和泛读两部分^[8]。精读就是要细读多思,反复琢磨,反复研究,边分析边评价,务求明白透彻,以便吸取精华,对本专业的书籍及名篇佳作应该采取这种方法。可以说,精读是最重要的一种读书方法,注重的是阅读深度,可以通过讲授视觉定焦训练、视觉幅度训练和专注力训练等阅读方法帮助学生掌握和运用。泛读即广泛阅读,指读书的面要广,要

广泛涉猎各方面知识,不仅要读自然科学方面的书,也要读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古今中外各种不同风格的优秀作品都应广泛地阅读,以博采众家之长,开拓思路。泛读注重的是阅读广度,可以通过讲授通读、速读、跳读等阅读技巧并结合实例使学生理解和掌握。

(3) 注重联系实际。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与青年学生分享了他的读书心得,并提出“学术、知识不能只是在嘴上,要联系实际,做到知行合一、格物致知、学以致用”。大学生阅读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看的书很多,每次看完之后也会有很深的感触,但过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后就会忘记书上所讲内容和道理,这就是缺乏活学活用与联系实际的能力,导致理解不深。授课过程中要着重讲解联系实际的方法,强调要以辩证思维作为出发点,以突出问题导向为原则,并结合大量典型案例来说明这个过程,同时要认识到,该项能力的提高需要长期有意识的训练来完成。

3.1.3 教学方式及考核

本课程教学重点是阅读方法和应用性,教学方式上要勇于打破传统模式,可采用翻转课堂和启发式教学等新型教学方法^[9],激发学生创新思维,调动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学习不再枯燥无味。由于联系实际的能力是本课程的重点和难点,应该作为考核内容,具体可以通过自选或指定阅读材料写读书笔记,要求写出体会的同时要突出与现实的结合。

3.2 二年级——文献检索课程

3.2.1 教学目的

文献检索课是信息课程的初级阶段,各高校基本能够按教育部要求开设,但开设的年级有所不同。笔者认为,在二年级开设文献检索课比较合适,能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本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信息获取能力,帮助其掌握基本检索技能,为毕业论文的撰写和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打基础。

3.2.2 教学重点

本课程注重的是培养学生实际操作检索文献的能力,因此,教学内容要本着轻理论、重实践的原则,着重对于常用的中、外文数据库进行讲解和操作,除了中国知网、万方、数字化博硕士论文文摘数据库等常用数据库外,还应该加强对环球英语、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和工程索引等国内外知名且极具实用价值的数据库的讲授,此外要增加学生上机操作的课时。

3.2.3 教学方式及考核

本课程的教学重点是数据库操作和一部分理论知识,教学方式以上机操作演示为主,CAI(Computer Aided Instruction, 计算机辅助教学)教学为辅,此外,可以在教学环节中结合PBL(Problem-Based Learning, 问题式学习)教学法^[10]与自学辅导模式^[11],即提问→自学→解疑→练习→反馈过程,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提高教学针对性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增强创新意识^[12]。考核方式可以采用上机开卷考试形式。

3.3 三年级——文献评价课程

3.3.1 教学目的

文献评价是情报报道工作中对科学技术文献的学术价值的评估,是情报刊物编辑工作的重要内容^[13]。开设文献评价课,就是针对毕业论文、课程设计和课题研究等检索到的文献进行研究型选择,即文献优选,是信息素养教育的中高级阶段,为个性化学习和高层次学术研究打下基础。

3.3.2 教学重点

文献评价主要是在特定数据库中,通过有效的检索技术手段导出相关数据,并结合不同数据库综合给出结论,下面几个常用数据库应该作为教学重点。

(1) CSCD(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创建于1989年,收录我国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农林科学、医药卫生、工程技术和环境科学等领域出版的中英文科技核心期刊和优秀期刊千余种,内容丰富、结构科学、数据准确,被誉为“中国的SCI”^[14]。该数据库提供引文索引功能,使用该功能,用户可迅速从数百万条引文中查询到某篇文献被引用的详细情况,还可以从一篇早期的重要文献或作者入手,检索到近期发表的相关文献,对交叉学科和新学科的发展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CSCD还支持获取全文。

(2) 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基本科学指标)。ESI是一个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以科学计量分析为基础,衡量科学研究绩效、跟踪科学发展趋势的权威分析评价工具^[15]。课程要详细介绍如何通过ESI确定在某个研究领域有影响力的国家、机构、论文和出版物,以及研究前沿,突出分析思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还要介绍

它的评价功能,如分析某个公司、研究机构、国家以及期刊的科学研究绩效;跟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研究发展趋势;分析评价员工、合作者、评论家以及竞争对手的能力;测定某一专业研究领域内科学研究成果的产量和影响力等。

(3)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s,期刊引证报告)。JCR是许多作者选择目标期刊的常用工具,能够帮助用户决定投稿方向,也是判断文献质量的指标。要详细介绍它对参考文献的标引和统计功能,重点说明JCR分区及其作用,此外,还要讲解如何分析引用和被引期刊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上三个数据库是文献评价常用工具,还有一些在二年级讲授的中、外文数据库,比如CNKI、EI、SCI等也可以作为辅助评价工具。讲解过程中要注重检索技能,同时也要结合大量实例,注重培养学生分析检索问题的思路。同时,针对不同专业可以介绍不同的评价工具。

3.3.3 教学方式及考核

本课程教学重点是教会学生如何从大数据中找到所需信息,涉及到复杂检索工具的使用,需要运用专业检索技术,属于信息课程的中高级阶段,宜采用CAI结合上机操作的教学方式,可以结合分组讨论模式授课。考核方式可以通过考查的形式,设定某研究方向,综合运用多个检索工具完成文献评价报告。

3.4 四年级——成果转化课程

3.4.1 教学目的

成果转化课程是信息课程的高级阶段,对于高校来说主要包括撰写和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申请各级基金项目 and 专利等,旨在帮助学生最大限度扩大学术科研成果的影响力,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16]。此外,培养学术诚信意识也是本课程的一个教学目的^[17]。鉴于该课程对老师素质要求较高,开设之前应该做好人才引进和培训工作。

3.4.2 教学重点

(1)撰写学术论文。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预测性上具有的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上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18]。按写作目的,可将学术论文分为交流性论文和考核性论文。对于大学阶段教育来说主要包括学位论文、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本课程应该对于学位论文各环节,包括选

题、开题报告、结题报告和撰写格式进行详细讲解;期刊论文要重点讲授如何获取本专业学术前沿和研究方向,并介绍论文格式和投稿方法;会议论文要根据授课学生的专业,归纳出所属学科领域重要的国际或国内会议,并说明会议论文投稿的流程和注意事项。

(2)申报基金项目。首先,教会学生如何获取本专业相关基金的立项信息;其次,对申报基金的流程和关键环节作详细说明^[19],强调选题的重要性,学习掌握当前热门研究领域和研究的规律性,选题范围不要太宽泛也不能太过狭窄,要对自己的研究能力和研究范围有清醒的认识,具备严谨的科学态度,注重内容的准确性;最重要的是申报书的填写,框架要完整,主要内容要写透,预期目标要明确,强调重点和难点且着重突出创新点;最后,还要介绍一下评审的流程。

(3)申报专利。主要分三部分讲授:第一部分介绍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三种专利类型;第二部分对申报流程作详细说明,申请专利需提交的文件包括请求书、说明书、权利要求书、摘要、图片或者照片等;第三部分介绍审批程序,包括受理、初审、公布、实审以及授权五个阶段,讲解过程中要强调我们国家的专利审查制度是:对发明专利申请采取早期公开,请求审查制即实质审查;对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按《专利法》采取初步审查形式^[20],审查的主要内容为申请文件是否符合要求,有无重复授权,是否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妨害公共利益,是否属于不给予专利保护的发明创造等,既有格式审查,也包含了部分必要的实质性审查,经初步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做出授予专利权的决定并予以登记和公告。在公报上公布后,期限内若无异议即予授权。这部分内容对于多数大学生来说平时不容易接触到,比较抽象,属于超前学习内容,讲授中必须要结合所教学生的专业举例,将申报专利的整个流程讲清楚。

3.4.3 教学方式及考核

本课程旨在增强学术研究意识,充分挖掘学生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潜力,由于涉及尖端科研领域范畴,对于本科生来说有些抽象,必须要结合大量案例教学,还要注重思想意识方面的引导。同时,可以结合协作研究模式,通过问题→研讨→报告→答辩→评

价这种新型授课方式,使学生理解并加深记忆。由于四年级已经进入学位论文筹备阶段,因此,与学位论文相关内容不适合直接拿来作为课程考核部分,应该将考核内容放在基金或专利上,比如可以指定或自选

主题撰写基金或专利申报书,通过这个环节能够使生对于基金或专利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丰富其知识维度,培养其创新思维,为将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 [1] 新文科[EB/OL].[2022-04-06].<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6%96%87%E7%A7%91/23137059?fr=aladdin>.
- [2] 张怀涛,慎明旭,岳修志,等.文献检索课的发展历程与发展对策[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1,29(3):81-85.
- [3] 解宇.高校图书馆文献检索课程的现实之困与应对策略[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7(S1):72-73,79.
- [4] 《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信息素养的研究与实践进展[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4:4.
- [5] 李军.大学生信息素质课程“三层次”设计:高校图书馆组织教学探讨[J].图书情报工作,2009,53(17):80-83.
- [6] 赵俊颜,凌征强.高校图书馆开展阅读课程的探索和实践研究:以“优秀著作选读课程”为例[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4,34(11):52-54.
- [7] 李倩,郭倩倩.基于用户类型划分的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策略选择研究[J].图书馆,2020(6):72-79,100.
- [8] 王荣生.阅读策略与阅读方法[J].中国教育学刊,2020(7):72-77.
- [9] 永辉,唐艳华,胡巧婕.基于微课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和探索:以工具书与文献检索课程为例[J].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1,25(3):41-44.
- [10] PBL教学法[EB/OL].[2022-04-12].<https://baike.baidu.com/item/PBL%E6%95%99%E5%AD%A6%E6%B3%95/23412641?fr=aladdin>.
- [11] 自学辅导模式[EB/OL].[2022-04-12].<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5%AD%A6%E8%BE%85%E5%AF%BCE%E6%A8%A1%E5%BC%8F/17015437?fr=aladdin>.
- [12] 管凤贞,林包明.基于分解模式“理论+翻转+PBL”下的混合式文献检索课教学研究与实践[J].图书馆学研究,2021(16):16-21,81.
- [13] 文献评价[EB/OL].[2022-04-13].<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7%8C%AE%E8%AF%84%E4%BB%B7/12593027>.
- [14] CSCD[EB/OL].[2022-04-15].<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7%A7%91%E5%AD%A6%E5%BC%95%E6%96%87%E6%95%B0%E6%8D%AE%E5%BA%93/1305301?fromtitle=CSCD&fromid=130592&fr=aladdin>.
- [15] ESI[EB/OL].[2022-04-15].<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478182566.html>.
- [16] LIU DAYONG,MENG QIAORAN,DUAN WENBIN.The impac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on the cultivation of new economic driving force: Evidence from 230 cities in China[J].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2021,24 (7):49-65.
- [17] GE HUILIN.Research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tegrity Issues and Governance Strategies in the Declaration of Science Fund Projects[J].Bulletin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2020,34 (5):645-651.
- [18] 学术论文[EB/OL].[2022-04-20].<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A6%E6%9C%AF%E8%AE%BA%E6%96%87/4023535?fr=aladdin>.
- [19] 高阵雨,杨文辉,刘益宏,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高校基础研究分析:以2013—2020年获批高校中的相关数据为例[J].中国高校科技,2021(12):16-19.
- [20] 金玉成,程龙.高校专利申请质量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7(4):39-42.

作者简介: 钟戈,硕士,辽宁科技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文化相关领域。

收稿日期: 2022-10-08

本文责编: 李芳

· 信息素养 ·

后疫情时代公共图书馆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的路径研究^{*}

——以嘉兴市为例

杨 柳 葛文娟 陆艳芳

(嘉兴市图书馆 浙江嘉兴 314001)

摘 要: 随着后疫情时代的来临,如何应对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的迫切需求,弥合老年人“数字鸿沟”,是亟需研讨的问题。文章基于恩格斯托姆的活动理论和嘉兴市图书馆“夕阳红e族”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项目实践,构建公共图书馆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的服务框架,解构解析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的六大要素,并提出落实图书馆主体责任、明晰老年人数字化需求、构建开放联动的协作组织体系、强化资源互融共通、完善老年人数字素养服务规则、创设老年人数字化共享生态系统等路径,以期为推动积极老龄化、弥合社会数字鸿沟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 后疫情时代;公共图书馆;老年人;数字素养;活动理论

中图分类号: G258.2; G254.97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Improv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he Elderly in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A Case Study of Jiaxing

Abstract It is a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discussed how to respond to the urgent need to improve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he elderly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and 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 among them. Based on Engstrom's activity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of the "Sunset Red E Group" project of the Jiaxing Library, this article deconstructs and analyzes the six major elements and constructs a service framework for improv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he elderly in public libraries. The article proposes several solutions to implement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the library and improve the digital literacy training capabilities of librarians; clarify the digital needs of the elderly; build an open and linked collaborative organization system;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improve the digital literacy service rules for the elderly; and create a digital sharing ecosystem for the elderly. These measures are expect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active aging and bridging the social digital divide.

Key words post-epidemic era; public library; elderly; digital literacy; activity theory

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生活与工作日益数字化成

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特征,尤其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为疫情防控而推行的“一码通行”“行程卡”等,彰显了科技创新带来的智慧生活便利。但与此同时,老年人掌握数字化技能的速度与数字科技飞速发展之间

^{*} 本文系浙江省图书馆学会2021年度立项资助学术研究课题“后疫情时代下公共图书馆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的路径研究——以嘉兴市为例”(项目编号: Ztx2021A-2)的研究成果之一。

逐渐拉开距离,相当一部分老年人为“码”所困,不会甚至不敢“触网”^[1],一道“数字鸿沟”让老年人生活及出行力不从心。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9》报告统计,世界人口的年龄正在增长,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人群增长最快^[2],全球老龄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2021年5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60岁以上人口为2.64亿,占总人口的18.7%,到2030年占比将达到25%左右,人口老龄化加剧^[3],老年群体与日新月异的数字化社会“数字鸿沟”问题将日益凸显。

公共图书馆是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阵地,担负着社会教育职能,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开展数字技能培训的理想场所^[4]。早在2017年8月,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FLA)就发表了《关于数字素养的声明》,倡导图书馆为公民数字技能培训和学习提供机会,呼吁利益相关者——政府、教育机构、经济部门支持图书馆并帮助其开展数字素养行动^[5]。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将发展数字经济、加强数字社会与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全民数字技能等作为重要内容^[6]。随着后疫情时代的来临,如何加快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提升,应对数字化的社会生活,实现数字融入,是促进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关系国计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性课题。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实践现状

2.1 活动理论及其在图书情报领域的应用

活动理论蕴含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内涵,最早由苏联著名心理学家维果斯基提出理论基础模型,将“活动”作为基础单元进行研究分析^[7]。20世纪70年代后期,恩格斯托姆提出了第三代活动理论,包含了活动的主体、客体和共同体三个核心要素,以及工具、规则和劳动分工三个次要要素。其中共同体指作用于主体和客体的活动参与者;规则主要指活动运行过程中的规范约束,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主要作用于主体和共同体;劳动分工用于协调主体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总之,活动理论是通过活动系统框架构建深刻理解人类活动的内外环境因素及相互

关系。恩格斯托姆活动理论框架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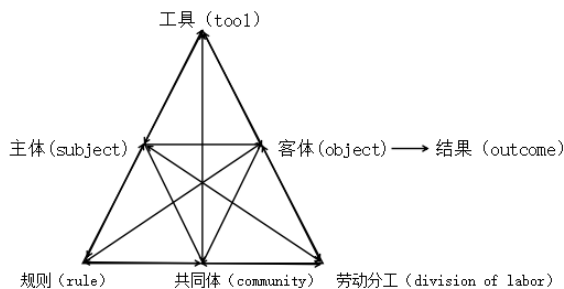


图1 恩格斯托姆活动理论框架模型

目前活动理论在图书情报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为图书情报学科研究提供概念指导和分析框架。如马祥涛等人基于活动理论框架模型及其内涵探究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框架^[8];潘琳等人基于活动理论,通过实地调研探析儿童早期阅读服务的模式及其掣肘因素^[9];王贺等人借助类型理论与活动理论探究嵌入用户信息素养的信息服务实践^[10];江秋菊借鉴活动理论的相关框架与内涵,明晰高校图书馆开展社会服务的系统要素并构建活动框架^[11];孙晓宁等人借助活动理论解析社会化搜索行为的要素、系统与层级结构,以及认知和任务执行过程^[12]。综上,活动理论作为一种分析框架,为图书情报领域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尤其是在信息行为、信息素养等方面的研究中,将理论模型与活动实践相结合,实现问题情境下的定性研究。但活动理论支撑下的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接近空白。

2.2 图书馆老年人数字素养研究与实践现状

数字素养又称数字能力。欧盟是数字素养的主要推动者,早期研究者认为数字素养是数字时代的读写能力,不仅包含数字工具使用技能,更包含思维方式^[13]。2018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发布了《数字素养全球框架》,构建了硬件和软件操作、信息与数据、交流与协作、数字内容创造、安全伦理、问题解决、职业相关的能力七个方面数字素养能力^[14]。欧洲国家使用数字素养概念更多,中美使用信息素养概念较多,伴随着中国数字经济不断壮大,政府出台的相关“发展规划”“实施方案”等文件都使用了“数字素养”表述^[15]。数字素养与信息素养相比,数字素养更注重对数字工具的利用和应对数字环境的应变能力。在后疫情时代,老年人接触智能手机的程度加深,不再满足于单纯信息的获取,而转为利用数字化

的方式与角度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16],这对老年人提升数字素养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验。

目前在学界研究方面,关于“老年人数字素养”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外老年人数字素养教育模式对比^[17]、公共图书馆数字素养教育体系构建^[18]、国外弥合老年人数字鸿沟的举措^[19-20]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在“后疫情+数字化”的新生态下,也催生出了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的更多方向与内容。

在业界实践方面,国外在数字素养提升方面较为领先,如美国通过资助机构开设数字扫盲课程^[19];新加坡推出帮助老年人了解数字化的网站——IM银网站,并提供视频指南,教授老年人使用移动设备和数字技术^[20]等。国内很多公共图书馆也在提升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方面做了很多尝试,譬如开设学习空间,提供智能手机、计算机技术和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培训,如昆山市图书馆开设老年人智能手机培训班;重庆市北碚图书馆开设“常青e路幸福夕阳”短视频知识讲座等。一方面,培训内容和分类比较零散,没有形成体系化的课程和教材;另一方面,只提供短期培训,没有形成常态化服务。总之,在开展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服务方面还没有形成阅读推广服务那样“如火如荼”的积极场面,更没有形成业界联盟,还处在“蜻蜓点水”阶段。

3 活动理论支持的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框架及要素分析

在活动理论视角下,后疫情时期的图书馆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不再是传统馆员和老年人的单纯互动,而是以图书馆和老年群体作为活动系统中的主客体与系统内其他多个要素相互影响和互动的总和。本研究将活动理论与嘉兴市图书馆(以下简称“嘉图”)“夕阳红e族”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项目的活动实践相结合,构建公共图书馆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的服务框架(见图2)。

“夕阳红e族”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项目自2008年开始探索,近年来不断优化升级,从老年人生理、心理特点出发,利用图书馆资源和专业优势,组建以馆员为核心并纳入志愿者服务的团队,开发体系化课程,建立常态化培训和辅导机制,实现嘉兴市全域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提升。此项目于2021年8月被评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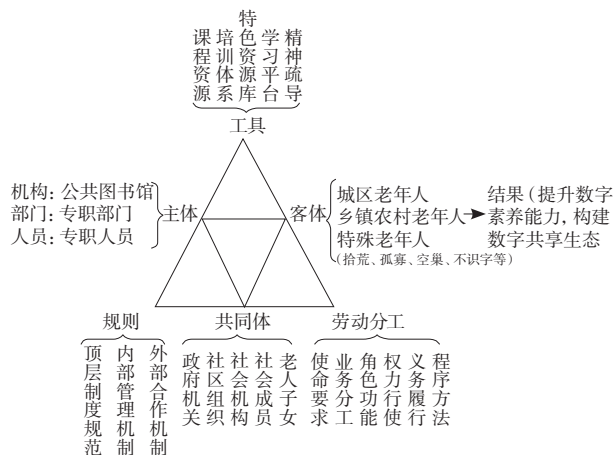


图2 公共图书馆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项目的服务框架

“2020年度浙江省社科普及创新项目”,在全省发挥示范普及作用,助推老龄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弥合社会数字鸿沟。

3.1 主体要素：公共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在整个活动运行系统中置于主体地位,活动执行中又细分到具体职能部门和专职馆员。嘉图“夕阳红e族”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项目是由总馆打造服务样本,再依托图书馆城乡一体化服务体系推广到嘉兴全域。目前该项目由总馆信息技术与服务部主导,部门1名主管和5名馆员协同负责。主管负责宣传、招募、课程主题及日期安排和培训志愿者,同时协调、指导分馆开展该项目。各分馆馆长根据总馆提供的培训活动方案,自行安排培训场次和主题。以总馆为例,目前电子阅览室有电脑60台,投影仪2个,教师机1台。现因疫情防控需要,每场活动可容纳30人。

“夕阳红e族”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项目每年开班分春(3—6月)、秋(9—12月)两期,每期分基础班和提高班,基础班结束自动进入提高班,每一期学员人数大约在120—150人。每天上午开展培训2个小时,由馆员讲授40—60分钟,再一对一辅导。如因疫情无法开展线下培训时,转为线上直播。截至2021年底,总分馆共举办线上线下培训4 000余场。

3.2 客体要素：老年人

结合客体要素的概念界定,本文将服务对象划分为三类:城区老年人、乡镇农村老年人、特殊老年人。

“夕阳红e族”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项目服务的老年群体也大致涵盖上述三类。以2021年春季122名学员为研究样本,男性占比35%,女性占比65%。城区老年人占比63.93%;乡镇农村老年人占比36.07%。特殊老

年人(残疾)2名,占比1.6%。60岁及以下占比7.69%;61—70岁占比37.18%;71—79岁占比42.31%;80岁及以上占比12.82%。综上,老年学员中,女性占比高,且大多结伴学习;城区老年人总体文化程度高于乡镇农村老年人,对数字素养的需求较高;特殊老年人虽零星几个,但其数字素养需求仍需给予关注;61—79岁年龄段的老年人占比最高,是图书馆数字素养培训的重点关注群体。除此之外,老年人渴望接受数字素养培训,数字信息处理能力薄弱,会搜索信息和识别虚假信息的分别占11.11%和10.58%,对待虚假信息和不良言论仅有极少数人会举报^[21]。嘉图馆员在培训中观察发现,老年人学习效果与其需求、学习意愿和学习频次成正比。大部分老年人坚持一周2次,为期4个月的学习,基本能独自解决日常生活中的数字技能使用问题。同时通过学习交流,减少了老年人因退休或生理等各种原因带来的空虚感和失落感,情感需求也得到了满足。

3.3 共同体要素: 政府机关、社区组织、社会机构、社会成员及老人子女

共同体要素指的是公共图书馆开展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服务过程中各参与者的集合体,包括政府机关、社区组织、社会机构、社会成员及老人子女等。疫情期间,嘉图主动与社会机构跨界合作,联合支付宝老年大学共同制作并发布9期线上教学视频,半年内教学视频观看量达500余万人次;同时联合社区、乡镇分馆打造总分馆“同步课堂”,由总馆确定课程直播时间,各分馆按时组织老年学员同步学习,并在直播结束后安排馆员进行实时辅导。2021年期间,总分馆“同步课堂”开展10次,每次有近8家分馆参与(有些分馆因电子设备不足,无法开展),累计辅导老年学员达500余人次。嘉图还采取“馆校合作+社会招募”的模式组织志愿者参与老年人培训辅助工作。如与嘉兴学院数信学院共同合作建立社会实践基地,学院学生定期来馆一对一辅导老年人;通过志愿汇组织版APP招募社会志愿者,将馆外多元人才引入馆内,担任老年人的培训讲师,教授老年人抖音APP使用、PS图片处理等专业课程。自2014年开展志愿服务以来,吸引了1 828名青年学生和社会成员的加入,至今服务了“夕阳红e族”老年人超过2 112人次。仅2021年,志愿汇组织版APP里社会成员志愿服务时长就达1 032.9小时。目前,志愿者讲师队伍稳定成员有26

人,讲课完成率96.4%。

3.4 工具要素: 课程资源、培训体系、学习平台等

工具要素在活动系统运行中为活动核心要素提供辅助,在培训中主要包括针对老年人设计的课程资源、培训体系、学习平台、特色资源库以及精神层面的疏导等。针对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提升要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学习需求,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22]。目前“夕阳红e族”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项目包括电脑基础操作、智能手机应用等内容,并在疫情期间增设关于突发疫情应急相关的内容(见表1);嘉图还为老年人编写简易版教材,目前已印发的教材有《电脑基础知识系列》《电脑操作提高班系列》《电脑打字系列》《手机应用系列》等;同时开通微信直播平台,每周进行1—2次直播,与各分馆联动构建线上线下同步课堂,方便老年人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复习课程。截至2021年底,线上直播平台共录制400多节课程,访问量近25万人次。

表1 嘉图“夕阳红e族”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项目部分培训内容

培训主题	培训内容	培训课时
电脑基础操作	电脑打字、硬件基础知识、操作系统入门、文件操作、浏览器操作、电子邮件收发、360安全卫士、网络信息下载与保存、Word应用	16
智能手机应用	手机基础设置、如何连接WiFi、反诈APP应用、微信应用、饿了么应用、去哪儿旅行APP、百度地图APP、淘宝应用、美图秀秀、抖音APP、车来了APP	16
疫情应急相关内容	健康码和行程卡的申请与操作指南、老年朋友如何远离疫情骗局、数字伦理与网络行为规范、诈骗案例与防范、如何辨别疫情谣言、核酸检测预约与查询、疫情焦虑情绪疏导	8

3.5 规则要素: 顶层制度规范、内部管理机制、外部合作机制

在活动理论中,规则要素的加持可以有效规避各要素之间的无序状态。健全完善的制度规范应该是由上自下、由内之外地进行全方位设计,能够为图书馆开展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服务提供法律支持、政策支持、经费支持甚至人力支持。嘉图在开展“夕阳红e族”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项目过程中,以《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等政策为指引方针,由馆领导把控项目方向,专职部门和人员

落实活动进度;在活动内部,针对老年人制定了学习规范、学习打卡制度,开通了学习反馈渠道;针对志愿者,制定了《“夕阳红e族”志愿者服务须知》《“夕阳红e族”志愿者申请表》《“夕阳红e族”志愿者报名与服务情况表》等;与外部合作机构,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主要涉及活动前内容的审核、活动中的把控及活动后的反馈,逐步形成结构合理、体系完善的规则体系,实现数字素养提升服务的可持续性发展。

3.6 劳动分工要素:协调各参与群体的关系

劳动分工要素主要针对主体、客体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协调。公共图书馆开展老年人数字素养服务离不开政府、社区组织、社会机构、社会成员以及老人子女等多个共同体的共同参与、协作服务。因此,“夕阳红e族”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项目在开展过程中,嘉图一直与各参与群体保持沟通。以邀请中国建设银行(嘉兴分行)为老年人宣传防诈骗为例,活动开展前,嘉图首先针对老年人做好内容宣传,确定活动时间和地点;其次,事先审核中国建设银行防诈骗活动的内容,严禁商业诱导行为的存在;活动过程中,馆员辅助中国建设银行宣讲员帮助老年人了解诈骗知识,提高老年人防骗意识;活动结束后,馆员收集各方反馈,与老年人及银行方交流,为后续活动的完善总结经验。通过这样的活动流程,久而久之明确各自的使命要求、业务分工、角色功能、权力行使、义务履行、程序方法等协作内容,以便更好地在服务中形成合力。

4 后疫情时代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路径

公共图书馆以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能力为导向,基于活动理论的提升策略关键在于解决好主体(公共图书馆)、客体(老年人)和共同体(社会参与)的社会化协作问题,同时构建基于工具(资源平台)、规则(机制体制)和分工(协作方式)的辅助支撑系统。

4.1 落实公共图书馆主体责任,提升馆员数字素养培训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对老年教育应当加强领导,统一规划,加大投入。”^[23]为保障老年人的权益,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政府行为,落实公共图书馆服务主体责任,给予公共图书馆财政支持与经费保障,建立文化主管部门的管理考核机制,将老年人数字素养培

训的开展情况等纳入年度考核指标。公共图书馆应建立数字素养服务模式,从自身做好数字素养内容和资源的筹划准备,紧跟数字化发展形势,学习常态化数字素养应急教育模式,提前准备好数字素养服务应急预案。同时,因馆员的职业情感和用户情感投入直接影响数字素养培训服务的质量,应加强馆员对老年群体的情感投入。老年人因退休或生理等各种原因脱离社会群体,易出现寂寞、怀旧情绪,空巢现象也加剧了老年人的空虚感和失落感,这些都要求馆员在培训老年人时富有爱心和耐心。

4.2 明晰老年人数字化需求,全方位推动老年人数字融入

针对老年群体网络技术的普及率不高,数字素养缺失现状,公共图书馆应该紧跟后疫情时期的数字发展动向,建立系统培训机制。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深入了解老年人遇到的数字困境,明晰城市、农村、特殊老年人的数字化需求,重视老年人数字设备使用能力、数字内容产出能力以及数字安全辨别能力的培育,形成系统的课程资源和成熟的培训体制,使老年人的数字能力能够与其需求相匹配。同时,公共图书馆也应增加老年人应对疫情的心理疏导培训,强化老年人面临突发紧急情况的安全意识,提高老年人辨别网络虚假信息的心里认知。进而在后疫情时代常态化的社会生活中,满足老年人的数字化需求,全方位推动老年人数字融入。

4.3 加强共同体多元参与,构建开放联动的协作组织体系

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是一个综合、动态、开放的系统性工程,离不开社会内外环境的交互。因此,公共图书馆作为服务主体全面投入时,要积极引入共同体的多元参与,共同构建成一个开放联动的协作组织体系。通过外部合作规则的政策导向,引导和推动地方公共图书馆与社区组织、社会机构形成联动,在公平、均等、普及的服务架构下,帮助社区、乡镇农村等获得图书馆资源和平台的使用权。同时,优化志愿者服务规则,通过组织专业化服务引导志愿者参与。公共图书馆可以与各组织协作开展数字素养的技能培训、案例分享、知识竞赛等活动,借助外部主体影响力与号召力提升实践效果

4.4 多措并举强化工具效能,促进资源互融共通和传播共享

后疫情时代,老年人数字素养培训应适应线上学习模式。一方面,公共图书馆可以整合数字资源,建立老年人特色资源数据库,以老年人搜索信息行为和习惯为主题来设置类目,便于其查找所需信息,提高老年人利用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兴趣。另一方面,重视构建数字素养学习平台。公共图书馆可以联合高校、政府部门、数据库商家与互联网企业共同构建数字素养学习平台,促进各种资源的互融共通,借助线上平台实现广泛传播共享。其三,构建在线交流平台。在图书馆网站开辟有关健康、金融、社交和教育课程的老年人专属栏目,为他们提供便于线上沟通交流的平台,并提供信息、社交与情感等支持。

4.5 完善老年人数字素养服务规则,全面促进老年人数字包容

规则的完善是指导老年人数字素养服务的前提与标准。通过规则牵引始终保障老年人享受数字素养服务的权利,充分释放资源优势和政策导向服务。一是通过放权赋能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激发公共图书馆、社区组织、社会机构和社会成员等多方参与活动,为老年人数字素养服务普及化奠定基础。二是优先形成具有老年人数字素养培训环境适应性的规则体系。通过制定和完善老年人数字素养服务的发展政策,为老年人培训环境建设提供政策保障。三是加强公共图书馆内部管理及外部合作机制的构建,以方便协同开展老年人数字素养服务。

4.6 科学分工合作,构建老年人数字化共享生态体系

为更好地形成老年人数字素养服务的氛围,必须打通并构筑分工明确和有效协同的工作体系^[24]。公共图书馆应充分利用既有协作关系,整合馆内外资源,构筑线上线下数字素养资源培训体系,融合其他来自政府机构、社会各行业的专家资源库,协同多重社会力量,由政府层面引导形成合力,通过共同目标、共建模式、协同机制的确立,构建起一个多方参与、科学布局、协同作战、分工明确的数字化共享生态体系,催生老年人数字素养服务的外生动力。

5 结语

老年人的数字素养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应齐头并进,嘉图“夕阳红e族”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项目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并结合活动理论阐述了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的六大要素,针对性地提出化解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困境的路径策略,有效解决了公共图书馆设备、场地、人员不足的困难,形成了从总馆到分馆可复制可推广的服务模式,取得了显著社会效益,受到业内外广泛关注。而在后疫情时代,我国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服务方面的研究仍稍显不足,后续笔者及研究团队还会结合老年人的普遍需求和个性化需求,坚持开展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培训,持续跟踪研究,并不断研究完善老年人数字素养能力测评机制,以期为业界推动积极老龄化、弥合社会数字鸿沟提供参考借鉴。

参考文献:

- [1] 陈英.老龄化背景下公共图书馆促进老年人数字包容服务探究[J].黑龙江科学,2020(19):148-149,153.
- [2] 刘述.积极老龄化视角下我国香港老年人数字融入路径研究[J].中国远程教育,2021(3):67-75.
- [3] 央视新闻.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全国人口共14.1178亿人[EB/OL].[2021-05-1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9425596936709331&wfr=spider&for=pc>.
- [4] 董甜甜,李全.《数字技术政策中的图书馆:政策领域、机制、做法》解读与启示[J].图书与情报,2021(19):126-132.
- [5] 孙玉枝.《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图书馆的影响[J].河南图书馆学刊,2006(5):5-6,16.
- [6]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EB/OL].[2021-01-12].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 [7] WANG L.Cultural-historical activity theory and domain analysis: Meta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 information science[J]. Information Research,2013,18(3):C23.
- [8] 马祥涛,王毅.基于活动理论的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框架构建与要素分析[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1(5):61-69.
- [9] 潘琳,周荣庭.活动理论视角下儿童早期阅读服务社区化模式构建研究[J].中国出版,2021(7):67-70.

- [10] 王贺,付少雄,赵海平.嵌入用户信息素养的信息服务实践研究:基于类型理论与活动理论视角[J].图书馆,2019(2):72-78.
- [11] 江秋菊.活动理论视角下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理论模型构建要素研究[J].国家图书馆学报,2020,29(2):69-78.
- [12] 孙晓宇,赵宇翔,朱庆华.社会化搜索行为的结构与过程研究:基于活动理论的视角[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8,44(2):27-45.
- [13] GILSTER P.Digital Literacy[M].New York: Wiley and Computer Publishing,1997:12.
- [14] LAW N,WOO D,DE LA TORRE J,et al.A global framework of reference on digital literacy skills for indicator 4.4.2[EB/OL]. [2020-02-13].<https://uis.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p51-global-framework-reference-digital-literacy-skills-2018-en.pdf>.
- [15] 高欣峰,陈丽.信息素养、数字素养与网络素养使用语境分析:基于国内政府文件与国际组织报告的内容分析[J].现代远程教育,2021(2):70-80.
- [16] 马捷,姚艾昕,毛若竹.后疫情时代图书馆公民数字素养培育模式创新[J].图书与情报,2021(2):75-83.
- [17] 罗艺杰.中美老年人数字素养教育对比研究[J].四川图书馆学报,2018(6):75-79.
- [18] 刘露.多方联动的公共图书馆数字素养教育体系构建与实施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9.
- [19] 李成波,闫涵.美国弥合老年人数字鸿沟的策略及启示[J].青年记者,2020(6):82-83.
- [20] 闫玉荣.新加坡提升老年群体媒介素养的启示[J].青年记者,2019(4):86-87.
- [21] 杨柳,汤益飞,吕炜.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老人信息素养培训案例研究:以嘉兴市图书馆“夕阳红e族”为例[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0(12):64-68.
- [22] 胡秀丽,蒋香.图书馆职业专业化的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建设探讨[J].黑河学刊,2018(6):175-176.
- [23]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法制图书编辑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9:8.
- [24] 庄晓娟.图书馆数字素养服务研究与思考[J].四川图书馆学报,2019(4):6-9.

作者简介: 杨柳,嘉兴市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信息服务、数字素养;葛文娟,硕士,嘉兴市图书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为阅读推广、读者服务;陆艳芳,硕士,嘉兴市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阅读推广、参考咨询。

收稿日期: 2022-02-25

本文责编: 王晓琳

(上接第39页)

- [27] 柯平,宫平.公共图书馆服务绩效评估模型探索[J].国家图书馆学报,2016(6):3-8.
- [28] 樊长军,张馨,连宇江,等.基于德尔菲法的高校图书馆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构建[J].情报杂志,2011(3):97-100,169.
- [29] 段美珍,初景利,张冬荣,等.智慧图书馆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解析[J].图书情报工作,2021(14):30-39.
- [30] 常莉,张豪.公共图书馆服务成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1(3):10-15,39.

作者简介: 陈红艳,博士,湖北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信息组织、阅读推广;罗媛,硕士,湖北省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阅读推广。

收稿日期: 2022-07-28

本文责编: 王晓琳

· 信息素养 ·

开放学习时代的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需求调查^{*}

吴礼志 王珂 杨毅

(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 湖北武汉 430079)

摘要: 开放学习对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影响以及开放学习环境下信息素养教育如何发展是信息素养教育者关心的问题。文章调查了开放学习环境下633名高校读者的信息素养状态,从信息意识、信息能力、信息需求偏好等角度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发现学习环境的改变并不等同于读者总体信息素养水平的提升,但信息素养教育的重心已经发生改变。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应正视读者的信息需求变化,强化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将信息资源评估纳入到信息素养教育的重心范畴;加强线上教育的广度和深度,培育线上信息素养教育团队;积极创造条件开展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

关键词: 信息素养;信息素养教育;高校图书馆;开放学习

中图分类号: G254.97; G258.6

文献标识码: A

Investig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Needs of Libraries in the Open Learning Era

Abstract The impact of open learning on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in libraries and how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develops in an open learning context are issues of concern to educators in this field. The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status of 662 college readers in the open learning environment.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dat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formation awareness, information competence, and information need preferen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ange in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does not equate to the improvement of readers' overall information literacy level, but the focu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has changed. Library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should address the changing information needs of readers and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Information resource assessment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scope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online education and build online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teams. We must actively create conditions for embedded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Key words information literacy;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university library; open learning

慕课、百度和知乎等学习平台的普及,正在让开放学习成为现实。根据教育部统计,截止到2022年2月底,我国上线慕课数量已超过5万门,学习人数达8亿,在校生获得慕课学分人数超过3亿^[1]。2022年知乎注册用户总数超过4亿,其中高校学生是使用知乎的最主要人群,他们通过知乎查找专业领域知识,同时

也分享自己的知识经验。网络技术和开放学习资源的快速发展,让学习者不再囿于传统课堂,而是很容易通过网络不受时空限制获得自己想要的学习资源自行学习。那么,在这种“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开放学习环境中,高校读者对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需求如何?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应该如何发展?基于以上疑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研究项目“新时代我国体育学硕士研究生信息素养培养研究”(项目编号:18YJC890038)的成果之一。

问,本研究对华中师范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读者的信息素养教育需求展开调查。

1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围绕调查目的,结合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实际情况,同时考虑到被调查者的接受度,问卷设计了20个问题,主要从信息意识、信息能力、信息素养教育活动需求偏好、对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建议四个维度展开。其中除有关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建议为开放题外,其余问题均提供多个可选项供读者选择。

问卷发放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线上通过问卷星录入问卷,方便读者使用手机扫码填写;线下是直接发放纸质问卷。为了能有更多的读者参与,我们一是利用图书馆宣传月期间读者较多的情况下进行问卷调查,二是通过发放小礼品的方式来鼓励读者参与。此次调查共回收问卷662份(其中电子问卷358份,纸质问卷304份),有效问卷633份,有效问卷回收率95.6%。参与调查的读者众多,院系分布广泛,涵盖了华中师范大学现有的23个学院,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基本情况

类别	性别		身份			学科			
	男	女	本科生	硕士生	博士生	社会科学	人文学科	理科	工科
人数/人	126	507	328	272	33	232	110	242	49
百分比/%	19.9	80.1	51.8	43.0	5.2	36.7	17.4	38.2	7.7

2 调查数据分析

2.1 信息意识

信息能否被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的信息意识,而不仅仅是信息本身所拥有的价值。信息意识的强弱经常表现为人们捕捉、利用信息的自觉程度的高低,包括有意识地关注信息技术的最新发展并主动地加以利用^[2]。基于此,本次信息意识调查设置了5个问题:“对当下信息发展热点,如大数据、物联网等的了解程度”、“是否会主动查阅本专业、本学科最新发展动向”、“对有用信息会随时记录保存吗”以及

“对信息素养的了解程度”、“信息素养对个人学习和生活重要性的意识频率”。

调查结果显示,只有6.8%的读者比较了解当下的信息发展热点,25%的读者对当下的信息发展热点完全不了解,68.2%的读者仅了解一点。经常主动查阅本学科发展动向的读者仅占4.5%,70.5%的读者很少会主动查阅,另有25%的读者基本不查阅本学科的发展动向。在被调查者中,45.5%的读者对有用信息会偶尔记录保存,2.3%的读者基本不做记录保存。由此可见,读者主动获取有用信息的意识比较薄弱,整理利用信息的自觉程度不高。

633名读者中,有27.5%的读者不知道什么是信息素养,59.4%的读者仅了解一点,只有13.1%的读者对信息素养比较了解,其中社会科学、工科读者比理科、人文学科读者对信息素养的了解相对多一些。8.1%的读者从未意识到信息素养对个人学习和生活的重要性,51.7%的读者很少意识到信息素养对个人学习生活的重要性,其中硕士生比博士生、本科生更少意识到这一点。这个结果表明,大部分读者的信息素养意识还是处于模糊状态,对信息素养的概念和内涵都不太了解,在日常学习生活中信息敏感度低,对信息素养在信息社会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

2.2 信息能力

作为能力概念的延伸,信息能力需要通过社会主体的某种活动显现出来^[3]。本次调查是以高校大学生读者作为活动主体,基于他们的日常信息行为,设计了如下问题:①专业学习上遇到问题需要解决时,第一反应是什么?②对与本专业相关的外文数据库的了解程度如何?③在查找信息资源时,最常遇到的问题是什么?④面对陌生信息,会用多种方法判断其真实性和权威性吗?

调查数据显示,当在专业学习上遇到问题需要解决时,57.2%的读者第一反应是在百度等网站上搜索,只有21%的读者(主要是博士生、硕士生)第一反应是利用图书馆电子数据库,5.4%的读者选择去图书馆借阅纸质资料。早在1979年,图书馆学信息学专家Robert Taylor就指出:一个具备信息能力的人,了解信息源是必需的^[4]。能根据不同的应用目的选择最佳的信息源是个体信息能力的重要体现。图书馆作为专业的文献服务机构,其花费大量资金购买的文献数据库和纸质出版物在可靠性、权威性和系统性方面是

其他信息源所无法比拟的,理应是查找学术信息时优先考虑的信息源,但只有不到三成读者在遇到专业问题时优先考虑使用图书馆的数据库和纸质文献作为信息源,近六成读者不了解专业信息源与普通信息源的区别,不能根据不同的应用目的选择最佳信息源。

数据库使用能力是高校读者信息能力的重要体现,与中文数据库相比,外文数据库的使用难度相对要大一些。在参与调查的633名读者中,除50名读者反映本专业学习不需要利用外文文献外,其余583名读者在专业学习中都不同程度地需要利用外文文献。在这583名读者中,22.8%的读者对与本专业相关的数据库不了解,45.6%的读者了解一点但不会使用,29%的读者会基本检索,能够熟练使用的读者仅占2.6%。同时,经由卡方检验发现,读者利用外文数据库的能力与专业学习对外文文献的需求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chi^2(9, N=583)=84.19, P<0.05$ (本检验结果p值小于0.05说明原假设“读者利用外文数据库的能力与专业学习对外文文献的需求程度两者之间相互独立”不成立,那么转而接受备择假设,即“读者利用外文数据库的能力与专业学习对外文文献的需求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专业学习对外文文献的需要程度越高,读者对外文数据库的利用能力越高。对外文数据库不了解或了解一点但不会用的读者中,占比最高的是偶尔需要的读者,会基本检索的读者中,占比最高的是专业学习中经常需要外文文献的读者,专业学习中总是需要外文文献的读者在熟练使用的读者中占比最高(见表2)。

调查结果显示,在查找信息资源时,35.1%的读者最常遇到的问题是资源太多不会选择,29.7%的读者不知道去哪里查找,18.8%的读者知道去哪里查找但不会检索,11.4%的读者反映资源太少,只有5.1%的读者表示没问题。面对陌生信息,55.5%的读者不太会或基本不会运用多种方法判断其真实性和权威性。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图书馆的信息素养教育普遍以信息检索为中心,强调检索方法与技巧。然而从这次调查结果来看,在新的信息生态环境下,读者面临的最大问题已经由如何检索资源变成了如何筛选评估资源。

2.3 信息素养教育活动需求偏好

开放学习环境对读者信息素养教育的行为习惯有什么影响?线上教育和线下教育,哪种方式读者更喜欢?在提升自身信息素养能力上,读者最倾向于哪种学习模式及信息呈现方式?这些问题都是现阶段信息素养教育工作者所关心的问题。

统计结果显示,在线上、线下教育方式上,参与调查的633名读者中,有298名读者倾向于选择线下方式,占总人数的47.1%;有335名读者倾向于选择线上方式,占总人数的52.9%。选择线上教育方式的读者比例稍高于选择线下教育方式的读者比例。在信息素养能力提升途径的选择上,43.3%的读者倾向于通过信息检索课的方式进行学习,30.6%的读者倾向于短时培训或讲座,另有26.1%的读者倾向于自学。同时经由卡方检验发现,性别因素对信息素养能力提升途径选择有显著影响, $\chi^2(2, N=633)=23.36, P<0.05$ 。女生偏好于信息检索课的学习方式,男生偏向于自学。

表2 外文文献需求程度与读者利用能力对应关系

项目			对与本专业相关的外文数据库的利用能力				总计
			不了解	了解一点但不会用	会基本检索	熟练使用	
专业学习对外文文献的需要程度	偶尔需要	人数 / 人	70	133	42	1	246
		占利用能力的百分比 /%	52.6	50.0	24.9	6.7	42.2
	有时需要	人数 / 人	39	70	44	1	154
		占利用能力的百分比 /%	29.3	26.3	26.0	6.7	26.4
	经常需要	人数 / 人	21	47	55	6	129
		占利用能力的百分比 /%	15.8	17.7	32.5	40.0	22.1
	总是需要	人数 / 人	3	16	28	7	54
		占利用能力的百分比 /%	2.3	6.0	16.6	46.7	9.3
总计		人数 / 人	133	266	169	15	583
		占利用能力的百分比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在信息素养教育呈现方式上,33.5%的读者最喜欢视频形式,16.9%的读者最喜欢PPT形式,10.0%的读者最喜欢静态网页文字形式,5.7%的读者最喜欢游戏形式,还有34.0%读者觉得都可以。相对而言,视频这种呈现方式最受读者欢迎。调查前原以为游戏最能吸引读者,出乎意料的是选择游戏的读者比例反而最少。这可能是因为大学生读者还是比较理性的,在学习上并不一味追求趣味性。高达34%的读者对形式不是很在意,他们更关注内容本身。

信息发布是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工作中的重要一环,为了解哪些信息发布方式最有效,本次问卷特地对读者获取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信息的习惯途径也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图书馆微信公众号、院系学生QQ群是读者获取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信息时最常使用的途径。笔者在2013年也曾对本校读者图书馆培训信息获取渠道作过调查,那时图书馆主页通知、信息栏纸质通知、图书馆电子屏幕这三种信息发布方式是大家关注得最多的^[5]。但从这次调查来看,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这3种信息发布渠道的受众明显减少,微信公众号、院系QQ群后来居上,成为最重要的信息传递平台。

2.4 读者对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建议

在征询读者对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建议的开放式问答中,有121位读者提供了有效的意见反馈,这些意见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开设的信息检索课程班级数不够,容纳学生人数太少,希望增设更多的班级数,让更多同学能够学习到这门课程;针对不同学院开展针对性课程,将信息素养嵌入专业课课堂;多一些现场实地培训讲座,讲座内容要干货多、实用性强;提供更多的外文数据库培训,增强学生的外文数据库检索能力;无论是文献检索课还是短时的培训讲座,都希望多一些上机实践操作;加大线上信息素养教育,提供网络学习渠道;加大信息素养教育的宣传力度,进行广泛宣传,同时可开展一些有奖竞赛活动,提高大家参与信息素养教育活动的积极性。这些意见中的大多数与前面调查结果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基本一致,从侧面进一步印证了调查结果的普适性。

3 讨论

3.1 开放学习下的信息素养教育空间

在开放学习环境下,教育资源的获取几乎是唾手可得。通过网络连接,个体足不出户就能聆听到业界专家、世界名校的精彩课程。在这种学习背景下,普通高校图书馆有多大必要开展信息素养教育?对此,笔者一直心存疑虑。但从这次调查数据来看,高达87%的读者对信息素养不太了解,约60%的读者很少意识到信息素养对个人学习和生活的重要性,近50%的读者不具备选择专业信息源的能力,约68%的读者不会使用与本专业相关的外文数据库。由此可见,学习环境的改变、学习资源的易获得并不等同于读者总体信息素养水平的提升。网络一方面为开放学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另一方面,网络的极端自由性使得开放学习常常难以实现效率,因为充满诱惑力的干扰因素更多。袁曦临等人通过实验研究发现,网络学习者在阅读学习过程中更容易中断阅读,转向网络中其他内容(如游戏或新闻等),造成阅读目的迷失^[6]。网络下的开放学习尤其需要引导和约束,本次调查中绝大部分读者依然倾向于通过图书馆开设的信息检索课、短时培训的方式来进行信息素养提升可能正是这种需求的体现。作为大学生,他们已经意识到网络自主学习干扰因素太多,需要一些外力来辅助自己抵抗这些诱惑。而图书馆开设的信息检索课及短时培训带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如信息检索课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参与者必须完成这些任务,这种必须性有助于学习者抵制诱惑、专注目标,完成系统性的知识学习。因此,无论是从读者现有的信息素养水平还是从读者的主观觉悟来看,在开放学习时代,图书馆开展信息素养教育依然是非常有必要的。

3.2 信息素养教育重心的转变

此次调查显示,读者面临的最大困惑已经由如何检索资源变成了如何筛选评估资源。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许多信息系统的设计越来越人性化,用户界面趋向简单易用,同时长期以来的信息素养教育对信息检索技能非常重视,关注或参与过信息素养教育的读者对如何检索资源通常都会有所了解;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随着信息生态的改变,特别是在当今的社交媒体时代,任何人都能建立网站,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生产者,如何从海量信息中筛选出真正有用的资源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容易。信息环境的变化促使人们对学会甄别、分析、评价以及合理使用网络信息的需求大幅上升^[7]。出于对信息生态改变的敏感,美国大学与

研究图书馆协会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ACRL) 在2015年颁布了《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用以取代2000年发布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新框架作为引领信息素养教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从强调信息获取技能转向对信息判断和评估能力的培养。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FLA) 秘书长杰拉德·莱特纳2019年也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呼吁,“信息极大丰富与信息稀缺一样,给信息获取带来了种种问题,人们需要使用批判性思维来面对海量的信息资源”^[8]。国外图书馆界面对这种信息生态的改变,正在积极行动,如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图书馆2019年发起的“Information-Wise”项目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信息的批判性评估 (Critical Assessment), 并认为在每门学士课程中都应该加入更多的信息批判性评估内容^[9]。但目前我国多数高校图书馆的信息素养教育的聚焦点仍多集中在信息检索技能及信息资源的获取上^[10], 较少涉及信息评价问题抑或以软件工具代替信息评价, 这已与当下的信息环境不相匹配。信息素养教育必须跟上时代的发展, 正视读者的信息需求变化, 重视信息资源的甄别问题, 将信息资源的评价与筛选纳入到信息素养教育的重心范畴。

3.3 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之间的关系

互联网的发展给教育领域带来巨大变化。一部分学者认为, 在未来, 面对面的线下教育将会消失, 线上教育将全面取代线下教育。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滕森甚至预测: 最快只需15年, 美国大学有一半得破产^[11]。另一部分学者认为, 虽然线上教育有很多优势, 但是在考核反馈和内容深度方面与传统线下系统课堂教育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 线上教育只能是线下课堂教学的辅助。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线上教学保障了“停课不停学”, 被迫成为了唯一的教学方式, 但疫情过后随着线下课堂的恢复, 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又将如何融合呢? 对于其他学科领域的教学融合, 笔者不敢妄加评议, 但作为一名工作多年的图书馆信息素养教学人员, 深知长期以来困扰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最大难题是受众面太小。即使是大型高校图书馆, 一个学期能开设的线下信息素养课堂也极为有限, 以师资力量相对雄厚的武汉大学图书馆为例, 其一学期也最多只能开设4至5门信息素养课

程^[12]。以每门课程平均50到70名学生计算, 4至5门课程只能容纳300人左右, 这与每年入学的新生人数相比, 显然是杯水车薪。此次调查中读者反映比较多的一个问题也是图书馆开设的信息检索课容纳学生人数太少, 很多想学习这门课程的学生选不到课。线上教育在现阶段或许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 但在人群覆盖面方面显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实时的线上课堂能同时容纳几百人甚至上千人, 异步的线上学习更是没有人数上限。因此, 面对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主要矛盾: 师资力量与读者人数的极端不平衡, 线上教育无疑是一剂良方。面向广大读者的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应借助信息技术的春风, 以线上教育为主导, 破解多年来困扰业界的最大难题; 同时辅之以线下教育, 弥补线上教育的某些不足。

4 对策与建议

4.1 加大信息评价内容比重, 重视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

面对信息极速膨胀带来的信息利用障碍, 一些业界专家已经采取行动, 如周建芳等人讲授的“信息素养: 效率提升与终身学习的新引擎”慕课中就设置有专门的章节讲解信息评价问题, 清华大学图书馆王媛开展了“后真实时代的信息辨别”讲座。但从信息素养教育的大范畴来看, 绝大多数高校图书馆的信息素养教育中缺少这方面的内容。假定学生进入大学后就自动具有批判性思维意识是有问题的, Hinchliffe等人对大学一年级学生进行的一项信息素养误解的调查研究发现, 一年级大学生普遍认为所有的图书馆资源及工具都是足够好的; 资源的可访问性代表资源质量; 每个问题都有一个正确答案^[13]。这些都是缺乏批判性思维的表现。信息评价活动与批判性思维密不可分, 批判性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通过调查、解释来检验各种主张和论据, 并判定哪些具有优点、哪些不具有优点, 从而将较有价值的与较无价值的区别开来。批判性思维过程: 一是审视与质疑, 二是调查、分析与比较, 三是综合评估与判断^[14]。信息评价教学首先要培养的是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意识, 在树立了批判性思维意识后, 进一步学习相关的批判性思维技能, 并将批判性思维意识、技能与具体情境下的信息评价过程相结合。特别要厘清一点, 传统信息素养教育中

强调的信息检索技能、信息源与信息评价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有机融合的。信息评价涉及多种维度和方法,专业的信息检索技能、权威的信息源本身是信息评价的重要维度之一,只不过之前它们是零碎的、孤立的。信息评价教学应以信息评价为线,以批判性思维为纲,以具体案例为引,将各种信息评价方法和技能,包括信息检索技能、信息源等有机串联,系统融合,在思维的引领下运用方法,在方法的使用中渗透思维,强化能力。

4.2 加强线上教育的广度和深度,培育线上信息素养教育团队

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主要有三大模块:新生入学培训、日常讲座培训和信息素养课程。其中新生入学培训内容相对单一,线上普及率较高;日常讲座培训涉及内容广,场次多,大部分高校图书馆线上仅提供数据库商制作的数据库讲座PPT,缺少信息素养教育的基础知识以及科研素养能力提升方面的资源^[15];信息素养课程教学普遍仍以线下教学为主。总体而言,当前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线上教育的覆盖面及深入度还远远不够。制约图书馆信息素养线上教育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首当其冲的是师资能力准备不足。线上教学培训不是仅仅将线下课堂知识照搬到网上,而是要根据线上教育的特点规律来组织和管理教学活动。这要求教师在掌握基本的教学内容之外,还要熟练掌握网络教学技术工具,深刻了解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的不同之处,如有研究表明身处网络教学环境中的学生缺少课堂归属感,容易脱离教学过程^[16],教师需要采取多种策略来提升学生的专注力。这些都对教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教师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准备。然而当前高校图书馆的信息素养教育工作大多是由学科服务部(或参考咨询部)人员兼任,他们在信息素养教育工作之外,往往还要完成大量的其他工作,投入线上教学的时间和动力都不足。高校图书馆要推广线上教育,首先要重视线上信息素养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遴选出一批高素质的馆员队伍,为他们提供广泛的专业发展支持,如减少其他兼职工作,创造更多的学习新知识、新技术的机会,参加专门的线上教学发展活动,制定科学的线上

教学评价标准,提供相应的激励措施等。

4.3 与专业学习相整合,以任务为驱动,大力开展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

专业学习对外文文献需求程度越高,读者对外文数据库的利用能力越高,这一统计学结果表明专业需求是信息素养教育的高效催化剂。当前,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与专业学习相整合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学科馆员与院系合作开展一些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通常是在合作老师的专业课堂上穿插一次与课堂任务相关的专业信息资源介绍。另一种是在图书馆开设的信息检索课教学中融入部分学科教学。如笔者所在单位图书馆在面向研究生的信息检索课教学中,采取信息素养通用知识统一讲解,在实践教学环节将学生按学科专业分组进行分别授课,即对应的学科馆员针对本专业学生对学科资源进行专门详细介绍,并实地指导学生进行专业数据库上机操作。课程末采取每名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选定主题进行检索,撰写一篇正规的课题综述的考核方式,旨在让学生将课程中学到的信息素养知识与专业学习融会贯通,让他们在学以致用中体会信息素养对专业学习的重要作用。这两种方式都是信息素养教育融入专业学习的有益尝试,也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信息检索课中融入专业学习的模式说到底还是以图书馆员为主导,与真实的专业课程情境需求有距离;而当前阶段学科馆员嵌入院系的信息素养教育多是基于馆员与教师的自发合作,过分依赖学科馆员个体的作用,存在很大的随机性和偶然性,并未在图书馆和院系之间形成广泛的合作关系^[17]。有学者对欧美澳大学图书馆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盛行原因进行分析,发现一些共同点:信息素养在这些国家是全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信息素养教育跨越图书馆界,上升为教育界、国家性重要议题;将信息素养作为“能力”的重要元素纳入教育培养目标和评估范畴;图书馆界的权威机构将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确立为核心工作内容,不仅从宏观上大力倡导,还重视从操作层面上对图书馆及图书馆员如何开展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事件给予具体指导^[7]。这些经验为我国高校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借鉴。

参考文献:

[1] 张欣,欧媚.教育部:选课人次超8亿!中国慕课数量和学习人数均居世界第一[EB/OL].(2022-03-29)[2022-06-15].<https://>

baijiahao.baidu.com/s?id=1728623449471404081&wfr=spider&for=pc.

- [2] 张素芳.信息意识定义分析[J].情报学报,1999(51):10-12.
- [3] 刘瑞华,钟德和.信息能力研究的基本框架之构建[J].图书馆学研究,2011(7):6,7-8.
- [4] BEHRENS,SHIRLEY J.Aconceptual analysis and historical overview of information literacy[J].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1994,55 (4):309-322.
- [5] 吴礼志.高校图书馆读者培训需求的调查与分析:以华中师范大学为例[J].图书馆界,2014(1):71-75.
- [6] 袁曦临,王骏,陈霞.移动阅读与纸质阅读对照实验研究[J].图书馆建设,2012(3):74-76,81.
- [7] 黄萍莉.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在欧美澳盛行的原因探析[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6,36(2):55-60.
- [8] 莱特纳,郝金敏.从守护者到领路人:全球图书馆界的新角色[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9,45(5):27-32.
- [9] PICHEL J, LAST B, DE RONDE J, et al. Information-Wise: A case for developing an evidence-informed information literacy programme at Maastricht University[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2021, 15(1): 105-121.
- [10] 袁红军,袁一帆.“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现状调查与分析[J].图书馆学研究,2020(19):20-28,35.
- [11] 沈敏.“在线”教学改变大学[N].中国青年报,2013-07-20(4).
- [12] 武汉大学图书馆[EB/OL].[2022-06-15].https://www.lib.whu.edu.cn/webfile/category/Credit_courses/305.html.
- [13] HINCHLIFFE L J, RAND A, COLLIER J. Predictable Information Literacy Misconceptions of First-Year College Students. Communications in Information Literacy[J]. 2018, 12(1): 4-18.
- [14] 鲁吉罗.超越感觉,批判性思考指南[M].顾肃,董玉荣,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23-28,70.
- [15] 徐春,张静,卞祖薇.我国高校图书馆在线信息素养教育现状、困境及对策研究[J].情报探索,2021(5):90-96.
- [16] INGERHAM L. Interactivity in the Online Learning Environment: A Study of Users of the North Carolina Virtual Public School[J]. Quarterly Review of Distance Education, 2012(2): 65-75.
- [17] 刘庆庆,何燕君,杨新涯,等.高校图书馆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模式研究:以重庆大学图书馆为例[J].图书情报工作,2018,62(16):47-54.

作者简介: 吴礼志, 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 研究方向为信息素养教育; 王珂, 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 研究方向为信息素养教育; 杨毅, 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 研究方向为学科服务、信息素养教育。

收稿日期: 2022-06-22

本文责编: 李芳

(上接第45页)

- [28] 于俊丽.高校图书馆应用微信小程序的实践与展望[J].出版广角,2018(12):73-75.
- [29] 孙蕊,吴松桦.馆校协同儿童阅读推广模式研究:以深圳“常青藤”为例[J].国家图书馆学报,2020,29(3):53-63.
- [30] 白玉珊.视频号掘金——获取微信生态红利的新玩法[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2021:7-9.

作者简介: 毛志宣,湘潭大学2020级图书情报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儿童数字阅读推广。

收稿日期: 2022-06-21

本文责编: 李芳

· 探索与创新 ·

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用户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

张慧敏¹ 徐芳^{1,2}

(1.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江苏苏州 215123)

(2.苏州城市学院城市治理与公共事务学院 江苏苏州 215104)

摘要: 研究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用户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可以更好地了解用户的真实健康信息需求,帮助平台更加精准地提供健康信息服务和提高服务质量。首先,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获取了22位用户使用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的体验数据;然后,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数据进行整理、归纳,识别了在线健康信息平台质量因素(包括信息质量、系统质量和服务质量)以及6个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用户满意度的其他影响因素,希望能够为研究者和平台建设者探索平台用户满意度影响因素提供一定的支持。

关键词: 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用户满意度;影响因素;质量因素

中图分类号: G252

文献标识码: A

A Study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User Satisfaction of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Platforms

Abstract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ser satisfaction with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platforms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al health information needs of users and help the platforms to provide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s more accurately and improve service quality. Firstly,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employed to obtain data on 22 users' experiences of using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platforms. Then, content analysis was used to collate and summarise the data and identify the quality factors of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platforms (including information quality, system quality and service quality) as well as six other factors that influence user satisfaction with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platforms. It is hoped that this will provide some support for researchers and platform builders to explor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platform user satisfaction.

Key words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platform; user satisfaction; influencing factor; quality factor

1 引言

近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过去只关注温饱问题到现在拥有更多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尤其是更加关注自身的健康问题。同时,近年来国家也逐渐把全民健康问题纳入到社会发展的规划和进程

中。2015年,“健康中国”被首次写进政府报告;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人民健康问题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1]。同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了“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主题^[2]。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出现,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并且逐渐习惯使用网络来获取在线健康信息。此外,“智慧医疗”等理

* 本文系2022年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交叉研究团队项目“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 202205)的成果之一。

念的提出也让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的数量迅速增多。理论方面,文献调查表明:国内外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用户满意度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研究主题:用户在线健康信息需求与行为^[3-5]、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的建设^[6-8]、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的服务质量^[9-11]、在线健康信息质量^[12-13]、医生分享免费健康信息的动机^[14]、在线健康平台用户与医生的交互^[15]等。由此可见,国内对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用户行为、服务质量、平台建设等方面有一定程度的研究,但是在线健康信息平台满意度方面的研究还比较鲜见。因此,本研究首先从用户角度出发,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获取了22位用户对于在线健康信息平台使用的体验信息;然后,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了分析,试图识别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用户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以期为后续更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相关参考。在本研究中,在线健康信息平台是指以互联网为载体,为公众普及健康信息、提供就诊服务、提供健康信息内容的在线信息平台。

2 研究设计

2.1 访谈准备

本次访谈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寻找使用过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的用户,向用户解释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的概念,让用户了解本次访谈的内容与重点;第二个阶段是依据已有研究与相关理论初步确定访谈大纲,并通过团队讨论方式来确定最终访谈提纲(见表1);第三个阶段是依据访谈提纲对部分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的用户进行访谈。

2.2 访谈对象与方式

本研究于2022年4—6月,邀请18岁以上、使用过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的用户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以电话访谈、面对面访谈为主要访谈方式(由于地理因素限制,一些地区采用电话或微信访谈)。每个访谈对象的访谈时间约20分钟。本次研究共访谈了22名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的用户。

在22名被访谈者中,女性与男性的比例大约为2:1。年龄约在20—50岁之间,受教育程度各异,其中有1名(5%)是初中学历,10名(45%)是本科学历,11名(50%)是本科以上学历。他们中未就业的被访谈者大多是学生或者处于毕业找工作的阶段(13名),已工作的被访谈者有国有企业工作者(2名)、私营

表 1 访谈提纲

编号	问题
Q1	您平时使用在线健康信息平台吗? 主要用来查找哪些方面的信息?
Q2	您平时使用在线健康信息平台觉得困难吗? 遇到困难时你会怎么做?
Q3	您使用在线健康信息平台过程中,能顺利找到自己所需信息或功能吗?
Q4	您通过使用在线健康信息平台能得到自己需要的服务吗?
Q5	您觉得平时使用的在线健康信息平台对您来说有用吗?
Q6	您认为在使用在线健康信息平台过程时,所得到的健康或医疗信息是准确的吗?
Q7	相比之下,您更喜欢用哪些在线健康信息平台,为什么?
Q8	您在使用在线健康信息平台过程中,有什么担忧吗?
Q9	您对目前所使用的在线健康信息平台是否满意? 为什么?

企业工作者(4名)、事业单位工作者(1名)以及自由职业者(2名)。关于居住状态,有6名(27%)独居,11名(50%)在校居住,5名(23%)与父母或配偶、子女居住。在所访谈的人中,大多数的健康状态都是良好的,只有少部分有一些日常疾病。被访谈者分布的地区也十分广泛,涉及上海市(9%)、北京市(9%)、深圳市(5%)、广东省(5%)、浙江省(5%)、江苏省(27%)、山西省(35%)和陕西省(5%)。22位被访谈者中的大多数对于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的使用都很频繁,所有被访谈者都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手机。

2.3 数据分析与整理

访谈结束后,笔者将访谈记录整理完成后与被访谈者进行确认,以保证数据的信度和效度,最终形成22页的文本数据。由于本研究获取的是小样本数据,因此采用内容分析法对访谈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具体而言就是首先对文本材料进行分析,提取归纳出文本中所包含的信息维度;再利用Excel表格对信息维度进行统计分类;最后,进一步提取出信息所涉及的主要主题。

3 研究结果

3.1 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的质量因素

通过对访谈材料的梳理分析,笔者发现被访谈者提到了8个在线健康信息平台质量维度。参考信息系统成功模型^[16],这些维度可以被归纳为信息质量、系统质量和服务质量(见表2)。

3.1.1 信息质量

表2 在线健康信息平台质量因素的主题提取

主题提取	信息提取	定义	访谈内容提取(部分)
信息质量	信息准确性	指平台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等特征	09: 药物的使用信息是准确的
	信息多样性	指平台提供的信息丰富性和类别多样	03: 去医院之前查询一下相关信息: 门诊时间、问诊信息、医生的相关信息
	信息权威性	指平台提供的信息的专业性程度和可信性程度	15: 每次搜出来的信息都是一样的, 感觉这种信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不太相信
系统质量	界面设计	指平台所提供页面的布局、设计等	02: 像医院这些挂号什么的, 它都标得挺清楚的
	功能应用	指平台中所涉及的功能、应用的有用性、新颖性、易用性等	10: 我不会去探索平台上比较新颖的功能, 而且它们的界面也没有什么指引或者提示关于新功能什么的
	广告设计	指平台界面中所涉及、展现、包含的相关广告	16: 比如你用百度搜索, 有时候广告很多也不能辨别
服务质量	服务易获取	指平台所提供服务的获取难易程度等	05: 有些情况下找不到自己所需要信息的时候, 就会得不到相应的服务
	个性化服务	指平台中以用户需求为中心所提供的相关服务	11: 有一些网上回复是设置好的, 但是有些自己的问题比较细, 它就会回复不太准确
	服务及时	指平台提供服务的回应时间快慢程度	17: 它们的服务回应都很快, 医生回复很快

注: 01—22指被访谈者的编号。

在信息系统成功模型中, 信息质量是指对系统信息输出质量的感知, 它可以通过系统输出的准确性、及时性等来感知和测量^[6]。它包括多个维度, 如准确性、及时性、有用性、全面性等。在本研究中, 笔者发现了信息质量的三个维度: 准确性、多样性和权威性。

(1) 准确性: 准确性是最常被提及的信息质量的维度。在访谈中大多数的被访谈者也都对所使用的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的信息准确性进行了评价, 例如: 被访谈者01说: “每次预约挂号的时候, 很多医院都是一秒就没有了, 但是又不知道是完全没有还是之后还会有, 挂号信息有时候不清楚。”被访谈者09评价道: “药物的使用信息是准确的。”

(2) 多样性: 有12位被访谈者都提到了能通过在线健康信息平台查找各类信息, 即信息多样性。如被访谈者03说: “去医院之前查询相关信息: 门诊时间、问诊信息、医生的相关信息, 也会浏览一些保健信息等。”被访谈者06表示会“网上查询药物信息、医生信息”。被访谈者15提到“会使用丁香园来参看一些医学最新进展”。

(3) 权威性: 由于健康信息的特殊性, 一些被访谈者在交谈过程中提到了对于健康信息权威性的重视, 如平台健康或者诊疗信息夸大或者重复(被访谈者14); 不同搜索词条搜索到的信息重复, 不太相信(被访谈者15)。

3.1.2 系统质量

在信息系统成功模型中, 系统质量被定义为是对

信息系统本身的特征和功能的感知^[16], 其测量指标包括易用性、界面设计、功能性、可理解性、稳定性等。本研究发现了系统质量的三个维度:

(1) 界面设计: 是指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界面对于各类信息、功能或者服务的布局是否合理以及是否让用户满意。如被访谈者03说: “有的时候公众号的导航栏设置不是那么直接, 有些标题起的也不是很直白, 有时会比较费时。”被访谈者17评价: “微信公众号的挂号能准确到科室、时间、医生等, 我都能顺利找到。”

(2) 功能性: 主要是指平台所提供的功能的种类以及功能是否易用、是否新颖、是否对用户有帮助。如被访谈者13提到: “像丁香园就可以找到想要的信息和功能, 因为该平台比较大众, 也比较权威。”被访谈者10表示: “我不会去探索平台上比较新颖的功能, 而且它们的界面也没有什么指引或者提示关于新功能什么的。”

(3) 广告设计: 因为在线健康信息平台有营利性平台与非营利性平台两种类型, 在这些平台中避免不了会有或多或少的广告, 有3位被访谈者提到了对于平台广告设计的体验感。如被访谈者14表示: “界面更简洁易懂少一点广告推销就好了。”被访谈者16表示, “比如你用百度搜索, 有时候广告很多也不能辨别。”被访谈者18表示, “百度这种搜索引擎的话就会是广告有一些多。”

3.1.3 服务质量

在信息系统成功模型中,服务质量指用户在使用信息系统过程中的服务体验和感知,强调对于用户感知服务水平的评价^[16]。起初学者们对于服务质量的测量主要包括有形性、可靠性、移情性等,随着理论的不断应用,服务质量的测量维度也逐渐丰富,包括个性化、及时性、可靠性、互动性等。本研究以在线健康信息平台为研究对象,依据其主要特点和功能,发现了用户主要注重在线健康信息平台服务质量的三个维度:

(1)易获取性:本研究中的服务获取性就是指在平台中能够获取服务的难易性等。有7位被访谈者提到服务易获取性这一点。被访谈者01评价:“有时候找不到相关服务或功能,人工客服的服务不太满意。”被访谈者08表示:“更多的是用公众号的挂号服务,所以都得到了满足。”

(2)个性化:是指平台能够根据用户不同的需求来提供其所需要的服务的能力。有3位被访谈者评价了所使用的在线健康信息平台所提供的个性化服务的水平。被访谈者06表示:“我是先初步描述相关病情或者问题,然后会有人工智能助手,帮我分配符合我症状的医生,比较智能。”被访谈者11表示:“有一些网上回复是设置好的,但是有些自己问的问题比较细,它就会回复不太准确。”

(3)及时性:是指平台所提供的相应服务的快慢程度。4位被访谈者在访谈中谈到了对于使用的在线健康信息平台提供服务的及时程度。如被访谈者17评论道:“它们的服务回应都很快,医生回复很快。”

3.2 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用户满意度的其他影响因素

表3中展现了影响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用户满意度的一些相关因素(由于受到篇幅影响,这部分采用统计的方法进行表述和展现)。

(1)信息素养,例如获取信息、使用功能、组织利用信息、辨别信息真伪等。有13位被访谈者的访谈材料中体现出了自身的信息素养对他们使用在线健康信息平台满意度的影响。比如被访谈者16表示:“在使用在线健康信息平台时,我不太能找到想要的信息,有时候需要摸索一下才能找到。”

(2)感知有用性,例如方便生活、了解信息、辅助作用、获取知识等。所有的被访谈者都认为在线健康信息平台是有用的,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如被访谈者14说:“我觉得在线健康信息平台是有用的,比如线上挂号比较省时间而且可以清晰看出来当天的坐

表 3 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用户满意度的其他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被访谈者 / 名	占比 / %
信息素养	13	59
感知有用性	22	100
感知易用性	17	77
产品新颖性	9	40
隐私担忧	10	45
感知风险	9	40

诊医生都有谁,然后来选择自己想就诊的各专业级别的医生。”

(3)感知易用性,例如寻找功能与服务、线上沟通的难易等。有17位被访谈者提到了平台的感知易用性对他们评估在线健康信息平台满意度有所影响。如被访谈者10表示:“在使用过程中你会觉得还是没有和医生面对面交流顺畅,在交流过程中主要还是使用文字、照片,每次也有照片张数限制,所以还是觉得没有线下直接和医生沟通好。”

(4)产品新颖性,例如使用方便、智能、权威性和专业性等。9位被访谈者提到自身更偏爱使用哪些在线健康信息平台,并简单说明了原因。如被访谈者03表示:“喜欢使用京东、美团送药等,这些平台比较简单,不用我自己去找医生科室,有人工智能助手,直接帮助分配医生,不会浪费我很多时间。”被访谈者11表示:“比较喜欢丁香园,觉得它上面的医生可信度高一点,权威性会高一点。”

(5)隐私担忧,例如个人信息保存、诊断信息等。10位被访谈者提到使用在线健康信息平台时,十分重视平台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如被访谈者10表示,“就是会担心上传的图片会被别人用网页爬取到”。

(6)感知风险,例如诊断风险、药物使用、时间风险等。有9位被访谈者提到一些对于平台的感知风险担忧会影响他们对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用户满意度的评价。如被访谈者09表示,“担心自己表述病情不准,所以就害怕我得到的诊断也不是准确的”。

4 讨论

4.1 影响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用户满意度的平台质量因素

平台质量是影响用户使用在线健康信息平台以

及使用后满意程度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主要发现和归纳了平台质量的三个维度的影响因素:信息质量、系统质量和服务质量。在信息质量因素中,除了传统的维度或其他文献中学者们已经探索的维度,如准确性、多样性、有用性、及时性等,本研究还发现了一个新的维度:信息权威性。关于系统质量,本研究中的系统质量因素主要涉及三个维度:界面设计、功能设计以及广告设计。其中,由于在线健康信息平台拥有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平台两种类型,因而在本研究中的界面设计除了包含传统的页面信息和功能分布等,还包含有界面广告设计与分布这一含义。关于服务质量的测量维度也有许多,本研究中主要侧重于服务的易获取性以及个性化、及时性。

从理论上讲,这些影响因素可以帮助开发测量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用户满意度的量表或问卷。该问卷或量表对于测量、分析和提高平台质量以及测量、预测用户满意度有很重要的作用。在实践中,平台质量的测量可以作为平台改进、完善的一个参考因素,从而让平台能够找准用户的需求,提供对用户有用、令用户满意的在线健康信息平台。

4.2 影响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用户满意度的其他因素

之前国内学者关于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的研究多是从平台内部角度出发,对在线健康信息平台进行评估和改进。本研究从用户的角度出发,通过访谈和内容分析归纳提取出6个影响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用户满意度的相关因素:信息素养、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风险、产品新颖性和隐私担忧。其中产品新颖性和隐私担忧是在用户满意度的相关研究中还未

得到证实的新因素。从本研究的访谈材料分析中得到的这两个影响因素丰富了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用户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后续研究可以对这些影响因素尤其是两个新影响因素进一步探索和检验。

5 结语

在线健康信息平台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应运而生的新事物,因而也是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热点。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以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的用户为研究对象,获取了22个样本的访谈数据;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文本数据进行整理、归纳,识别了在线健康信息平台质量因素(包括信息质量、系统质量和服务质量)以及6个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用户满意度的其他影响因素,希望能够为研究者们和平台建设者探索平台用户满意度影响因素提供一定的支持。

本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用户在使用在线健康信息平台时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从而为平台提高服务质量和后续研究提供支持。但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采用的是方便抽样的方式,尽管已经尽可能地提高样本的代表性,但大多数样本都来自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对于西部地区的样本比较缺少,之后的研究可以增加西部地区的样本来进行分析。其次,本研究属于探索性研究,只得出了一些前期的探索成果,后期还需要依据该研究结果,进行实证研究,通过问卷等方式来验证前期研究结果,以便更加准确、深入、详细地了解在线健康信息平台用户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 [1] 新华社.习近平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2022-07-20].http://www.gov.cn/xinwen/2020-09/22/content_5546100.htm?type=bgxz.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EB/OL].[2022-07-25].http://www.gov.cn/zhengce/2016-10/25/content_5124174.htm.
- [3] SUENAGA H,VICENTE M R.Online and off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the demand for physician services[J].The European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2022,23(3):337-356.
- [4] 王文韬,温佳怡,张震,等.基于质性分析的大学生在线健康信息采纳行为模型构建[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0(3):85-91.
- [5] 宋小康,赵宇翔,李新月,等.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过程实验研究:特征分析及阶段识别[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22,12(1):34-45.
- [6] CHOI H,JIN M.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Information Website: Construction, Content, and Service[M]//Nursing Informatics 2018.Amsterdam:IOS Press,2018:93.

(下转第88页)

图书馆智慧媒资管理平台建设实践探索*

曾 洁

(广州图书馆 广东广州 510623)

摘 要: 作为图书馆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视听资源长期以来因受技术、存储、管理等方面的制约,很难充分发挥其知识服务的功能。广州图书馆搭建了智慧媒资管理平台,实现对存储在不同介质的视音频等媒体资源的收集,利用人脸识别、语音识别、文字识别等智能计算技术对媒资内容中的人物、机构、地点等进行识别分析并生成标签,通过抽取关键词来对标签进行标引,实现资源的专题化聚类 and 精细化揭示。智慧媒资管理平台的建设,全面拓宽了媒体资源的应用层面和应用深度,对图书馆从传统的数字资源建设向知识发现、知识组织、知识管理、知识服务转型,具有探索意义。

关键词: 智慧媒资管理平台;智慧图书馆;知识服务;广州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0.71

文献标识码: A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Smart Media Management Platforms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library collections, audiovisual resources have long been constrained by technology, storage and management, making it difficult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function of knowledge services. The construction of Guangzhou Library's smart media management platform can deepen and broaden the application of Guangzhou Library's media resources. It can provide a database for patrons to retrieve and access refined media content in the library. The platform can discover the value of library video resources through big data analysis, to fuel a transformation in the library resourc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mode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Key words smart media management platform; smart library; knowledge service; Guangzhou Library

1 引言

在大数据时代,图书馆趋向从环境、资源、服务、空间、内容等多个维度寻求新的平衡,在由“数据资源环境”向“知识资源环境”的转变中建构新的知识组织体系,并在开放式的技术创新环境中开发数字图书馆空间的新功能,发掘内容资源的新价值^[1]。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将图书馆数字资源进行细颗粒度建设,对多元的知识内容进行结构化,让资源实现充分互联互通,为读者提供人性化、专业化、智慧化的知识服务,是图书馆未来发展的趋势。一直以来,作为

图书馆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视听资源因受技术、存储、管理等方面的制约,很难充分发挥其知识服务的功能。本文通过分析图书馆媒资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结合广州图书馆建设公共图书馆智慧媒资管理平台实践,探讨智慧媒资管理平台对智慧图书馆建设的意义,为图书馆从传统的数字资源建设向知识发现、知识组织、知识管理、知识服务转型提供思考路径。

2 国内图书馆媒资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

2.1 图书馆媒资管理现状

媒资,即媒体资产,主要包括视频、音频、图像、

* 本文系广东省图书馆科研课题“公共图书馆纪录片服务创新研究”(项目编号: GDTK21019)研究成果之一。

文档等多种内容资产。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广播电视行业,即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机构生产的大量音视频、图片、文字等业务数据。媒资管理平台,即结合计算机、互联网以及多媒体技术,解决媒体资料的编目检索、存储与发布的平台^[2]。笔者在知网上以“图书馆媒资管理”分别为题名、全文、关键词进行检索,查到的文献非常有限。最早开始在图书馆领域进行实践探索和研究媒资管理的是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员阮海红,其发表的论文《媒资内容管理实验研究》从视听资料载体的复杂多样、介质保养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对图书馆媒资管理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分析了媒资管理系统的特点和功能,并通过规范元数据描述来创建独具特色的数据库,从而提升资源价值^[3]。竺亚珍、马惟哲在《高校图书馆媒体资产管理系统建设》一文中探讨了适合高校图书馆的媒体资产管理系统,并从信息处理、内容管理、内容存储和应用等方面分析了浙江传媒学院建立的媒体资产管理系统^[4]。钱静在视听资源储存介质保存年限短、检索和共享困难等方面分析了媒资管理的必要性,并结合淮安市楚州区图书馆实际应用,建立包括采集上载、编目检索、存储、应用发布等子系统在内的媒资管理系统,并就建设过程中注意的问题提出建议^[5]。资料研究发现,图书馆建立媒资管理系统更多是为了解决视听资源存储、编目检索、应用发布,但还未对视听资源的知识进行精细化揭示和专题聚类,深度挖掘视听资源的文献价值。

2.2 图书馆媒资管理存在的问题

广州图书馆广州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纪录片收藏、整理、研究、展示、服务的公共文化平台,主要通过资源采购、社会捐赠、资源共享等方式建设纪录片馆藏资源。目前,馆藏纪录片资源4 000余部/集,其中音像出版类DVD介质的纪录片约占90.8%,数码格式的纪录片占9.2%;与本地广播电视台共建共享的城市数字影像资源近两千小时。因无专门的系统对纪录片资源进行统一的数字化管理,导致中心馆藏资源在存储安全、版权管理、应用服务等方面受到很大制约。

(1)资源存储安全风险。中心大量的音像出版类纪录片资源仍然是依靠DVD、VCD光盘介质存储,由于受环境影响和自身老化,有可能导致这部分存储的影像质量下降,甚至数据丢失;一部分数字资源存储

于移动硬盘和服务器。媒体资源的分散性存储,对数据库的安全性和统一管理带来风险和难度。

(2)资源版权管理风险。中心馆藏的纪录片及城市影像资源的版权在使用范围、期限、播映次数等方面不尽相同,目前只能依靠人工对版权信息进行统计管理,但随着馆藏量的日益增长以及版权使用的多样性,存在版权使用和管理的风险。

(3)编目较单一。目前馆藏纪录片资源均按照《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和《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进行编目。但是中心馆藏中有一部分是与广播电视台共建共享的城市影像资源,这些资源中包括电视节目、新闻等,则按照《广播电视音像资料编目规范》进行编目。电视资料部分的元数据项从上到下分节目层、片段层、场景层、镜头层四个层次,每个层次分别包含相应的元数据项。因此,有效统一、规范中心馆藏资源的编目规则,对今后为读者提供更精准、高效的查询检索尤为关键。

基于以上问题,在图书馆建立媒资管理平台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调研发现,数字媒资管理平台从功能、服务形态和应用方面已难以满足精细化的知识服务需求。数字图书馆的服务模式要从提供文献资源的检索获取利用向提供深层次多样化的知识服务转变,这就离不开各类智能技术的辅助^[6]。因此,以人工智能为驱动的智慧媒资管理更符合智慧图书馆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可使视音频资料在从采集上载到发布下载的处理过程和工作流程上实现自动化管理,从而节约管理成本、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让媒资管理更为科学、高效;另一方面,对媒体资源进行细颗粒度智能标签标引和专题聚类,可提升检索效率和检索结果的准确性,以及媒体素材的应用价值。数字媒资管理和智慧媒资管理的区别如表1所示。

3 广州图书馆智慧媒资管理平台建设实践

3.1 建设目标

通过搭建广州图书馆智慧媒资管理平台(见图1),实现对存储在不同介质的视音频等媒体资源的采集,并对编目元数据描述信息、版权信息等进行统一规范和管理。利用人脸识别、语音识别、文字识别、知识图谱、语义网络分析等智能计算技术,对媒资内容中的人物、机构、地点等进行识别分析并生成标

签,通过抽取关键词来对标签进行标引,实现资源的专题化聚类 and 精细化揭示。

3.2 建设内容

3.2.1 平台框架

采用云平台相关技术,构建包含软件应用层、平台服务层、基础资源层在内的智慧媒资管理平台(见图2),并通过“平台+工具+服务”的技术框架,将多元的服务和工具组合满足不同的业务需求。采用分布式的流程设计,在现有基础架构上,实现媒体资源、媒体数据、业务数据分级存储。

表1 数字媒资管理和智慧媒资管理比较表

项目	数字媒资管理	智慧媒资管理
建设目标	对媒体资源进行数字化管理,实现其数字化存储、编目管理、检索查询、素材转码、资料发布等	利用智能计算技术,对数字化媒体资源进行细颗粒度结构化数据体系建设和精细化揭示,从而实现资源的知识化、专题化服务
建设内容	建设数字媒资门户网站,通过网络信息采集、数字资源组织与揭示、跨库检索等功能实现文献信息服务和管理	通过人脸识别、语音识别、文字识别、知识图谱、语义网络分析(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等智能计算技术,生成数字媒体资源细颗粒度标签标引数据,并将其进行专题化聚类,为读者提供智慧检索,高效获取精细化的媒资内容
服务型态	事务型、人力密集型	智慧型、知识密集型
服务应用	向读者提供数字文献资源检索	向读者提供深层次、多样化的知识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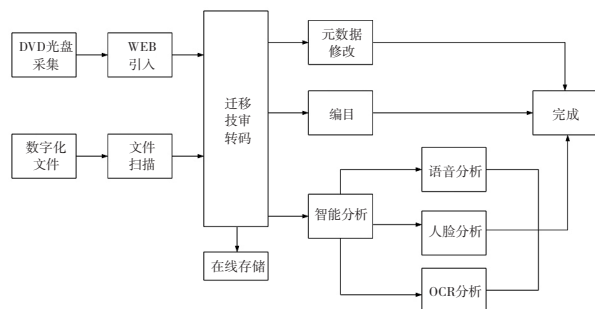


图1 广州图书馆智慧媒资平台建设流程图

智慧媒资管理平台框架设计分三层:

(1) 软件应用层: 媒体资源管理平台在业务软件上包括远程回传、文件上载、辅助技审、内容编目、检索浏览、出库下载、版权管理、近线归档、数据统计等功能。

(2) 平台服务层: 提供媒体资源管理平台后台支撑和应用服务,包括分布式框架服务、负载均衡高可用服务、转码服务、技审服务、迁移服务、资源导入导

出服务、资源归档服务、编目标引服务、工作流引擎服务、检索引擎服务、分级存储服务、接口服务等媒体专用服务。

(3) 基础资源层: 主要包含计算资源、存储资源及网络资源。

3.2.2 资源采集

智慧媒资管理平台通过工作站,对存储在包括光盘、本地磁盘、网络磁盘和移动硬盘等不同介质的媒体资源进行采集。收集获取文件的元数据描述信息,并抽取文件 EXIF 信息等数据进行存储记录。采集过程中对视频质量进行检测,识别并标识所采集视频资源中的彩条、黑场、静帧等文件损坏情况。采集工作站支持VOB、DAT等光盘文件格式,以及MP4、WMV、MPG等常见数码视频格式和MXF、AVI、MOV等专业视频格式,同时支持对4K、8K等超高清视频的采集。

3.2.3 智能标签标引

在智慧媒资管理平台中,标签是指视频片段的关键词集合。它通过智能信息提取和融合推理,将人物、地点、机构等类别的关键词进行识别,输出为对应视频的标签。标引是对视频内容进行的一个赋予检索标识的过程,点击标引信息可以自动定位到呈现的具体一帧视频。

智能标签的形成经历了输入、处理、输出三个环节。首先对生产过程数据、录入数据和智能识别数据进行补充、转换、分解或映射,形成标签的基本元数据、版权元数据、内容标签数据。其中,生产过程数据包括入库时间、入库者、入库来源等信息,根据定义好的信息进行自动化编入目录;录入数据包括标题、版权、主题词等,由人工录入;智能识别数据则是通过语音识别、人脸识别和OCR识别获得。语音识别是将视频中的声音进行连续语音识别并转文字,进行语义分析,自动生成关键词和入出点、自动摘要、自动分类等信息;人脸识别则是通过自动识别和建立人脸特征模型,标引视频画面中特定人物人脸位置,对人脸抽取特征后,用人脸特征模型进行身份确认;OCR识别是对视频中文字区域进行识别分析,其结果包含视频中的文字内容和对应的文字坐标信息。最后,经融合推理后的标签输出形成为内容结构化数据,包括节目、镜头、场景等分层结构化标签。输出的结构化数据可通过人工进行修正,修正的结果会

作为学习的样本重新带回数据处理过程。利用智能计算技术生成精确到视频内容片段的标引,生成对应的标记点信息,通过点击标记点可以快速定位到标记点位置,系统还可自动将标引信息与人工智能信息库比对校验,确保定位到标记点位置的准确性。

3.2.4 编目元数据

在实践中发现,传统的著录方式对视频资源的揭示深度越来越有限,因此,广州图书馆智慧媒资管理平台的编目元数据在设计之初,从内容描述、技术参数描述和管理描述等方面,在《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和《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基础上,融合了《广播电视音像资料编目规范》的著录规则,即可对各种视音频文件进行基于时间线操作方式的多级编目(包括场景层、片段层、镜头层),对所选媒体资源内容拆分的结构要求符合《广播电视音像资料编目规范》。一方面可满足各类纪录片编目信息,另一方面可满足与广播电视台共建共享资源的编目。

3.2.5 专题汇聚

平台可对已进行智能化标签标引的媒体资源进行重新聚类,形成主题化、专题化的分类揭示,从而实现智能化知识发现。馆员可在后台,按照自定义视频分类,根据需要的关键词,自动匹配标签标引信息进行主题化、专题化的汇聚和展示,符合设置条件的片段或者文件自动形成专辑。专题汇聚技术应用是基于智能分析结果内容,分析结果根据大数据的同类汇聚,最终以关键词与标题的提取进行汇聚呈现。例如,要建立一个与“军事”相关的视频专题,可以在系统后台页面创建专题,通过选择智能汇聚,将包含有“军事”标签的视频自动汇聚到创建的“军事”专题中,大幅度提升了资源的专题分类管理和聚类揭示。

3.2.6 版权和内容安全管理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网络信息传播权保护条例》,对纪录片等视频资源进行统一的版权管理。在平台版权管理模块,可自定义填写资源的版权相关信息,包括版权方、责任人、版权类型、版权期限、版权使用区域等,也可批量对版权信息进行统一录入,平台还会根据版权授权期限进行自动到期提醒,确保资源版权管理的规范,避免版权使用风险。为防止涉敏内容出现在应用前端,可对媒资素材进行密级管理,并做公开、非公开、机密等权限的区分,确保资源内容的安全性。

3.3 平台建设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智慧媒资管理平台建设中需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 语音识别。在有限预算内,最好是对视听资源的语种进行总体评估,从而选择相应的语音识别功能模块。比如广州图书馆有一部分纪实影像资源是粤语,那么最好选择以普通话、粤语为主的语音识别功能模块。语音识别的语种模块越多,所涉及的费用也必然会多,因此在项目开始之初,需将这部分费用纳入到统筹规划中考虑。

(2) 存储方式。如条件允许,最好在媒资管理平台的建设上采取云存储与本地存储相结合的模式。因地方政策原因,广州图书馆的资源要求存储在政务云上,所以媒资管理平台运行会受馆内带宽影响,也将对未来业务扩展带来一定的限制。

(3) 人脸样本库。为确保视频中的敏感人物及相关场景、片段不会出现在读者应用前端,需在平时视频入库时做好人脸样本采集,不断丰富人脸样本库。一旦发现问题可即时智能匹配搜索相关视频予以封存。

(4) 智能水印。在智慧媒资管理平台中最好对视音频数字化内容,尤其是源码文件、高码资源加注隐性水印,以保护版权的属性,便于追溯素材的来源。

4 智慧媒资管理平台对智慧图书馆建设的作用

智慧图书馆是图书馆在新的技术环境下为满足用户新需求而产生的新型形态,是图书馆发展的方向,是智能技术和人文智慧的融合^[6]。智慧媒资管理平台建设,将发挥以点带面的作用,通过智能手段深度挖掘视听资源价值,对图书馆从以文献检索传递为主向以满足用户对信息利用多元化需求为主的知识服务转变,具有探索意义。

4.1 智能标签与编目元数据结合,提升图书馆的知识发现能力

图书馆服务就是要将这些大量的数字资源进行知识组织、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而知识发现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亮点^[7]。智能标签与编目元数据结合,让知识发现更为全面和精准。智能标签的优势在于目标单一,对资源内容进行提炼、概括成为词语,这种形式便于计算机进行统计性规律的挖掘与应用。

标签的劣势在于仅用词语描述,信息表达往往不够精准、全面,细节容易丢失,复杂关系难以体现。编目的优势在于结构严谨,有一套从管理、内容、技术指标等各个层面的完整体系对资源进行描述,但编目的劣势在于著录时往往思考维度单一,资源内容信息著录不足,同时由于编目元数据的复杂结构,也不利于计算机的统计分析。

因此,智能标签和编目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实际应用二中者的结合可为用户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当用户需要查找某一具体资源,采用纯标签检索方式查不到时,可以再联合编目元数据内容进行联合检索、扩大范围,提升信息查询的全面性和精准度,从而提升图书馆知识发现能力。

4.2 基于智能标引的时码定位,强化图书馆的知识服务功能

在智慧媒资管理平台中,每个内容标签都是知识颗粒,都有它的作用域,即标签标引与视频画面有着强相关。在一个内容单元内,精细化标注该标签所对应事物在画面上出现的多组入出点信息,即时码信息。这样的标签在数据结构上会对应多组入出点信息,并可以时码段方式进行展示,方便在找到素材后快速准确定位到检索用户最感兴趣的镜头画面上,不需对视频画面进行逐帧拖移查找,大大提升画面定位效率。

图书馆除了采购大量的视频资源,同时还需开展自制视频的工作,如公开课、口述史拍摄等,如要对

大量的视频素材进行剪辑,智能标引可大幅度提升对素材的精准查找,使后期制作越发便捷。同时,馆员在对视频素材进行汇编时,标签结合智能标引的应用,有助于馆员高效完成汇编工作。智能技术与馆员智慧的融合,将为读者提供嵌入式服务奠定基础,驱动图书馆的服务升级。

4.3 基于智能聚类的知识组织,充分发掘图书馆的资源价值

在智慧图书馆发展理念中,知识组织在知识和信息的获取与交互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知识组织在前向资源驱动和后向利用导向作用下,通过知识挖掘、知识发现、知识融合、定制推送、智能搜索等多种智能技术,发现隐含在信息中的有用信息单元并组织成知识库,然后提供给用户,满足用户知识的需求,为用户提供卓有成效的知识服务^[8]。

基于资源内容和知识的智能聚类,就是依靠资源标签的相似性对知识进行组织、融合。比如,用户在浏览一个视频中的镜头是广州珠江,系统通过语音和OCR字幕识别出“广州”和“珠江”两个高价值标签,用户就可以通过这两个标签找到一系列包含有“广州”“珠江”标签的视频,也就是在“广州”和“珠江”间建立了知识体系联系。未来,如果在不同标签间建立关联,基于标签建立各类知识体系,形成上下位关系、平行关系,还可以形成更有价值的内容推荐。这种智能聚类功能将满足用户高层次知识需求,从而提升资源价值,增强用户黏性。

参考文献:

- [1] 阎晶.数字图书馆资源聚合质量评价及优化策略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2.
- [2] 李欢欢,陈卓,力志.基于数字化校园环境的高校媒资管理系统建设[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4(23):59-62.
- [3] 阮海红.媒资内容管理实验研究[J].现代情报,2008(25):571-572.
- [4] 竺亚珍,马惟哲.高校图书馆媒体资产管理系统建设[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0(2):3.
- [5] 钱静.中小图书馆媒资管理系统设计与建设[J].科技信息,2011(32):70-72.
- [6] 初景利,任娇蕊,王译晗.从数字图书馆到智慧图书馆[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2,40(2):52-57.
- [7] 靳嘉林,王日芬.大数据环境下知识发现研究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向[J].数字图书馆论坛,2018(5):67-72.
- [8] 刘维丹.数字图书馆的知识组织研究[J].现代情报,2002(10):123-124,126.
- [9] 初景利,段美珍.智慧图书馆与智慧服务[J].图书馆建设,2018,2869(4):85-90,95.

作者简介:曾洁,硕士,广州图书馆广州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项目负责人,馆员,研究方向为公共图书馆纪录片服务。

收稿日期:2022-05-12

本文责编:李芳

· 文献学研究 ·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家礼考证》文献价值发覆*

陈 莉¹ 吴凌杰²

(1. 中山大学图书馆 广东广州 520275)

(2.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广东广州 520275)

摘 要: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曹好益《家礼考证》作为珍贵刻本,无论是在形制大小、字迹清晰程度上,均优于成均本与日抄本,且国内收藏颇少,是少见之善足本。在此书中曹氏引据儒家经典,阐释《家礼》名物词章、仪式流程,并采取具图形式,考辨了礼文深奥、后世争论处,批驳了朝鲜失礼民风,为维护儒家文化的正统性作出了努力。当然此书亦存不足,如对朱熹与丘浚在纳币是否告庙处莫衷一是,表明他对前人思想理解不够深入。总而言之,曹好益的《家礼考证》在朝鲜《家礼》类著作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它打破《家礼》研究单调低质重复化的困局,推动了朝鲜《家礼》研究走向精细化,使得《家礼》研究走向文本自觉,并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创作蓝本。

关键词: 《家礼考证》; 曹好益; 中山大学图书馆; 域外汉籍

中图分类号: G256.23

文献标识码: A

Revealing of the *Jia Li Kao Zheng* Collected by Sun Yat-sen University Library

Abstract Cho Ho-ik's *Jia Li Kao Zheng*, collected in the library of Sun Yat sen University, is a rare good copy, which is superior to the average copy and the daily copy in shape, size and clarity. In this book, Cho Ho-ik quoted confucian classics to explain the famous words and expressions and ritual process of *Jia Li*, and took the form of a picture to examine the abstruse ritual and the controversy of later generations, refuted the disrespectful folk custom in Korea, and made efforts to maintain the legitimacy of confucian culture. Of course, this book also has some shortcomings, such as the disagreement on whether Zhu Xi and Qiu Jun were at the temple where the coins were received, which indicates that he did not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ideas of his predecessors. In a word, Cho Ho-ik's *Jia Li Kao Zheng* plays a unique role in Korean *Jia Li* works. It breaks the dilemma of monotonous, low-quality and repetitive research on *Jia Li*, promotes the research on Korean *Jia Li* to become more refined, makes the research on *Jia Li* more text conscious, and provides a blueprint for later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Key words *JIA LI KAO ZHENG*; Cho Ho-ik; SunYat-sen University Library; Overseas Chinese books

中国自古被誉为“礼仪之邦”,三礼作为原典不断为后世学者传颂,但因文意深奥复杂,难以在民间流传。宋代朱熹决意改变礼与民众割裂之局面,于是以《仪礼》为核心,汇聚前贤成果,删繁就简地撰成了《家礼》一书,以期便于大众行用。明清以来,官方

对朱子学的尊奉加深,促使《家礼》的影响力浩荡于四海、辐射于东亚,也旋即传入朝鲜。朝鲜学者服膺华风,掀起了对《家礼》研究的热潮。但《家礼》本为《仪礼》之浓缩版,诘屈聱牙的礼文,即便是中国学者解释起来也相当困难,如何将它传之民众?这成了

* 本文系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越书籍交流研究(多卷本)”(项目编号:20&ZD333)的阶段性成果。

朝鲜学者面临的严峻挑战。困境之下,他们并未低头,反而前赴后继、连绵不绝地撰写了一大批《家礼》类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们或考辨名物仪式、或纠正词章文藻、或探讨文本流变,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传播《家礼》,教化百姓。

1 曹好益及其《家礼考证》

现今存世朝鲜《家礼》类著作极为丰富,有学者曾统计过约有三百余种。韩国庆星大学韩国学研究所编撰的《韩国礼学丛书》,采用“前编”“续编”“补遗”三编的形式,收录了李朝时期《家礼》类著作138卷172种^[1]。它们当中较有影响力者有金长生《家礼辑览》、姜硕期《疑礼问解》、宋翼弼《家礼注说》以及曹好益《家礼考证》^[2]等,这些著作多数照搬《家礼》原文,而在细节处加以注解。但曹好益的《家礼考证》则不然,曹氏基于自身对《家礼》的理解,不拘泥于《家礼》原文,打破原有的文本分布,全篇单刀直入、重点突出,以辞章考据的形式注释《家礼》,为现今学界分析《家礼》在东亚的传播及朝鲜学者对它的理解提供帮助。

1.1 曹好益的生平简介与《家礼考证》的创作缘起

现存有关曹好益生平记载不多,典型介绍见于崔成德《朝鲜文学艺术大辞典》:

曹好益(1545—1609年),朝鲜王朝宣祖(1567—1608年)时期的学者。字士友,号芝山。昌宁人。李滉的门客。历任星州、安州、定州、成川等地的牧使。1597年丁酉灾难时在江东率领义兵活动过。死后追任为吏曹判书。著作有《芝山集》《家礼考证》《周易释解》等,为后人研究礼法留下参考史料^{[3]39}。

而后彭卫民《明清域外丧籍经眼录》大体内容亦与上同,但增补了曹好益撰写《家礼考证》的相关信息:“明万历三十七年,著有《家礼考证》,未及成书,卒去。丧礼成服以下至祭礼,未及编成。”^[4]

崔成德《朝鲜文学艺术大辞典》又载:

《家礼考证》,把朱子写的《家礼》中,挑出难以理解的部分,浅显易懂地加以考证的书。起初,由朝鲜王朝中期的学者曹好益执笔,但未完成就去世,他的弟子金堉等整理编纂其遗稿,于16代王仁祖24年(1646年)委托闵应协出版。共7卷3册。印刷版^{[3]40}。

以上二者为我们大致勾勒曹好益的一生,曹氏

师从当时的名儒李滉,为退溪学派(岭南学派)之一员。曹氏一生较为坎坷,早年在多地为官。壬辰(1592年)倭乱时,曾亲率义兵反抗日倭侵略,战争结束后他又前往成川等地担任牧使,死后被迫任为吏曹判书。曹好益自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开始编撰《家礼考证》,未及成书便离世,致使此书“丧礼”“成服”以下至“祭礼”缺载。

《家礼考证》创作原因与背景,据书前金堉序可知,大体原因有三:

一是传释《家礼》颇不易。如前所述,《家礼》本就是《仪礼》的浓缩版,中国学者尚为这些诘屈聱牙礼文所困,更何况乎朝鲜学者!曹好益师出名门,礼学知识尤为丰富。金堉在《家礼考证序》称:“我先师芝山先生闻道甚早,学本为己,传极群书,研穷义理,而于礼学,著工尤切,遂就此书。”这成为了曹好益编撰《家礼考证》的基础。虽然金堉称如果能“人人熟讲”《家礼》,就可以使自己“无临事颠错之失”,但此书“出于先圣遗经,微辞奥义,有难尽识”,加之两国地域隔阂,导致《家礼》在朝鲜传释甚难。从“探迹幽隐,凡文字之未解者、事物之难究者,考其出处而明之,多引经史而证之,间亦附以己意,使后之学者开卷了然,有若亲承提诲于函丈之间”,可知曹好益撰写《家礼考证》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为了让后世学人读懂、传释《家礼》。

二是曹好益尊奉朱子之心。曹好益所属的退溪学派在李朝时期具有较大影响力,此学派典型特征即尊奉程朱理学、摒弃阳明心学。曹好益作为门生,自然对朱熹之学极为尊崇。金堉序曰:“朱子好礼之心,即先圣之心也……先生好礼之心,即朱子之心也。传所谓其揆一也者,岂不信哉!”在金堉看来先圣、朱熹、曹好益三者“在‘好礼之心’上皆‘揆一也’”,三人都崇好礼学。因此曹好益编撰《家礼考证》,既表明了自己尊奉朱熹的心性,又扩大了朱子学说的影响力,实乃两全其美。

三是朝鲜世风日下,亟需重塑社会道德。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李氏朝鲜,遭到了“建储之争”“壬辰倭乱”等事件的冲击,社会风气极为撕裂。朝堂之上,党争不断。“东西党争”“南北分党”“四色党争”此起彼伏。党派间为了彼此攻讦,各自拉拢一批礼学家,意图掌握事件解释的合礼权,礼学派系的分流使得整个社会陷入礼制危机,此时思想困惑,礼仪诉讼

之事频发。因此,曹好益认为“世益下而礼益坏”,世风败坏到亟需整肃的程度。那么如何整肃社会风气呢?他认为应归沐儒家传统,“辅以修齐治平之道”,以“著考证以明之”的方式,通过《家礼》的传释,使得人心向化,“自家而国”达到“为国以礼之效”。

由上可知,《家礼考证》诞生的原因与背景较为复杂,一方面是曹好益亲承老师李滉的教诲,闻道甚早且礼学知识丰富,具有编纂《家礼考证》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家礼》早期因文本晦涩在朝鲜难以流传,曹好益作为退溪学派一员,深受学派“尊奉朱子”思想的影响,因而他希望通过编撰《家礼考证》表明自己尊奉朱子之心,也以此扩大朱子学说的影响力。同时在社会背景上,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李氏朝鲜正经历内忧外患,朝堂之上党争不断,使得社会急剧撕裂,故曹好益认为在世风日下的时候,亟需《家礼》重塑社会风气。

1.2 《家礼考证》存世版本概况

现存《家礼考证》传世版本,约有三种,现据刊印形式,可分为刻本与抄本。刻本以其行款来分,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十行本,一种是十一行本;抄本,则仅有一种日本抄本。首先是十行本,分别藏在中山大学图书馆、西北大学图书馆、延边大学图书馆、韩国庆星大学图书馆、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中央图书馆、韩国延世大学学术信息中心图书馆等。现以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本为例,略介此书信息如下:

《家礼考证》七卷,(朝鲜)曹好益撰。清顺治三年(仁祖二十四年,1646年)朝鲜闵应协刻本。此书封皮黄色,朱色线装订,内有界栏。全书分为三册,以“天、地、人”为册目;框高21.2厘米、宽16.6厘米;每半叶十行二十字,注文小字双行,字数同;白口,上下双花纹对鱼尾,版心中端题有“家礼考证”及卷次。书中有插图。书前有朝鲜仁祖二十四年(1646年)金堉撰《家礼考证序》。

再者是十一行本,主要收藏在台湾汉学研究中心、韩国成均馆大学图书馆、韩国学中央研究所藏书阁图书馆、韩国高丽大学图书馆、韩国忠南大学图书馆、韩国奎章阁等。现以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和韩国成均馆大学图书馆藏本为例,首先略介台湾汉学研究中心载此书的信息:

《家礼考证》七卷,(朝鲜)曹好益撰;(朝鲜)金堉等编,清顺治三年(仁祖二十四年,1646年)朝鲜闵

应协刊本。3册;匡20.5×18公分,线装。有微卷。正文卷端题“家礼考证卷一·仪章度数”。序:“丙戌九月下泮门人资宪大夫礼曹判书兼司知春秋馆事,世子右宾客金堉谨书。”11行,行20字,小字双行字数同。双栏,版心白口,双鱼尾,中间记书名卷第,下方记叶次。刻书地:朝鲜。朝鲜者:闵应协。藏印:“有酒/斋”白文长方印、“名言/允念”白文方印等。

而韩国成均馆大学图书馆的藏本,全文影印在《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二辑经部,据书前提要曰:

《家礼考证》七卷,朝鲜曹好益撰,韩国成均馆大学藏朝鲜仁祖二十四年(一六四六)序刊本,共三册。书高二十八点五厘米,宽二十一厘米,四周双边,每半叶框高二十一点五厘米,宽十七点六厘米。每半叶有界栏十一行二十字,注文小字双行,白口,双花纹鱼尾。是编引据经史究考《家礼》未明之处,并间摭己意,卷首附一六四六年其门人金堉序。曹好益(一五四五一六〇九),字士友,号芝山,昌宁(今属庆尚北道)人,李朝中期性理学者,有《芝山集》《易象说》等著述^[5]。

以上两种刻本,边框、鱼尾等基本特征相同,书前皆有朝鲜仁祖二十四年(1646年)金堉所撰《家礼考证序》,仅行数、尺寸不同,两书皆署为“朝鲜仁祖二十四年”闵应协刻本。囿于史料拮据,二者未知先后,故尚存疑,以供学界参校。

最后是日本抄本。现存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经核查,此书框亦为七卷本。分三册,高约二十五厘米,宽十九厘米,每半叶十一行十九字,注文小字双行。首尾两页都钤“昌平阪学问所”印,每册第一页均钤四印,三印在天头处,呈“一字形”,从左往右分别是“日本政府图书”“书籍馆印”“林氏藏书”,右下方地尾处为“浅草文库”印。

钤印为我们追索日抄本的流变提供了丰富的信息。首先为“林氏藏书”印。所谓“林氏”,即指德川时期的大儒林罗山(1583—1657年),史载林氏尊奉朱子之学,并热衷于收藏典籍,个人藏书一度逾万册,后毁于一场大火,他也因此郁郁而终。从钤印可知,日抄本最早是作为林罗山的私人藏书传入日本。然后归为“昌平阪学问所”。所谓昌平阪学问所,即指宽政九年(1797年)在德川幕府的支持下,将林罗山私家讲学的弘文馆改为由政府出资的公立最高学堂,因学堂地处神田汤岛的昌平阪,得名为昌平阪学问所,学问所

的最高负责人名为大学头,由林氏后人林衡出任,故《家礼考证》一书,此时作为林罗山私人藏书,被归并入昌平阪学问所。继而为“书籍馆印”。书籍馆是明治五年(1872年)日本文部省在整合昌平阪学问所等基础上所设,由此《家礼考证》归入其中,被钤上“书籍馆印”。再又为“浅草文库”印。明治七年(1874年),书籍馆被撤销,所藏图书转入位于东京的国立浅草文库,故此时又被钤上“浅草文库”印。最后为“日本政府图书”印。明治十四年(1881年),浅草文库关闭,约14万册藏书被转入国立公文书馆,故“日本政府图书”印章即入国立公文书馆时所钤。

日抄本相对刻本来说略有不同。一是日抄本在准确性上远低于刻本。如日抄本在序文有句“顾其为书,出于先圣遗经,微辞奥义,有难尽议,学者病之”,刻本作“有难尽识”,虽然语意相差不大,但很明显此句表明后世学者连最基本的《家礼》文意都难以识别,阐发议论更无处谈起,故此处刻本的“识”字更合语意。又如卷一“寝庙正庙”条下,日抄本为“陈师道曰:乡饮荐脯,出自左房……”,刻本作“陈祥道(后同)……”。现查“乡饮荐脯,出自左房”一语,源于陈祥道《礼书·乡饮篇》,且陈祥道师从王安石,一生致力于礼学事业,陈师道对礼学则无著述,故此当为陈祥道。二是日抄本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字迹糜烂不堪,加之抄写时异文较多,使得全书难以识读。由此可见,刻本无论是文本准确性还是行文可读性,都优于日抄本。

综上,我们通过以上《家礼考证》若干版本之考察,较为清晰地揭示《家礼考证》之存藏与版本差异,希冀对学界未来研究朝鲜《家礼》类著作及域外汉籍有所帮助。

2 《家礼考证》对《朱子家礼》的传释

2.1 《家礼考证》的修撰特点与传释方式

曹好益并未死板地遵循朱子《家礼》的体例,而是按照自身对于它的理解,采取重点突出的方式,诠释与探究相关名物、仪式,大体类型如下:

首先是人名物名。《家礼》所引诸多人名,对于当时朝鲜人来说无疑是陌生的,因此曹好益提点出相关人名,一一给予了解释。如卷一便解释了“司马氏”“程氏”“横渠”“杜佑”等人名,大体介绍他们

的生平经历。以“司马氏”为例,“司马氏,名光,字君宝,涑水先生,陕州夏县人,父池,再任光州光山令,生公,因名光。哲宗朝拜相,封温国公,谥文正,所著有《书仪》。”可知,曹氏博学于文,熟稔于司马光生平经历,不仅注明其字号来源、任官经历、父辈情况,而且还阐述了他死后谥号与生平著作。对物名曹氏亦有注。如卷一,曹氏对西京做注:“宋都,汴以洛阳在汴西,故称西京。”又如卷三“幞头”:

《二仪实录》,古以皂罗三尺裹头,号头巾。三代皆冠列品,黔首以皂绢裹发。至周武帝,依古三尺裁为幞头。唐马周交解为之灸穀子,曰:右者以名幞头,但空略髻而已。隋大业中,着巾子以桐木为之内外……见温公《书仪》《后山谈业》又曰到本朝太宗时,又以藤做骨子,以纱糊于上……固非古制,然世承用已久,姑书于此,使有取考云^{[2]254}。

此段材料,曹氏首先引据唐刘孝孙的《二仪实录》,追溯了幞头早期的名称与性质,接着引述司马光《书仪》、陈师道《后山谈业》等书,阐述了它从尧舜至唐宋的形制、制作方式等方面的演化,最终曹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固非古制,然世承用已久”。现存之幞头均非古制,但世用已久,至于原样不可复得,从信手拈来的各类前人著述可知曹氏学识之深厚。

然后是他认为较为重要的词章。如祭祀仪式中的“告朔”,他对此释文为“程子曰:每月告朔用祭酒”;又如“封谥”为“如某国某公之类是”。曹氏认为这些词章,对于本国而言,在理解上具有难度,故释文明晰之。为了使得国人更好地理解词章之本意,曹氏往往在释文时,较多引用朝鲜本国典故或风俗,以达通解之目的。如他对卷二“直领裳”解释便援引朝鲜服制“直领者,其领直下垂之……今妇人之服,交掩于前而束带焉,则如今男子之衣,疑其为制亦如此”。曹氏在解释直领裳的形制时,便援引当地服制,认为与现今女子服制类似,进而怀疑现今男子之服亦同与此。

再者是仪式步骤。曹好益对仪式步骤的流程,记载亦用力甚勤。在宏观仪式上,以卷七丧礼篇为例,曹氏详细叙述了丧礼的若干仪式步骤,从“沐浴”“饭含”到“剪爪”“敛礼”再到“入馆”与“送葬”,他都对整个流程给予了大幅度的关注。而在微观仪式上,曹氏也不厌其烦地进行描写,如“楔齿”:

复者降楔齿缀之。礼，楔齿用角柶。注为将含，恐其口闭急也。既夕……角柶……中央八口，而末向上……令以屈处入口，取出时易……尸南首，足北向，故以几角向南以夹之……角柶长六寸，两头屈曲^{[2]687}。

上引可知，对于楔齿这一步骤，曹氏也进行详细的考述。他首先援引《礼记》“为将含，恐其口闭急也”，论证楔齿仪式的必要性，即“楔齿”是为“饭含”礼做准备。接着他描写楔齿所需工具“角柶”与“几角”的形制“中央八口，而末向上，长六寸，两头屈曲”，进而对“楔齿”的流程进行详细论述：“当举行完追魂仪式的复者，发现死者已死、不得复活后，便将死者按照南首北足的方位安放，紧接着用角柶楔入其牙齿间、以避免他嘴部闭合，用燕几固定住双脚、防止尸体僵硬的弯曲，为后面的‘饭含’与‘敛礼’提供方便。”从而可见，曹氏对“楔齿”仪式的描写，不仅引经据典、论据有力，而且整个流程环环相扣、逻辑分明，使读者能快速明晰此仪式的流程与方式。

通过我们以上的诸多分析，可知金堉在序文所云其师曹好益“凡文字之未解者、事物之难究者，考其出处而明之，多引经史而证之，间亦附以己意，使后之学者开卷了然”一语并非妄言。曹氏凭借“传极群书，研穷义理”的丰富知识，确实明晰了朱子《家礼》中词章难解之处。

2.2 《家礼考证》对朝鲜民风的匡正

如前所述，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李氏朝鲜，是一个党争频发、礼学分裂、礼讼渐起的时代，曹好益认为此时“世风日下”，需“辅以修齐治平之道”“著考证以明之”，因此他在书中借助注释，发起对朝鲜民风的抨击。以卷三冠礼“背子”条为例，曹氏引胡瑗《苍梧杂志》认为背子为婢妾之服，因婢妾常立于主妇之后，故曰“背子”。它是一种窄袖、半臂、直领长衣，拥有对襟，腋下开胯，腋下侧缝缀有带子，大体长及腰际宽短袖上衣，一般与长袖等物搭配。到明代，丘浚对“背子”理解开始有了转变，他将背子的行用范围限定在女性，并且只有命妇才能穿。这使得原本认为“卑贱”之服变为专属“命妇”之服。

此种转变引起了曹好益警惕，他认为“冠服之制，在中朝，去宋仅数百年，而丘氏已不得其制，矧在丘氏之后，又百余年乎”。宋明相隔仅数百年，此时明人丘浚已不知背子之制，而他本人又距丘氏百年有余，故背子具体形制，恐怕再无知晓。

紧接着他对朝鲜现今男女服饰展开批判，他认为朝鲜虽“一尊华制”“旧俗相承”，对中华文化遵从与传承甚久，但亦有“不知为状者”，特别在乡野之人，他们“跽伏穷乡”行用的服饰之制更为鄙陋。所幸现在朝鲜使者能前往中国，可与中国人“项背相望于途”，这使得使者能随时“询问其制”，明晰中国服饰之制，进而有利于朝鲜民众革除本国“千古之陋”，可谓他们国家“衣冠之一大幸”。随后曹氏以更为激烈的语气，批判当地妇人的髻发“尤为无理可笑”。由此可知曹好益对匡正本国民俗激烈的态度。

相似内容还见于卷七丧礼“七七”条，曹好益引据刘泗洙文，批驳了当时民间丧俗中盛行的“七七”斋祭。曹氏赞同刘氏对“七七”的看法，认为这种祭祀仪式与佛道无涉，而是直接来源于儒家的“虞”礼，“诸侯七虞，以七日为节”“自春秋末世也，大夫僭用诸侯七虞之礼矣”，可知七七斋本为诸侯七虞之礼为中华文化之正统，现世百姓不明缘由，“循习莫究其义”，错以为它们源自于佛教，在丧葬时“每七日必供佛饭僧，言见地下某王”的行为，过于荒诞不经，由此他希望通过摘录前人之言“以破世俗之惑”。

2.3 《家礼考证》传释之不足

当然，曹好益对《家礼》的考证亦有不足，特别是对于朱熹与后世学者在《家礼》仪式上的抵牾之处，未能辨清史实、弄清源流。现举一例证之，在《家礼考证》卷三《昏礼》“但不告庙”条中，曹氏在此对婚礼“纳币”时，是否需要举行告庙仪式，持模棱两可之态度，他一方面认为纳币“恐应当告”，另一方面又认为“纳采已告，故纳征不告”“丘氏之说，亦为有理”，曹好益对朱丘二人观点孰是孰非、区别何在并未深究，仅以“录于此”为结语，我们认为这并无说服力，想要解决上述问题，则需探析古礼与朱熹《家礼》在“纳采”与“纳币”仪式上的区别。

首先据《仪礼》载，婚礼仪式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步，《仪礼·士昏礼》云：“纳采用雁。主人筵于户西，西上，右几。”^[6]可知纳采作为婚礼仪式的开始，媒人执雁入女方家，在女方祢庙中举行仪式。此处告庙并非双方聘礼的完成，仅意味着在女方先祖见证下，双方有意举行结合。自后婚姻能否成功，还需要男方进行“问名”“纳吉”等仪式，其中任何一项仪式的失败即意味着双方婚礼的中止。到“纳征”时，男方确认了女方适合自己，于是便以

“玄纁束帛、俚皮”作为对女方家的聘礼。此时告庙，即意味着在先祖的见证下，双方聘礼关系的确定，不再毁坏婚约，继而请良辰吉日以成婚。

朱熹对婚礼的理解不同于古礼，他认为古礼过于驳杂冗余，于是改“六礼”为“三礼”，删“问名、纳吉、请期”，存“纳采、纳币、亲迎”。朱熹秉持着“礼多则繁、屡告则不敬”的思想，在《朱子家礼》中为保持对先人的恭敬，删削了告庙的次数。从“某之子若妹侄孙，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辞……某之第几女，若某亲某之第几女，年渐长成，许嫁某官某郡姓名之子，若某亲某。今日纳采不胜感怆”^[7]等此类对话中可知，朱熹认为“纳采”即男女双方的定聘之礼，一旦“纳采”完成，双方即正式确定婚礼关系的成立，不再发生“悔婚”“退聘”等行为。也正因为“纳采”标志着定聘仪式的完成，所以才会举行“昭告先祖，后人娶妻”的告庙仪式。

从朱熹对“纳币”仪式的叙述也可证明上述的观点。在对“纳币”仪式的描述中，朱熹多使用“礼如纳采”“改采为币”等话语，这即表明在朱熹看来，“纳币”是“纳采”的附属，前者无论是流程还是重要性，都远不及后者。纳采已经表明双方婚姻的订立，故纳币只是助献“钗钏、羊酒、果实”等物，在“贫富随宜，少不过两，多不逾十”的能力范围内帮助新婚夫妇顺利组建小家庭。

由于朱熹对婚礼大幅度的删削，遭到了后世学者的反对，以丘浚为典型。丘氏在《家礼仪节》恢复了朱熹删去的三礼，将问名与纳采合并，将纳吉、请期归并入纳币，使得“虽无其名，而具其实”。丘氏延续了古礼的精神，较纳采而言，他更看重纳币的作用，即丘浚保持了古礼的态度，认为纳采只是婚礼仪式的一部分，此时的告庙并不意味着婚姻关系的确定，而纳币则不同，纳币标志着双方婚约的订立。

总之，由于朱熹与丘浚对“纳采”与“纳币”的重视程度不同，导致了他们对纳币是否需要告庙的不同理解。这种差异反映在文本上，引发了曹好益的困惑，曹氏虽然看见了《朱子家礼》与丘浚《家礼仪节》在“纳币告庙”上的不同记载，但他并未理解二者为何会产生抵牾？致使他只能在“恐亦当告”与“丘氏之说，亦为有理”之间莫衷一是，最后以“录于此”草草结尾。此处解经之缺点，源于曹氏对儒家经典文本理解与时代礼仪流变认识不足所致。

3 余论：《家礼考证》与十七世纪的朝鲜《家礼》学研究

通过以上对《家礼考证》的深入探讨，我们明晰了曹好益传释《家礼》的特点、方式与不足，那么《家礼考证》在汗牛充栋的朝鲜《家礼》类著作中占有怎样的地位？换言之，即此书对我们未来研究朝鲜的学派史、《家礼》史有何意义呢？这无疑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首先，我们认为《家礼考证》是曹好益为维护自身学派做出的努力。如前所述曹氏作为李滉的门生，身为退溪学派之一员，他的《家礼考证》问世，充实了退溪学派的《家礼》学研究成果，顶住了栗谷学派在《家礼》研究上的一家独大。退溪学派在《家礼》学的论著上，先后有李滉《退溪丧祭礼答问》、曹好益《家礼考证》、郑述《五服沿革图》、柳成龙《丧礼考证》、金诚一《奉先诸仪》等书。然栗谷学派的学人著述也异常丰富，前有创始人李珥《栗谷祭仪》，后有死配成均馆文庙的沙溪先生金长生，由他创作的《家礼辑览》更被后世誉为朝鲜《家礼》类著作的巅峰，这使得栗谷学派在《家礼》研究上影响愈发壮大。曹好益《家礼考证》虽远不及金长生《家礼辑览》影响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充实了退溪学派的论著，为本学派在《家礼》研究传承上作出了贡献，有力于后世的《家礼》研究进入良性循环。

再者，我们认为《家礼考证》促进《家礼》学研究的良性循环，继而对后世《家礼》研究作出铺垫。在他之后，《家礼》类著作有南道振《礼书札记》、李滢《四礼便览》、李瀾《星湖先生家礼疾书》等，它们继承了《家礼考证》的考据精神，在名物考释时更加注重名物、仪式、礼文的复原，这使得他们在曹好益开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往日赵曜曜在探讨朝鲜《家礼》“祠堂五架”的说法时，就指出南道振的《礼书札记》，沿袭了《家礼考证》在祠堂内部结构的“前庑、前楣、栋、后楣、后庑”五架说^[8]。可见，曹氏的名物词章释读之法对后世学者产生重要影响，使得他们每在撰写《家礼》时，必以该书作为参考，故可认为曹好益的《家礼考证》一书，大大推动了朝鲜礼制史的研究走向精细化。

最后，我们认为在《家礼》学研究上，以《家礼考证》为代表的考释派的出现，除了推动了《家礼》学研

究走向精细化外,更标志着十七世纪朝鲜的《家礼》学研究开始摆脱单调乏味的文字重复、微言大义,走向追溯礼源、文本自觉,让研究范式从空泛的义理之说转为实证的考据之学。

自十四世纪以来,《家礼》东入朝鲜,郑梦周较早就关注了此书,史云:“时俗丧祭专尚桑门法,梦周始令士庶仿《朱子家礼》立家庙奉先祀。”^[9]李朝的建立,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决意尊奉《家礼》。太祖李成桂死后“上擗踊呼泣,声闻于外,治丧一依《朱子家礼》”^[10]即是明证。情随事迁,至曹好益时代,《家礼》在朝鲜流传业已三百年。众所周知,任何一项制度在长时段的演变中都会走样、变形,《家礼》亦不例外,这便是曹好益在“冠服之制”条中,感叹“中朝去宋仅数百年,而丘氏已不得其制,矧在丘氏之后,又百余年乎”的原因。

当时朝鲜学者虽然尊崇《家礼》,但对《家礼》的研究还是单调的礼文重复、微言大义,包括李滉《退溪丧祭礼答问》、李珥《栗谷祭仪》都是借传释文本之名,行微言大义之实,他们在论著中肆意发挥自己对《家礼》仪式的看法。但以曹好益《家礼考证》为标志,包括同时期偏后的金长生《家礼辑览》都开始偏重于名物词章、仪式程序的考释,并逐渐反思《家礼》文本的形成与源流。彭林分析过《家礼辑览》指出:“乾嘉以后,汉学复兴,考据之学臻于极盛……然而,此时与中国学术界交往密切,并且熟知考据之学成就的朝鲜学者,寥若晨星。由此,人们多以为朝鲜时代学术偏枯。今读沙溪金长生的《家礼辑览》,发现上述印象需要修正。”^[11]彭林先生与本文关注的著作虽不同,但他亦感受到此时朝鲜学风的转变,这可佐证我们上述观点当为不误。现今看来曹好益、金长生等人的考释存在着些许差错,但瑕不掩瑜。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以曹好益《家礼考证》等

书为代表的《家礼》考释类著作的出现,标志着十七世纪的朝鲜《家礼》学研究从空泛的义理之说转为实证的考据之学。

有趣的是,朝鲜学风的转变,似与中国同步发生,甚至更早。众所周知,自阳明心学流行于世,学者多“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12],使得晚明学风偏转浮躁、空洞。然天不灭斯文,明亡以后,以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为代表的学者逐渐反思明代学风之弊,表现在礼学研究上,便是他们逐渐舍弃了空泛的义理学,偏转于实证考据的经学,提出“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口号。由此观之,十七世纪的朝鲜与中国在礼学研究上,都在进行转型。彭卫民对此亦有关关注:“朱子学在东亚儒学世界里‘太山遍雨,河润千里’式的播迁,再伴随着各族群实学思潮与民族情绪的涌动,使得17世纪以来东亚周边国家‘自文化中心主义’与族群本土认同意识逐步抬头。”^[13]这佐证了我们的看法:即从十七世纪开始,同处于东亚文化圈的诸国,在学术风气上都在进行着某种改革,这种改革表现在朝鲜与中国的礼学研究上,即两国不约而同都开始重视礼文词章的考据实证、舍弃空洞的义理之说。

归纳全文,通过我们对《家礼考证》的考察,不仅明晰了曹好益创作此书的背景、原因,还可以看到此书在朝鲜《家礼》类著作中独特的作用,曹氏通过编撰此书,充实了退溪学派的《家礼》类论著,为本学派在《家礼》学研究上的传承作出了贡献,有利于后世研究的良性循环。他打破了对以往《家礼》学单调低质的辗转腾挪、微言大义的研究局面,使得学者们开始反思《家礼》在名物仪式、词章文藻、礼仪渊源的准确性,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创作蓝本,并推动了朝鲜《家礼》研究走向精细化。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家礼考证》对现今学界研究朝鲜学派史、《家礼》史具有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 [1] 彭卫民.太山遍雨:明清时期东亚国家“家礼”文献的刊刻与影响[J].深圳大学学报,2019(3):134-144.
- [2] 曹好益.家礼考证[M].刻本.1646(朝鲜仁祖二十四年).中山大学图书馆藏.
- [3] 崔成德.朝鲜文学艺术大辞典[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 [4] 彭卫民.明清域外典籍经眼录[M].新北:花木兰出版社,2013:30.
- [5] 曹好益.家礼考证[M]//《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2辑:经部:第8册.重庆:重庆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05.

- [6] 杨天宇.仪礼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5.
- [7] 朱熹.朱子家礼(宋本汇校)[M].吾妻重二,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102.
- [8] 赵曜曜.《朱子家礼》“诸具”疏证——以《韩国礼学丛书》为中心[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8.
- [9] 郑麟趾.高丽史:卷117[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556.
- [10] 春秋馆史官.李朝实录·太宗实录:卷5[M].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2441.
- [11] 彭林.《家礼辑览》与朝鲜时代学者金沙溪的解经之法[J].国际汉学,2020(1):57-65.
- [12]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02.
- [13] 彭卫民.复归“先王之道”:德川日本古学派“家礼”思想的批判[J].济南大学学报,2021(3):54-64.

作者简介: 陈莉,中山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学;吴凌杰,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礼制史。

收稿日期: 2022-06-15

本文责编: 李芳

(上接第75页)

- [7] 刘琦,周伟,陈小蕾.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建设实践与思考[J].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2021(3):361-365.
- [8] 张明波.基于在线诊疗健康平台的设计与实现[J].电脑知识与技术,2021(11):262-264.
- [9] 刘咏梅,李梦宇,谢阳群.MEC理论视角下老年用户在线医疗健康信息服务使用价值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20(19):71-79.
- [10] SANDERS R, LINN A J, ARAUJO T B, et al. Different platforms for different patients' needs: Automatic content analysis of different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platform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 2020, 137(C): 102386.
- [11] 钱明辉,徐志轩,王珊.基于用户参与的在线健康平台信息服务质量研究[J].情报学报,2019(2):132-142.
- [12] MILLAR R J, SAHOO S, YAMASHITA T, et al. Literacy skills, language use, and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among Hispanic adults in the United States[J].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2020, 103(8): 1595-1600.
- [13] 金燕,韩二莹,毕崇武.面向在线健康信息质量治理的群体动力系统构建及优化研究[J].情报科学,2022,40(8):76-84.
- [14] ZHANG X, GUO F, XU T, et al. What motivates physicians to share free health information on online health platforms?[J].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2020, 57(2): 106-122.
- [15] 李月琳,张建伟,张娅.螺旋式与直线式:在线健康医疗平台用户与医生交互模式研究[J].情报学报,2021(1):88-100.
- [16] DELONE W H, MCLEAN E R. The DeLone and McLean mode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success: a ten-year updat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003, 19(4): 9-30.

作者简介: 张慧敏,苏州大学社会学院2020级情报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知识服务、健康信息行为等;徐芳,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城市学院城市治理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关联数据与数字人文、数字图书馆等。

收稿日期: 2022-08-19

本文责编: 王晓琳

· 文献学研究 ·

清代《萧山会试题名》及相关问题探讨^{*}

全根先

(中国国家图书馆 北京 100081)

摘要: 文章以民间收藏清代《萧山会试题名》抄本为主要依据, 参阅清代科举资料并吸收学界相关研究成果, 对清代萧山会试情况进行叙述, 对该抄本未收进士进行补录, 并对萧山进士中“冒籍”现象、科举家族及朝廷重臣等进行考述, 较全面地反映清代萧山科举特别是会试的历史面貌。因萧山在历史上地名和所辖区域屡有变更, 文章所讨论的清代萧山科举状况以1996年滨江区成立前萧山所辖区域为准。

关键词: 清代; 萧山; 会试; 进士; 科举制度; 《萧山会试题名》

中图分类号: G255.1; D691

文献标识码: A

Xiaoshan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Title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Discussion on Related Issues

Abstract Based on the folk collection of manuscripts of the Qing Dynasty *Xiaoshan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Titles*, referring to the Qing Dynasty imperial examination materials and the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the article describes the Xiaoshan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paper also makes supplementary records for the manuscript that did not include Jinshi (a successful candidate in the highest imperial examinations). It examines the phenomenon of "maoji" (fraudulent membership) among the Xiaoshan Jinshi,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family and the important officials of the imperial court. In this way, we can reflect on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Xiaoshan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especially the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Since Xiaoshan has changed its name and the area under its jurisdiction repeatedly in history, the paper is based on the area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Xiaoshan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Binjiang District in 1996.

Key words Qing Dynasty; Xiaoshan;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Jinshi;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Xiaoshan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Titles*

1 引言

萧山古名馀暨。一般认为, 馀暨之名源于越国开国君王“无馀声教所及”^①。在历史上, 萧山曾多次更名。王莽建立新朝, 改名馀衍, 属会稽郡; 东汉时, 恢复旧名馀暨, 仍属会稽郡; 三国时, 改馀暨为永兴;

隋文帝时, 废永兴县, 并入会稽县; 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年), 复置永兴县; 天宝元年(742年), 改名萧山县。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 “萧山, 仪凤二年, 分会稽、诸暨置永兴县。天宝元年, 改为萧山。”至于改名原因, 可能是越州(会稽郡)永兴县与江夏郡永兴县(今湖北阳新县)重名。《旧唐书·玄宗纪》云: 天宝元年九月, “丙寅, 改天下县名不稳及重名一百一十

^{*}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公众历史记录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 19ZAD194)的阶段性成果。

处”。萧山作为山名,始见于《汉书·地理志》:“馮暨,萧山,潘水所出。东入海。莽曰馮衍。”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占领萧山,因避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讳,改萧山为莠珊;同治二年(1863年),太平军退走,复称萧山县,其名保留至今。

历史上,萧山曾长期归绍兴府管辖。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升越州为绍兴府,萧山属绍兴府,一直到清代。民国时萧山为省直属县,建国初一度归绍兴专区、宁波专区,1959年属杭州市。1987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萧山县,设萧山市(县级)。1996年12月,杭州行政区划调整,西兴、长河、浦沿三镇从萧山划出,成立滨江区。2001年2月,撤销县级萧山市,成立杭州市萧山区。2021年3月,复将河庄、义蓬、新湾、临江、前进五个街道从萧山区划出,并入新成立的钱塘区。由于政区屡次变革,萧山辖地究竟当以何时为准,恐怕很难有一个绝对标准。为较全面反映萧山历史文化底蕴,本文所讨论的萧山科举状况以滨江区成立前所辖区域为准。

清朝建立以后,沿袭明制,于顺治元年(1644年)即恢复科举制度,“文武制科,仍于辰、戌、丑、未年举行会试,子、午、卯、酉年举行乡试”^[1]。清代科举分为童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五级,其中会试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除每三年一次“正科”外,在清代,凡遇重大庆典还会额外加开乡试、会试,称为“恩科”。“恩科”始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时值皇帝六十大寿。如果“恩科”当年适逢“正科”,那么,“正科”将提前或推后一年举行。“恩科”之外,还有加科,清代只有两次,都发生在顺治年间。另外,清代还设有特科,如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博学鸿儒科,光绪年间的经济特科。

有清一代共举行会试112次,录取进士26 849人,其中浙江籍2 795人。需要说明的是,因雍正四年(1726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查嗣庭科场试题案”,浙江全省士子被剥夺当年参加乡试、次年参加会试资格。雍正六年(1728年),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此道诏令才废止。清代浙江各州进士录取情况:杭州府902人,嘉兴府505人,湖州府379人,宁波府242人,绍兴府515人,金华府83人,衢州府33人,严州府51人,台州府38人,温州府36人,处州府11人。以县为单位,录取最多的是仁和县^②,374人;其次为钱塘县,340人。萧山属绍兴府,共有进士88人^[2]。然而,因进士籍贯、

行政区划变更等原因,对清代萧山进士的人数有不同说法,这里以所见民间收藏《萧山会试题名》抄本为依据叙述。

2 《萧山会试题名》抄本概况

《萧山会试题名》抄本,高17厘米,广20.5厘米,浅黄色,右开,共11页,每页12行,共收录清代萧山会试拔贡者126人。其中,对于原籍萧山而改籍异地者均予登录,对于父子、叔侄、昆弟等关系亦予以说明。抄本记录年代,始于顺治四年(1647年)丁亥科,止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事实上,清代第一批进士是顺治三年(1646年,丙戌)科,而非顺治四年(1647年);戊戌变法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前,又举行了三次考试,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癸卯经济特科,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会试。其后,自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905—1911年)止,又举行了七次考试,授予游学进士。

另外,《萧山会试题名》与《萧山乡试题名》两个抄本均随清代北京萧山会馆资料同时流出,现为余友人收藏,则《萧山会试题名》很可能是由萧山会馆人员抄写。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前,当年会试、殿试已经结束,不久由于政局混乱,人们纷纷撤离北京,萧山会馆人员很可能就在此时撤离,故而对此后萧山上士子进京赶考情况未再予以记录。由此推断,这本清代《萧山会试题名》最后抄录时间极有可能就是1898年,至于这个抄本何时随其他文献从萧山会馆流出则不得而知。萧山会馆的具体地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前门西河沿街200号(老门牌号192号)。又,据清人杨静亭^③《都门纪略》记载,清代北京各地会馆有363处,其中浙江省会馆有28处。1903年,这里成为北京早期的一所女子学堂。以下对《萧山会试题名》所载各科情况作简要介绍。

顺治年间(1644—1661年),共5人。

周绳烈,丁亥科,顺治四年(1647年),本姓贺。

黄邵士,戊戌科,顺治十五年(1658年),本姓邵。

周之麟,丁克扬,己亥科,顺治十六年(1659年)。

潘兆珪,辛丑科,顺治十八年(1661年),本姓何。

康熙年间(1662—1722年),共15人。

来垣,丁未科,康熙六年(1667年),(明)天启乙丑科(1625年)进士来方炜子;任辰旦,丁未科,康熙六年(1667年)。

王先吉,庚戌科,康熙九年(1670年)。

张际鹏,癸丑科,康熙十二年(1673年)。

沈士本,乙丑科,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

陈尧仁,丁丑科,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仁和籍;陈至言,丁丑科,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

来燕雯,庚辰科,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庚辰科)进士来集之子;来楫,庚辰科,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

何垣,癸未科,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

来珏,任澐,姜承讌,丙戌科,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毛远宗,丙戌科,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博学鸿词毛奇龄之子。

王协灿,癸巳科,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恩科。

雍正年间(1723—1735年),3人。

来谦鸣,癸卯科,雍正元年(1723年),恩科。

洪琛,癸丑科,雍正十一年(1733年),本姓王;沈元鑑,癸丑科,雍正十一年(1733年)。

乾隆年间(1736—1795年),24人。

黄云,丙辰科,乾隆元年(1736年),恩科。

任元文,丁俦嵩,巳未科,乾隆四年(1739年)。

朱珪,戊辰科,乾隆十三年(1748年)。

周滨,王人骐,辛未科,乾隆十六年(1751年);朱垣,辛未科,乾隆十六年(1751年),朱珪兄。

夏甦(苏),壬申科,乾隆十七年(1752年),恩科。

朱筠,甲戌科,乾隆十九年(1754年),朱珪兄。

丁百川,来益清,丁丑科,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张应曾,辛巳科,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恩科。

吴斐,辛卯科,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恩科。

来起峻,沈文炳,单瑞龙,壬辰科,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

汪辉祖,蔡雄,萧濂,乙未科,乾隆四十年(1775年)。

王宗炎,郑应简,庚子科,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恩科。

曹之升,辛丑科,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

徐国楠,王绍兰,癸丑科,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

嘉庆年间(1796—1820年),24人。

来宗敏,来珩,陆以莊,陆泌,丙辰科,嘉庆元年(1796年),恩科。

汤金钊,己未科,嘉庆四年(1799年)。

陈家騄,朱澄,辛酉科,嘉庆六年(1801年),恩科。

何丙咸,瞿昂,壬戌科,嘉庆七年(1802年)。

汪继培,乙丑科,嘉庆十年(1805年),汪辉祖子;盛唐,叶楸勋,乙丑科,嘉庆十年(1805年)。

孔传曾,戊辰科,嘉庆十三年(1808年);王宗彬,嘉庆十三年(1808年),钦赐国子监学正。

何炳,己巳科,嘉庆十四年(1809年),改名何煊;姚庆元,朱瀛,己巳科,嘉庆十四年(1809年)。

王端履,甲戌科,嘉庆十九年(1814年),王宗炎子。

王贻珪,丁丑科,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

韩凤修,童(金)文藻,於灿文,来学醅(醇),金石声,庚辰科,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

道光年间(1821—1850年),27人。

钟锡瑞,郑(陈)绍型,壬午科,道光二年(1822年),恩科;张志彦,壬午科,道光二年(1822年),张应曾孙。

任沚,癸未科,道光三年(1823年)。

许炳,高枚,丙戌科,道光六年(1826年)。

蔡璋,己丑科,道光九年(1829年)。

朱凤标,鲁庆元,壬辰科,道光十二年(1832年)。

骆奎祺,何增筠,乙未科,道光十五年(1835年)。

朱城,蔡五辰,郭世亨,丙申科,道光十六年(1836年)。

蔡召南,倪梦麟,钟瀛,戊戌科,道光十八年(1838年)。

张百撰,庚子科,道光二十年(1840年)。

凌锦江,倪涛,甲辰科,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

郑锡瀛,顾鸿逵,乙巳科,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恩科。

瞿绩凝,乙巳科,一作丁未,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来煦,孔光(广)泉,丁未科,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

徐光第,孔继中,庚戌科,道光三十年(1850年)。

咸丰年间(1851—1861年), 7人。

高延祐, 癸丑科, 咸丰三年(1853年); 林凤辉, 癸丑科, 咸丰三年(1853年), 后改名林式恭。

钟宝华, 丙辰科, 咸丰六年(1856年); 韩钦, 丙辰科, 咸丰六年(1856年), 韩凤修子。

黄庆珍, 郑锡泰, 己未科, 咸丰九年(1859年)。

谢宝树, 庚申科, 咸丰十年(1860年), 恩科。

同治年间(1862—1874年), 12人。

林煊, 壬戌科, 同治元年(1862年)。

沈成烈, 来凤郊, 乙丑科, 同治四年(1865年)。

蔡以璫, 沈受谦, 陈以咸, 戊辰科, 同治七年(1868年)。

郁崑, 辛未科, 同治十年(1871年); 林国柱, 辛未科, 同治十年(1871年), 林式恭子。

陈(汤)鼎烜, 陈光煦, 胡毓(燭)棻, 傅培基, 甲戌科, 同治十三年(1874年)。

光绪年间(1875—1908年), 12人。

徐锡祉, 丙子科, 光绪二年(1876年)。

黄中理, 丁丑科, 光绪三年(1877年)。

沈祖燕, 陆钟琦, 何文澜, 陆钟岱, 己丑科, 光绪十五年(1889年)。

王履咸, 庚寅科, 光绪十六年(1890年); 陆承宗, 庚寅科, 光绪十六年(1890年), 湖南籍。

来熊, 俞省三, 甲午科, 光绪二十年(1894年)。

沈似嫌, 屠佩环, 戊戌科,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以上为清代《萧山会试题名》所录全部名单, 计126人。

3 《萧山会试题名》未收进士

除《萧山会试题名》收录进士外, 根据现有资料, 还有一些抄本未收录的。未收录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该考生所在地区原本不属于萧山, 因行政区划调整归属萧山的, 如部分山阴县籍考生; 二是原籍萧山, 为参加科举考试特意改入他籍的, 其中以顺天府籍为多。具体情况如下:

田轩来(1652—1723年), 字子轩, 号东轩, 山阴县天乐乡欢潭(今属萧山区进化镇)人; 辛未科, 康熙三十年(1690年)中式三甲第三名进士。

徐廷槐(1680—1756年), 字立三, 一字笠山, 号

墨汀, 山阴人(今属萧山区进化镇)人, 一说会稽人; 庚戌科, 雍正八年(1730年)中式三甲第一百零九名进士。

王世腾(1738—?), 号守斋, 山阴(今属萧山区进化镇)人, 本姓田, 改姓王; 丙戌科,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中式二甲第五十六名进士。

田祥(1809—1862年), 字石腴, 号吉荪, 山阴县天乐乡欢潭(今属萧山区进化镇)人; 戊戌科, 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式二甲第三十八名进士。

汤寿潜(1856—1917年), 字蛰先(仙), 号翼仙, 山阴县天乐乡大汤坞(今属萧山区进化镇)人; 壬辰科, 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式二甲第十一名进士。

以上几位山阴籍考生中, 大多是进化镇人。进化镇因境内青化山的进化溪而得名, 原属绍兴, 1950年划归萧山。又, 进化镇欢潭村, 下辖欢潭、诸家、白水、万寿庵四个自然村, 建国后曾设欢潭乡, 于2001年并入进化镇。相传欢潭这个地名还与岳飞有关。据新编《萧山县志》记载: “相传南宋岳飞率兵抗金, 行军至村口, 见泉水潭, 欢饮止渴, 故名。”^[3]

杜宝辰(1803—?), 字穀孙, 号稼轩, 山阴县天乐乡杜家村(今属萧山区所前镇)人; 癸巳科, 道光十三年(1833年)中式二甲第五十七名进士。

周光祖(1818—1865年), 字雪瓿, 一字息瓿, 号锡侯, 山阴(今属萧山区所前镇)人; 己未科, 咸丰九年(1859年)中式二甲第六十三名进士。

以上两位都是所前镇人。所前镇东与绍兴以山界相邻, 因明朝在此设立绍兴盐务批验所而得名。1959年, 其地划归萧山县临浦公社, 1961年成立所前公社, 1985年改为所前镇。

许俊魁(1825—1862年), 字梦馥, 一字梅轩, 号小农, 山阴碧山(今属萧山区党山镇)人; 壬戌科, 同治元年(1862年)中式三甲第四十五名进士。

许在衡(1859—?), 字笈云, 号寿平, 山阴碧山(今属萧山区党山镇); 己丑科, 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式二甲第三十六名进士。

戚扬(1860—1945年), 谱名继奏, 字显臣, 山阴碧山(今属萧山区党山镇)人, 寄籍山阴安昌; 己丑科, 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式二甲第九十八名进士。

以上三位均为党山镇人。党山, 一名碧山, 位于萧山东部, 南与绍兴一堤之隔, 以山命名。1951年, 分属官都、梅林、三官乡和党山乡部分属绍兴县; 1956

年合并为党山乡,划归萧山县。

傅淦(1766—1801年),字毅斋,号篁山,萧山区临浦镇横一村人;乙卯恩科,乾隆六十年(1795年)会元,授内阁中书。

临浦镇位于萧山南部,依山傍水,浦阳江自东向西横贯境内,自古以来商贸发达,有“小上海”之称。历史上长期分属萧山、绍兴,建国初期属绍兴县管辖部分划归萧山。

冯大山,字岳维,号五峰,原籍海宁,今萧山区南阳街道人,生卒年不详;庚戌科,雍正八年(1730年)中式三甲第二百九十四名进士。

历史上,南阳曾是钱塘县最南端辖地,宋代为盐场,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沦为江道,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复为陆地,嘉庆十八年(1813年)由海宁县划归萧山。1916年,高惠南、高惠阳兄弟率先到此建房兴街,后人为纪念他们,遂以南阳命名。

据钟妙明编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清代萧山硃卷汇编》一书记载,清代《萧山会试题名》未收进士还有:

朱菜元(1727—1782年),字雨森,号春浦,萧山人;甲戌科,乾隆十九年(1754年)中式二甲第二十九名进士。

施庭筠(1742—?),字兰公,号德园,萧山人;戊戌科,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中式三甲第六名进士。

陶廷琚(1750—?),字辘川,号南园,萧山人;辛丑科,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中式二甲第三十一名进士。

朱庆颐(1753—?),萧山人,钱塘籍;己酉科,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中式二甲第二十五名进士。

陶杏秀(1715—?),字斐然,号鲁坛,萧山人;戊辰科,乾隆十三年(1748年)中式三甲第一百二十名进士。

丁堃(1747—1821年),谱名如岗,字履登,萧山人;己巳科,嘉庆十四年(1809年)钦赐举人,次年会试钦赐国子监学正加一级。

黄传鼎(1868—?),字调甫,本姓韩,萧山人;戊戌科,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会试拔贡,二十九年(1903年)补殿试,中式三甲第五十七名进士。

此外,有几位《清代萧山硃卷汇编》收录而信息不详者:来寿昌,癸丑科,康熙五十八年(1793年)进士;蔡应鳌,己巳科,嘉庆十四年(1809年)钦赐副贡;李锡彬,丁丑科,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许在衡,己丑科,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王宗彬,不详。

4 萧山生员冒籍情况

上文提到的萧山生员中,有一部分是因行政区域原因而未收录在《萧山会试题名》中,有的则收录而注明他籍、原籍萧山。之所以会出现萧山籍考生改入他籍,是因各地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在分省取士制度下,浙江省的科举考试竞争激烈程度非一般省可比。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浙江巡抚赵申乔上书说:浙江省“应试士子,每科不下万二千人”^[4]。其时会试录取比率约为145:1。比较而言,顺天府和商籍录取比率就大多了。顺天府是明清两代首都最高地方行政机关,自明代起,下辖宛平、大兴两县;康熙十五年(1676年),昌平等十九州县划归;乾隆八年(1743年),定为二十四州县。顺天府所领二十四州县虽为直隶总督辖区,然顺天府尹和总督不存在隶属关系。顺天府因地处京畿,皇帝到国子监去视学,经常会增加顺天乡试录取名额,以示优渥,其录取比率远高于其他地区。商籍情况与此类似。因此,考生若以顺天府籍或商籍身份参加会试,其中试机会将大为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有人不惜冒很大的风险,想方设法到顺天府等额多人少的地方去报考,即所谓“冒籍”。“冒籍”多发生于乡试环节,有的甚至更早。有学者指出,在清代,“乡试是科举全过程中最难登第的一级”^[5]。“冒籍”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冒充为异地考生,参加该地的乡试和会试。例如康熙十六年(1677年)顺天乡试,中式者三十六人,真正属直隶的只有十一人,外籍生员居然占三分之二强。南方人在冒顺天籍时,主要是冒充北皿字号的国子监生员及属于北贝字号的直隶生员,以后者居多。据《钦定大清(光绪)会典事例》记载,顺天乡试“南人冒北皿中式者固多,而冒北贝中式者,更不可计数”^{[6]册4卷340:1012-1013}。二是民籍举子冒充商籍。商籍始于明代万历年间,清代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始开设,“设立直隶、江南、浙江、山东、山西、陕西六省商学”^{[6]册4卷348:1106}。事实上,这些商籍名额多为普通考生所占用。类似情况,在清代《萧山会试题名》中有所反映。

周绳烈(1622—1655年),本姓贺,谱名昌图,讳大生,萧山人,改籍顺天昌平;丁亥科,顺治四年(1647年)中式三甲第六十名进士。

朱珪(1731—1807年),字石君,号南厓,萧山人,

改籍顺天大兴；戊辰科，乾隆十三年（1748年）中式二甲第四十七名进士。

朱垣（1723—1773年），字维丰，又字仲君，朱硅兄，萧山人，改籍顺天大兴；辛未科，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式二甲第五十七名进士。

朱筠（1729—1781年），字竹君，号笥河，朱硅兄，萧山人，改籍顺天大兴；甲戌科，乾隆十九年（1754年）中式二甲第十八名进士。

王家宾（1733—1808年），字觐宸，号梅岑，萧山人，改籍顺天昌平；癸未科，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式二甲第四十五名进士。

汪桂葆，萧山人，改籍顺天大兴，生卒年不详；戊辰科，嘉庆十三年（1808年）中式三甲第六十五名进士。

朱瀛（1777—？），字东洲，号云浦，萧山人，改籍顺天大兴；己巳恩科，嘉庆十四年（1809年）中式三甲第五十六名进士。

徐青照（1790—？），字式金，号稚兰，萧山人，改籍顺天大兴；壬午科，道光二年（1822年）中式二甲第一百名。

瞿绩凝，字西桥，号襖生，萧山人，改籍顺天宛平，生卒年不详；丁未科，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式三甲第七十六名进士。

陆光熙（1887—1911年），字亮臣，号潜斋，萧山人，改籍顺天宛平；甲辰科，光绪三十年（1904年）中式三甲第六十二名进士。

以上几位都是原籍萧山而改籍顺天参加考试的。其中，陆光熙是清代最后一位山西巡抚陆钟琦之子。他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赴日本留学，学习期间与孙传芳、李根源、唐继尧等创办《武学》，提倡“尚武精神，以兵立国”，宣统元年（1909年）毕业回国。1911年10月，陆钟琦由江苏布政使调任山西巡抚，这时武昌起义爆发，阎锡山率领的革民军攻破抚署，陆光熙挺身卫父，与父并及于难，其父上任仅23天。

除了改籍顺天府的萧山考生，还有改籍他地的。李锡彬（1850—？），字又莲，号少林，萧山人，改籍直隶省保定府清苑县；丁丑科，光绪三年（1877年）中式二甲第十七名进士。夏锡麒（1846—？），字梅叔，号云舫，萧山人，改钱塘县商籍；丙辰科，咸丰六年（1856年）中式二甲第八十五名进士。胡燊棻（1840—1906年），字芸楣，萧山人，改籍安徽泗州；甲戌科，同治十三年（1874年）中式二甲第八十九名进士。还有非萧

山籍考生而入萧山籍的。陆承宗，原籍湖南长沙，庚寅科，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

5 以来氏为代表的萧山科举家族

明清时期，浙江一直是科举大省，并涌现出了多个拥有两个以上进士的科举家族。清代浙江省十一个府中，除了处州府，其余十个府均有科举家族，进士人数高达十名以上的有四府四家，即杭州府、绍兴府、湖州府和嘉兴府各一家。清代萧山属于绍兴府，萧山拥有进士人数超过十位的只有来家，故曾有“无来不出榜”之说。来家在长河镇，今属滨江区。据《萧山来氏家谱》记载，自南宋至清末，萧山来氏被皇帝授予圣旨的诏书有101道，大小官员387人^[7]，遍布各地。

相传萧山来氏始祖为南宋河南省鄢陵县人来廷绍（1150—1203年），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他与永康学派创始人陈亮为同榜进士。嘉泰二年（1202年），他以龙图阁学士出知绍兴府事，未到任而卒于萧山祇园寺^④。其子遂居萧山河，子孙繁衍，成为望族。来廷绍去世后，辛弃疾曾为其作墓志铭。明末清初，萧山长河来氏有来斯行、来宗道、来集之三人，均为一代人杰。其中，来斯行为第四房十四世，曾任福建右布政使，文学家；来宗道为第五房十四世，曾任内阁首辅；来集之为第四房十六世，曾任太常寺少卿，文学家、戏曲家。

到了清代，萧山来氏依旧人才辈出，进士多达十余位。

来垣（1633—1703年），字紫垣，号世求，康熙六年（1667年）丁未科中式三甲第十八名进士，授内阁中书，转山东省莱州府东昌府同知，调署登州府事。因执法严峻，任为人所害。

来燕雯（1648—1704年），字拂云，号对山，来集之子，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庚辰科中式三甲第一百三十名进士，官内阁中书。

来珏，字紫苍，号玉峰，生卒年不详，仁和（今属杭州）籍，萧山河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丙戌科中式三甲第一百七十五名进士，曾任福建省永福县令，著有《经说文集》。

来谦鸣（1691—1765年），字声吉，号望瞿，雍正元年（1723年）癸卯科中式二甲第三十二名进士，曾任翰林、直隶魏县令、云南征江府太守、广西右江道、广

东盐运使等。

来益清,字企岳,又字龙源,生卒年不详,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丁丑科中式二甲第十八名进士,曾任馆陶令,治理漳、卫水患;任福建清流县令,吏治清明,卒于官署。

来起峻(1728—1784年),字鲁登,号江皋,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己丑科中式二甲第二十九名进士,官户部湖广清吏司额外主事,数月后返乡,以教书为业,著有《渌井轩诗草》。

来宗敏(1760—1816年),字慎之,号懋斋,嘉庆元年(1796年)丙辰科中式三甲第六十二名进士,授直隶清丰令,到任数月,即回籍教授生徒。

来珩(1763—1824年),字虹桥,嘉庆元年(1796年)丙辰科中式三甲第五十名进士,曾任江西临川万载知县,乡试同考官。

来学鹍(1786—1822年),字若思,号西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庚辰科中式三甲第七名进士,官至武英殿协修^⑤,著有《读诗笔记》。

来煦(1815—1847年),字煦斋,号桂堂,又号春衣,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中式二甲第八十七名进士,授庶吉士,著有《小琅玕山馆诗稿》《贞松楼文集》等。

来凤郊(1830—1870年),字黼堂,号赋唐,又号梧庭,同治四年(1865年)乙丑科中式三甲第一百二十一名进士,曾任严州府^⑥教谕、杭州府学教授,加内阁中书衔。

来熊(1845—1899年),字渭卿,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科中式三甲第六十二名进士,曾任广西思恩府上林县知县,钦加同知衔。

另外,还有一位来楫(1663—?),清代《萧山会试题名》注“复姓陈”,萧山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庚辰科中式三甲第二百三十五名进士,授湖广新田县知县。

清代萧山家族有两人以上的科举家族不少,其中明末清初毛奇龄父子较为有名。毛奇龄(1623—1716年),原名甦,又名初晴,字大可,号秋晴,以郡望西河,学者称“西河先生”,经学家、文学家。毛奇龄之弟毛万龄,与其兄并称“大小毛生”。毛万龄(1642—1685年),字大千,号东壶,顺治七年(1650年)贡生,文学家,善画山水。毛奇龄还与仁和籍毛先舒、遂安^⑦籍毛际可齐名,时人称“浙中三毛,文中三豪”。康熙

十八年(1679年),毛奇龄举博学鸿儒科,授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等职,参与《明史》修纂。其遗著由弟子编为《西河全集》,凡四百九十三卷,《四库全书》收录其著作五十二种。毛奇龄之子毛远宗(1659—?),字姬潢,号述斋,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丙戌科中式三甲第一百六十九名进士,授内阁中书,著有《菽畹集》。

与毛奇龄父子相似的,还有学者汪辉祖父子。汪辉祖(1731—1807年),字焕曾,号龙庄、归庐,著名学者、藏书家。汪辉祖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中式乙未科二甲第二十八名进士,曾任湖南宁远知县、新田知县、道州知州,以廉著称,后以足疾引退,专事著述,有环碧山房,藏书数万卷;精于史学,对姓氏研究颇有成就。著有《元史本证》《读史掌录》《史姓韵编》《二十史同姓题名》等二十余种。其四子汪继培(1751—1819年),字因可,号苏潭,嘉庆十年(1805年)中式乙丑科三甲第三十六名进士,官吏部主事。然淡于政事,不久返乡著书,搜罗藏书,完成其父所著《辽金元三史同题名》《九史同题名》等,著有《潜夫论笺》。又,汪继培之弟汪继壕亦喜藏书,收藏于撰美堂。

6 萧山进士中的朝廷重臣

清代萧山进士中,还出了几位朝廷重臣,或位居中朝廷中枢,或为一方封疆大吏,曾是当年风云人物。

朱珪,萧山蜀山街道人,早年随父朱文炳由萧山侨居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大兴区)。乾隆十三年(1748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侍读学士、福建粮驿道、按察使,湖北按察使,直上书房,乾隆皇帝第十五子永琰(爱新觉罗·颢琰,即嘉庆皇帝)师。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任礼部侍郎,调兵部,历任安徽巡抚、广东巡抚、两广总督、兵部尚书等。嘉庆元年(1796年),任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嘉庆四年(1799年)奉召入京,直南书房,加太子少保。后任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太子少傅。嘉庆十年(1805年),拜体仁阁大学士,卒赠太傅,谥文正。著有《知足斋文集》《诗集》等。

汤金钊(1772—1856年),字敦甫,萧山城厢街道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乡试解元,嘉庆四年

(1799年)己未科中式二甲第二名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嘉庆十三年(1808年)入直书房,因母丧回籍。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复入直上书房,不久,任礼部侍郎。道光七年(1827年)任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充上书房总师傅,调任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咸丰四年(1854年)加太子太保衔,赐御书“庆衍恩荣”匾额,卒谥文端。著有《寸心至室存稿》《游焦山记》《儒门法经辑要》《隙光随笔》等。

何焯(1774—1837年),初名炳,字允彪,号寅士,萧山城厢街道人。嘉庆十三年(1808年)举人,十四年(1809年)己巳科中式二甲第七十二名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曾任广西按察使、云南按察使、山西布政使、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云南巡抚,著有《礼仪精义》《慎终集》等。

朱凤标(1800—1873年),字桐轩,号建霞,萧山新塘街道人。道光八年(1828年)举人,十二年(1832年)壬辰科中式一甲第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

十九年(1839年)直尚书房,督湖北学政。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其后,历任户部侍郎、工部尚书、刑部尚书、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拜体仁阁大学士,卒赠太子太保,谥文端。针对英法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主张坚决抵抗。

胡燏棻(1840—1906年),字芸楣,本籍萧山,安徽泗州(今泗县)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中式二甲第八十九名进士。曾为李鸿章筹集军需,补天津道。光绪十七年(1891年)迁广西按察使。甲午战争时期,曾受命主持新兵,后由袁世凯继任。调任芦津铁路督办,授顺天府尹,迁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后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铁路总办、邮传部侍郎等,主张维新,学习西方。

总之,从抄本《萧山会试题名》可以看出清代萧山的人文之盛和历史演变,册页之中有乾坤,的确是一本颇具价值的历史文献。

注释:

- ① 杜永毅《萧山建县史实考——兼谈“应注”的史料价值》一文对此持有异议,详见《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7(1):47-50。
- ② 仁和县,清代杭州府下辖县,民国元年(1912年)废,并入杭县。
- ③ 杨静亭,名士安,北京通州人,大约生活于清嘉庆、道光年间,曾供职于陕西榆林官署,后辞官返京。
- ④ 祇园寺,始建于晋咸和元年(326年),初名崇化寺,位于萧山区城厢街道体育路西端(现体育路小学内)。
- ⑤ 武英殿协修,清代内务府设有武英殿修书处,雍正七年(1729年)改此名,设有总裁、提调、总纂、纂修、协修等官,由皇帝与翰林院派任。
- ⑥ 严州府,明清时期浙江省下属的一个府,辖区在杭州市西南部,府城在今建德市梅城镇。
- ⑦ 遂安,清代县名,属严州府,1958年并入淳安县。

参考文献:

- [1]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7:90.
- [2] 方芳.清代科举家族地理分布的特点及原因[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39-44.
- [3] 费黑.萧山县志编纂委员会.萧山县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876.
- [4] 李卫,等.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雍正)浙江通志:卷142[M].北京:中华书局,2001:3899.
- [5] 陈茂同.中国历代选官制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358.
- [6] 昆冈,等.钦定大清(光绪)会典事例[M].北京:中华书局,1991.
- [7] 莫艳梅.越地名土来斯行、来宗道、来集之关系考辨[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7(3):17-21.

作者简介:全根先,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目录学史、口述史学、影像史学。

收稿日期:2022-08-19

本文责编:李芳